新政治经济学书系

SAVING CAPITALISM

拯救资本主义

重建服务于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新经济

[美] 罗伯特·赖克（Robert B. Reich）◎ 著
曾鑫　熊跃根 ◎ 译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拯救资本主义

作者:[美]罗伯特·赖克

译者:曾鑫 熊跃根

ISBN:978750866603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题记

深切怀念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侵犯私人财产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穷人打劫富人…

过程突然并充满暴力；第二种是富人掠夺穷人…过程缓慢而合法。

——约翰·泰勒，《美国政府原则和政策探析》（1841年）

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赖克的《拯救资本主义》引人入胜，介绍了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并因猖獗的寻租和垄断问题而变得扭曲。他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以及我们的经济表现不佳。美国有必要开展全面改革，不仅限于提高最低工资和加大教育投入等常规处方。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美国前财长

我们认为当前的经济格局是理所当然的。罗伯特·赖克重新发现导致出现这一局面的政治根源，从而为开展更富成效的新辩论创造条件。所有关注我们经济未来的人都有必要了解赖克的论点。

劳拉·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拯救资本主义》是一部探讨美国中产阶级衰退问题的重磅之作，发人沉思。作为美国最敏锐、热情的一位社会批评家，赖克从独特的角度，令人信服地分析影响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

问题日益恶化，以及美国金钱政治如何扭曲这些规则。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国参议员

如果你希望了解为什么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当今时代的经济、政治和道义问题，那么《拯救资本主义》是必读之作。罗伯特·赖克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本书为重建中产阶级和纠正受到操纵的经济制度提供了路线图。我们的经济制度长期以来依赖腐败的竞选献金制度。

《纽约时报书评》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拯救资本主义》是一部关于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力作，意义深远......吹响了动员的号角。

《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雄心勃勃......赖克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主要是由政治决定造成的，而政府本可以做出相反的政治决定。《拯救资本主义》很好地解释了我们当前所处的境况。

《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和任何一位良师一样，罗伯特·赖克知道，为了让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观念深入人心，通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反复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赖克阐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这一事实为民众所广泛了解，美国就能够摆脱当前毁灭性的政治僵局。

《出版人周刊》

（Publishers Weekly）

《拯救资本主义》阐述了扭转美国收入不平等趋势的必要性。它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罗伯特·赖克最后得出有力结论：美国民众必须转变观念，不能认为为时已晚而无法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

《沙龙》

（Salon）

《拯救资本主义》是罗伯特·赖克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如果人们希望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那么该书是必读之作。

《赫芬顿邮报》

（The Huffington Post）

《拯救资本主义》是美国顶尖经济学者罗伯特·赖克精彩的、发人深思的著作。

《科克斯书评》

（Kirkus Reviews）

《拯救资本主义》通俗易懂，检视了为什么“经济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显而易见，从而削弱了公众对经济基本宗旨的信心”。作者驳斥了有关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并提出一些新颖的改革措施。赖克的主要信息是我们无需忍受现状。这很有必要，并且大有裨益。

《图书馆杂志》

（Library Journal）

赖克立意高远，语言生动流畅，观点令人信服。我们极力向所有读者推荐这部颇具见地的大作。

EcoWatch

勇气可嘉。《拯救资本主义》提出一条务实的改革之路。赖克运用商界语言，戳破商界维持的一个神话，即私营部门是独立存在的魔幻世界，与政府毫无关联。

The Argonaut（Los Angeles）

《拯救资本主义》引人入胜。赖克非常冷静、清晰有力地指出问题，但没有危言耸听；不过，一种紧迫感贯穿全书。

序言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中，美国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当时美国经济规模翻番，普通美国工人收入也随之翻番。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美国经济规模再次翻番，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却保持原封不动。

那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收入平均约为企业普通员工收入的20倍，[注]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则为普通员工收入的200倍。那时，前1%的最富裕美国人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9%~10%[注]，今天前1%的顶层人群的收入占比则达到20%。

那时，美国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努力工作就有回报；人们通过教育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谁付出最多，回报也最多。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大部分人努力工作，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下一代过上了比我们更幸福的生活。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

然而今天，这些假设听上去空洞无力。人们对经济制度的信心急剧下滑。[注]经济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显而易见，从而削弱了公众对经济基本宗旨的信心。[注]愤世嫉俗的情绪非常普遍。对于多数人而言，经

济和政治制度似乎受到操纵，从而更有利于顶层人群[注]。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而是公众信任不断下滑的问题。[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赖于公众的信任。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他们和下一代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以实现梦想时，隐性的社会契约就开始分崩离析，而我们的社会却依赖于这种社会契约，以此来推动民众自愿进行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破坏行为——小偷小摸、行骗、行贿和受贿。社会逐渐将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经济资源转而用于进行防护。

我们有力量改变这一切，重建一个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经济。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不可逆转地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人类书写和执行。不过为了确定需要做出何种改变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过去25年里，我在著作中和授课时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普通工人未能得势，反而面临着不断攀升的经济压力。简而言之，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削弱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竞争力。现在国外廉价劳动力或电脑驱动的机器能够完成我们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并且成本更低。

我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积极作为，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将税收投入好的学校和能够让人们取得成功的其他渠道，并进行再分配来帮助穷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过也有人强烈反对这些建议，这些人认为当政府更小，并且减少税负和再分配时，经济将运行得更好。

虽然我对当前问题的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我的解释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到企业和金融精英手中，让他们能够左右经济运行的规则。虽然我所提出的政府解决方案仍

然有所裨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重点，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未能充分考虑政府在制定经济游戏规则方面所发挥的基本作用。更为糟糕的是，有关一个积极作为的政府是否优于“自由市场”的争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几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当今的市场组织方式与半个世纪之前有所不同；为什么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未能像过去一样带来共同富裕，以及市场基本规则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人们忽视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声音最为响亮的人员——包括大企业高管、无处不在的律师和说客、华尔街人员和他们的政坛傀儡，以及无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多年来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推动重组市场，并且希望人们忽视这些问题。

《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一个目的是将这些问题放在聚光灯下进行检视。我的论据非常直接。正如我在第一部分中所详细阐述的，市场自身的存在取决于适用于产权（人们可以拥有哪些东西）、垄断（允许存在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合同（交易物和交易条件）、破产（买方无法偿付时该怎么办）等问题的规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些规则。

此类规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在过去几年里，随着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规则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同时，地方和州一级的工会、小企业、小投资者以及政党等抗衡力量中心不断萎缩，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中下层阶级借助这些抗衡力量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随之产生的结果是富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财富而组织市场。这导致市场内部出现规模更大的向上初次分配。因为这些初次分配发生在市场内部，所以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在第二部分，我介绍了这一现象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来说意味着什么。精英主义者声称人们的收入与自身市场价值相当。这一套套逻辑

回避了下列实质性问题，即市场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是否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站得住脚。事实上，收入和财富日益取决于谁有权力设定游戏规则。

正如我所指出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实际上决定着自己的收入。他们在利用内部消息获利的同时，推进可扩大企业利润的市场规则。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工人丧失了上文所提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来抗衡，所以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同时崛起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与自身努力程度相关。由于市场内部的收入预先分配向顶层人群倾斜，它导致出现了一种需求，即通过征税以及向穷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提供转移支付，在市场外部扩大向下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之争本来就具有煽动性，此类需求相当于火上浇油。

正如我在第三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解决方案不在于扩大或缩小政府的规模。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所服务的对象。补救之道在于如何让绝大多数人重获影响力，以便能够决定如何组织市场。这就需要打造新的抗衡力量。它将联合未享受到经济成果的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形成联盟。当前左右派有关“自由市场”和政府优劣之争正妨碍着这一联盟的形成。

正如我所解释的，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政治分歧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而是由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和富豪组成的复合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歧。前者依据自身喜好操纵经济和政治游戏，后者因此身陷困境。我的结论是，为了改变当前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让无力影响游戏规则的广大民众联合起来，重新构建50年前带来普遍繁荣的抗衡力量。

尽管本书重点关注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但我所描述的现象日益成为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注]我认为，美国所吸

取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全球性企业必须遵守业务所在国的规则，但是最大的全球性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经济（和市场规则）不再服务于普通民众时，民众将感到无能为力，不安全感日益加剧，沮丧感不断郁积，这将引发有时掺杂着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恶性民族主义运动，并导致全球各地出现政治动荡，甚至连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

我认为，让我们无暇顾及现实情况的迷思一旦被打破，我们就能够让资本主义服务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历史，特别是美国历史能为我们指引方向，并带来一些慰藉。美国制约顶层富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力，并且周期性地调整政治经济规则，以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主义者打击特权精英，确保市场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普通公民。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者实施反垄断法，拆分大型托拉斯组织，设立负责监管垄断问题的独立委员会，并且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支持者限制了大企业和华尔街的政治权力，并且扩大了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的抗衡力量。

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层面，还来自政治层面。我们不能将这两个领域独立分开。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领域之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与一系列道德理念之间的关系，其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是一个中心议题。“二战”结束之后，在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有力影响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不再是这些问题，而是转移到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问题上。[注]征税和转移支付手段旨在稳定商业周期和帮助穷人。几十年来，这一方案奏效了。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带来了普遍繁荣，进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抗衡力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去我们无须关注经济政治制度的组成方式，或担心顶层阶级掌握过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现在这些正是我们所需要担心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重拾了老的研究调查传统，重新关注一个长期

存在的问题。本书所持的乐观态度正是基于那一段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拯救资本主义，防止它肆意妄为。我相信我们能够再次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

1.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 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2. 参阅A. Atkinsin,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 1 (2011): 3–71.

3. 盖洛普2001年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美国人表示满意，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22%的人表示不满意。到2013年，只有54%的美国人感到满意，45%的人感到不满意。参阅Rebecca Riffkin, “In U.S., 67% Dissatisfied with Income, Wealth Distribution,” Gallup website, January 20, 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66904/dissatisfied-income-wealth-istribution.aspx).

4.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自2000年以来，持下列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14个百分点，即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出人头地。参阅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USA Today, “January 2014 Political Survey, Final Topline,”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January 15–19,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 /f iles/legacy-questionnaires/1-23-14% 20Poverty_Inequality%20topline%20for%20release.pdf).

5. 63%的美国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为了获得现金或竞选献金，会出卖他们的选票，59%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议员可能已经这么做了。66%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在意选民的想法，51%的人甚至认为他们选区的议员不在意他们的想法。参阅“Americans Don’t Think Incumbents Deserve Reelection,”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October 2, 2014.

6. 参阅See “Views of Government: Key Data Points,”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22, 2013 (http://www.pewresearch.org/key-data-points/views-of-government-key-data-points/).

7. 参阅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 rometer 81, Spring 2014: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Results,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July 2014.

8. 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时，经济学开始发展成为独立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这一新的学科寻求识别适用于所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抽象变量，基本或根本不重视资源分配或特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其他诸多方面的研究因此从具体的政治、道德和制度关系，转向更为普遍和科学的“定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

第一部分 自由市场

第一章 主流观点

在小剧场或演讲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先向听众介绍我，然后介绍将与我进行辩论的对手。我的辩论对手和我再花上5~10分钟就指定的议题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例如教育、贫困、收入不平等、税收、高管薪酬、中产阶级工资、气候变化、贩毒等议题。我们辩论什么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辩论主题经常很快就转到“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一问题上。

这可不是我主动挑起来的。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所述，我认为这一辩论毫无意义。我后面会对此进行解释。更为糟糕的是，这一辩论转移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忽视了真正应该辩论的问题。它有意或无意地导致公众忽视了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比下列观念更会毒害人们的思想，即“自由市场”存在于世间某处，且遭到政府的“侵扰”。依据这一观念，市场导致出现不平等或不安全问题，但它们是客观“市场力量”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个人的报酬只是衡量他本人市场价值的标准。如果他的报酬不足以维持生计，那就认命吧。如果其他人赚到数十亿美元，那他们肯定值这么多。如果数百万人失业，或者收入缩水，或者他们身兼数职，但下个月甚至下周的收入仍没有着落，那么这的确很不幸，但这是“市场力量”的结果。

依据这一观点，无论我们做什么来减少不平等或经济不安全问题，让经济服务于大多数人，都会带来风险，扭曲市场和降低市场效率，或者产生最终可能伤害到我们自身的意外后果。尽管政府在必要时需要进行干预，解决污染或工作场所不安全等市场不完善问题，或者提供基础研究或救助穷人等公共产品，但这些只是下列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即市场是万能的。

这一盛行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现在它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几乎每门经济学基础入门课程都会涉及这一观点。它已进入公众日常讨论中。人们也能够听到不同党派的政客阐述这一观点。

剩下值得辩论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市场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保守派希望看到一个小政府，并且政府干预程度较低；自由派则希望有一个积极作为的大政府。这变成一场无休止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是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存在分歧的地方。人们对此如何回应，通常取决于他们最信任（或者说最不信任）哪一方：政府还是“自由市场”。

不过这一盛行的观点，以及它所引发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政府，就没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并不存在于文明无法企及的自然环境中。在自然环境中，竞争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比赛，最终的赢家通常都是最强大的。相比而言，文明是由规则所定义的；政府制定规则，规则创造市场。正如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所指出的：

> （在自然环境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耕作、航海、海外进口商品的运用、宽敞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复存在。最为糟糕的是人们时刻处在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

忍而短寿。[注]

市场，任何市场都需要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游戏规则。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此类规则源于立法部门、行政机构和法院。政府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创造了市场。

游戏规则并非中立或具有普世性，它们也不是永久存在的。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执行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不断演变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反映出哪些人拥有最大的权力来制定或影响这些规则。不过人们无休止地纠结于“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之争，这导致我们无法审视下列问题，即哪些人行使了这一权力，他们如何从中获利，以及是否有必要修改此类规则，以便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有关政府大小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自由市场运行规则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更大。当然我们也应就政府征税、支出、监管和补助水平等问题进行辩论，这是有益的。不过这些问题只是经济领域的边缘问题。而规则和经济同为一体，没有这些规则，以及规则背后的种种选择，就不可能有市场制度。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承认的，[注]“小政府”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支持一个不同的政府——经常是一个偏袒他们及其保护人的政府。[注]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金融业“放松监管”；不过将此举称为“再监管”可能更为合适。它并非意味着政府减少干预，而是意味着出台一套不同的规则，开始允许华尔街开展各种高风险但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允许银行向不具备还贷能力的客户提供房屋抵押贷款。当2008年泡沫破裂时，政府出台规定，保护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资产，为它们提供补助，确保它们不会破产，并说服它们收购实力较弱的银行。与此同时，政府实施了其他规定，导致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随后政府出台补充规定，防止银行再次冒险（不过在许多专家看来，这些规定是不够的）。

人们需要警惕的不是这些罕见的大事件，例如2008年紧急救助华尔

街事件，而是规则当前出现的众多细小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影响着经济游戏。即便大事件最为重大的影响在于改变游戏方式。政府在救助华尔街时，实际上做出了一个隐性的担保，承诺如果大银行再次陷入麻烦，政府还会出手相救。正如我将说明的，这让几家最大的银行相对于小银行而言具有金融优势；它们因此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金融业占据支配地位，强化了它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以获取它们想要的规则，并且规避不希望看到的规则。

有关“自由市场”的迷思让我们无法探讨这些规则变动，追问它们服务于谁。对于不希望我们进行探讨的人而言，这一迷思大有裨益。当一些人对这些规则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时，他们成为规则设计和调整方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自由市场”，并且最为热忱地主张市场优于政府，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不过争论本身也能达到下列目的，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忽视规则是如何制定和变化、公众自身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从中受益的程度等根本现实问题。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希望公众也认同市场的优势，以及这一无休止的辩论的至关重要性。

下列现实情况也有利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即这些基本规则隐藏于经济制度之中，而在这一制度下，很多所有物和交易物都是无形、复杂的。在过去的经济制度中，产权是有形的，例如土地、工厂和机器；相比较而言，今天的知识产权规则不易被人们所理解。同样，在铁路和石油托拉斯巨头时代，垄断和市场势力与今天相比则更为明晰。在今天，谷歌、苹果、脸书或康卡斯特能够支配网络、平台或通信系统。与此同时，在过去，由于买方和卖方地位近乎平等，双方能够轻易地了解或知晓对方承诺的内容，因此合同更为简单易懂。不过随着复杂的抵押贷款、消费者协议、特许经营制度和雇佣合同的出现，情形发生了变化。现在合同条款基本上是某一方当事人说了算。同样，在过去，银行业务更为简单，有的人储蓄，购房者或创业者办理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债务问题更为明晰。在当今世界，金融工具复杂无比，有时很难分

清债务人或债权人，以及债务内容、债务产生时间，或者债务产生的原因。

为了了解这一切会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首先有必要回答几个基本的问题，即政府是如何组织和重新组织市场的，哪些利益集团对市场组织和重组过程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以及谁因此成为赢家，而谁又会沦为输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市场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

1. 参阅Thomas Hobbes,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1651), ch.13, “Of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as Concerning Their Felicity, and Misery”.
2. 参阅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3. 在《大转型》（1944年）一书中，波兰尼指出，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应被视为单一的人为体系，他将其称为“市场社会”。他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它所推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人们的理念从基于互利互惠和再分配转为基于效用和自利。

第二章 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我们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

·财产：人们可以拥有什么

·垄断：允许企业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

·合同：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

·破产：当买方无力支付时该怎么办

·执行：如何确保无人违背这些规则

你可能认为这类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所有权只是涉及你所创造、购买或发明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转念一想，那么奴隶呢？人类基因组呢？核弹呢？处方呢？在当今的大多数社会，人们不能拥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拥有土地、汽车、移动设备、房屋和居家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不过当前最为重要的财产是知识产权——新的设计、理念和发明。那什么才可以算是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有多长呢？

相关决定影响到公司可以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例如一家公司或者几家商行可以发展到多大，具备多大的经济实力，或者当公司对标准平台或搜索引擎的支配力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不当地限制竞争。

同样地，你可能认为交易仅仅是涉及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达成一致，属于供给和需求的问题。不过大多数社会禁止性交易，也禁止买卖

婴儿和贿选。大多数社会也不允许贩卖毒品、不安全的食品或者操弄庞氏骗局。同样，大多数的文明社会不承认也不执行人们在受胁迫或受骗时签下的合同。不过“胁迫”，甚至“受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他决定涉及未偿债务问题。大企业可以利用破产摆脱沉重的义务，不再向员工提供养老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私有房产者不能通过申请破产来减少沉重的房贷；毕业生也不能通过破产来减少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背上的沉重债务。

我们依赖于涉及如何执行此类规则的决定——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什么，检查员和检察官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谁能够参与到政府决策制定的进程中；谁有资格进行起诉；以及司法诉讼的结果是什么。

许多决定远非显而易见。一些决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例如奴隶制度），技术出现了变革（例如分子新型排序专利），或者有权影响此类决定的人员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公职人员，还有帮助他们当选的人）。

这些决定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们构成了自由市场。没有它们，就没有市场。

是什么指导着这些决定呢？规则制定者寻求达成什么目标呢？这些规则的宗旨可以是最大化效率（考虑到社会当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情况），或者经济增长（取决于谁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社会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愿意牺牲什么，例如环境污染），或者公平（取决于下列主流准则，即什么才算是公平公正的社会），或者也可以是最大化大企业和大银行的利润，以及富人的财富。

如果民主制度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民选官员、行政部门主管和法官就会大致地根据大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制定规则。正如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公平的规则选择应能够体现普通公民的观点，虽然他们并不

知道规则实施后会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相应地，“自由市场”的成果应能够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注]

如果民主制度失灵（或者从未正常运转），这些规则就可能只是扩大顶层少数富人的财富，同时让几乎所有其他人过着相对贫困、没有经济保障的生活。掌握足够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充分地影响政客、监管部门主管和法官，确保“自由市场”主要服务于他们。

这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腐败行为。在美国，有权有势的人很少直接贿赂公职官员来获取特定、有形的好处，例如有利的政府合同。他们资助竞选活动，有时承诺官员卸任后为其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他们从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回报是市场规则。这些规则表面上适用于所有人，看上去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让他们系统地、不成比例地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决定输家和赢家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政府“侵扰”市场这一不寻常、看得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组织市场。

权力和影响力隐匿于市场规则的制定进程中，而随之产生的经济成果和损失被掩饰成为“客观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不过只要我们继续执着于“自由市场”和“政府”的优劣之争，我们就不太可能看穿这一伪装。

在分析资本主义各大组成要素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政治权力是如何影响它们，以及如果我们想理解市场自由问题，为什么必须先了解是谁行使政治权力和如何行使这一权力。

---

1. 参阅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pp.102-68.

第三章 自由和权力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

对市场机制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人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永恒不变、理性的“自由市场”，并且反对政府“侵扰”市场，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拥护“自由企业”，并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画上等号，但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修改游戏规则，以便让规则有利于他们。他们颂扬自由，却不承认我们社会日益严重的权力失衡问题正侵蚀着大多数人的自由。

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认定，企业属于第一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注]最高法院裁定，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通常被称为《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违宪并被废除。[注]该法案旨在限制企业的政治宣传活动支出。

不过事实上，言论自由是表达意见的自由。当腰缠万贯的富人声音最为响亮时，大多数公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却遭到削弱。五位站在多数一方的大法官不承认大企业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权力失衡的问题。大企业广泛资助政治宣传活动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实际上，当最高法院赋予企业言论自由时，不掌握这些资源的普通民众的声音就可能被淹没。

在20世纪头十年中，最高法院同样无视权力的现实情况。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否决了旨在保护工人自由成立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法

律。在1936年的卡特尔诉卡特尔煤业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方大法官裁定认为，集体谈判“干预到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违宪行为……它剥夺了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权利”。㊟不过如果没有集体谈判，工人就不可能自由地就劳动待遇与资方展开谈判；如果他们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只能是接受支配经济的大企业所提出的条件。最高法院将“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凌驾于工人组建工会来争取更好待遇的自由之上，宪法的天平因此向有权有势的一方倾斜。虽然卡特尔案裁决结果后来被推翻了，但是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还残存于世。㊟

现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再次落入少数大公司和富人的手中，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影响规则，巩固和扩大权力，并再次打着“自由”的幌子为这些手段进行辩护。这些手段包括竞选献金节节攀升，“独立”竞选费用激增（“独立”竞选费用通常用于开展负面宣传活动，抹黑他们所反对的候选人）；在华盛顿和各州首府开展游说的能力日益增强；大批律师和有偿专家证人提起诉讼或进行辩护，推动法院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来解释法律；其他律师和专家在行政制规听证会上推进他们的议程；如果公职人员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定义或执行规则，就承诺为其提供（或者直接主动提供）报酬丰厚的私营部门工作；开展公关活动，说服公众相信他们支持的政策是正确和明智的，而他们不支持的政策是错误、存在缺陷的；智库和被资助的研究支持他们的立场；掌控或在经济上影响媒体机构，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对基于“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契约自由”“自由贸易”或者“自由言论”优势性的论点持怀疑的态度。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这些自由究竟是属于谁的？

当企业自由度更大，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时，从理论上来讲它们可以为所有人做大经济这块蛋糕。不过在最近几年，此类自由产生的多数结果是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高管和股东拿到更大份额的蛋糕，而其他

人拿到的份额则减少。另一个结果是普通工人的工作场所自由度受损。工人没有选择，只能同意公司提出的条件，由公司指定的仲裁员仲裁申诉，工人因此被迫放弃接受庭审这一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对于工人而言，所谓的契约自由只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如果一家企业监视员工上班期间的一举一动，甚至将每天上厕所的时间限制在6分钟以内，虽然它可能是自由企业的模范代表，但这样的做法无益于企业员工的自由。

虽然“自由企业”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但它们破坏环境，危害顾客和他人的健康和安全，并且欺骗投资者。尽管这些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如果被抓的风险和成本小于可能带来的好处，一些企业就会选择以身试法。在近些年，有意或无意进行如此算计的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哈利伯顿、花旗集团和通用汽车。这显示当潜在的经济回报足够大时，公司权力就会不惜侵害个人自由。

企业垄断市场的自由同样限制了消费者进行选择的自由。例如，由于美国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减少或排除竞争，所以美国互联网服务费用高于其他富裕国家。[注]美国允许医药公司为了延长产品专利，向仿制药生产商支付一笔钱，让它们推迟生产低成本的药物，[注]因此美国药品价格远高于加拿大或欧洲。我们在购买互联网服务或者药品时并没有受到胁迫；从这一狭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大多数人仍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不买。不过这只是狭隘的自由观。

同样，有人认为全球经济是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权力在决定贸易标的物和贸易方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由于所有国家的市场取决于涉及市场组织方式的政治决定，实际上“自由贸易”协议涉及复杂的谈判，以此决定不同的市场制度如何实现一体化。例如，中国和美国组织市场的方式大不相同，因此当美国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时，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增加了，关键在于中国保护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力度有多大，中国如何对待美国投资银行的资产，以及中国国有企业获准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如何。在此类

谈判中，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利益一直优先于美国普通工人的利益。相比美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或华尔街银行的金融资产而言，美国普通工人工资受保护的力度低得多。例如，美国从未要求贸易伙伴将其最低工资设定为美国普通工人中位数工资水平的一半。

从这些方面而言，如果不考虑权力问题，讨论自由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声称自己站在自由这一边，但如果他们忽视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和政治日益失衡的问题，那么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站在自由这一边，而是站在权势阶层那一边。

通过仔细研究市场的各大组成部分，情况会变得清晰明朗。

---

1.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2.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3. Carter v.Carter Coal Co.et al., 298 U.S.238 (1936), p.311.
4. 参阅 United States v.Darby, 312 U.S.100 (1941).
5. 参阅Nick Russo and Robert Morgus with Sarah Morris and Danielle Kehl, The Cost of Connectivity 2014,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at New America website, October 30, 2014.See also Claire Cain Miller, “Why the U.S.Has Fallen Behind in Internet Speed and Affordability,”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2014.
6. 参阅Valerie Paris, “Why Do Americans Spend So Much on Pharmaceuticals?” PBS NewsHour website, February 7, 2014.

第四章 新型财产

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

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上过度放牧牛群，[注]当草地为私有财产时，理性的所有人会精心料理草地，购买肥料和浇水，避免出现资源耗竭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据我了解，人们从来不会自己掏钱清洗租来的车子。

不过私有制和公有制之争模糊了涉及私有财产规则的基本决定：人们可以拥有什么，前提条件是什么，以及所有权期限为多长？一些问题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同时，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情况，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

在三个世纪之前，一个人沦为他人私有财产的现象很常见。正如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到18世纪末，世界超过3/4的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奴役，沦为他人的奴隶或农奴。在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奴隶数量超过了自由人数量。[注]

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掌控着政治权力，能够将奴隶作为某种形式的财产，这是奴隶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共和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直接反对富有的奴隶主和许多民主党人，后者主张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一种

受宪法保护的产权。[注]不过在15年内，政治和权力发生了变化。美国于1865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到19世纪末[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宣布了奴隶制违法。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如此。比如毛里塔尼亚到1981年才正式废除奴隶制。[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奴隶制。甚至在21世纪的美国，仍然有将近10万名儿童受到性奴役。[注]

除了奴隶，19世纪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土地。然而，即使土地所有权也是建立在社会准则和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在英国，贵族阶层牢牢地控制着大片土地，且代代相传；他们允许佃户进行耕种。相比之下，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从1785年的《土地法》到1862年的《宅地法》，向潜在的开拓者提供边疆土地，而不只提供给政治精英。[注]（在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边疆土地落入拥有政治势力的人手中。）不过美国白人开拓者背后也有政治势力为他们撑腰。美国政府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而美国军队与美国原住民交战，以保护开拓者的土地所有权。

在19世纪，土地价格猛涨，拥有大片土地的人无须工作，只要将土地出租出去，就会发现自己的财富大幅增加。土地价值上升的原因是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里，亨利·乔治将土地价格上涨的情况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楔子，不是从社会底部打进去，而是从社会中部穿过去。身处分裂点以上的人处境得以提升，但是身处分裂点以下的人们却遭到碾压。"[注]该书的销量达到200万册。[注]乔治在书中建议政府对土地大幅征税，依法征收土地所有人的大部分资本收益，但这一建议最终无疾而终。

随着工厂和机器的出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由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经历了新一轮的变化。在几十年内，大部分美国人不再拥有或者甚至出租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他们变成了雇员。有关财产的关键问题变为企业主的"契约自由"和工人的自由之争，即工人组织工会，从自身劳动与工厂和机器相结合所产生的收入中争取到更大份额的报酬。

现代企业和企业所有权也属于产权制度的一部分，是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特定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这些部门认为，企业投资人有权享受企业一定份额的利润；如果企业无法偿还债务，投资人除投资之外的个人财产应受到保护。这一切并非由“自由市场”所决定，而是由财产和合同规则所决定。不过下列理念并不存在于法律之中，即股东是企业唯一的所有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股东投资价值最大化。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里，企业经理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平衡投资人、员工、消费者和一般大众的诉求。事实上，大企业属于任何一个和企业业绩表现有利害关系的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蓄意收购者要求公司经理出售“不良”资产，关闭工厂，大举举债，解雇员工，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此时才出现股东至上的理念。

私有财产规则不断受到质疑，并相应地进行着调整。规则调整的幅度有时很大（废除奴隶制），但通常调整幅度非常小，因此人们除非直接参与其中，否则几乎不能察觉。有时政府规定更像是在设立产权。例如，在1978年之前，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时，会随意取消超员乘客的座位。[注]在乘客多次进行投诉之后，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负责监管航空公司）开始要求各家航空公司将每个预订座位视为乘客的财产。因此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时，不得不提供必要的好处，让超员乘客自愿放弃他们的“财产”，从而“购回”超员的座位。

对于稀缺资源，产权能够鼓励人们保护资源，并且投资开发技术，减少未来资源稀缺问题，确保有需要的人能够获得此类资源。2015年，由于天气干旱，加州几个水源地区严重缺水，于是这几个地区将水资源变成一种财产。水费取决于用水情况——一开始水价很低，能够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用水需要，之后随着用水量的增加，水价迅速上涨。此举能够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防止人们毫无顾忌地给自家游泳池换水。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整个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属于全球性稀缺资源。在理想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一种财产，其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涨。排放者可以买卖二氧化碳排放权，这样可将其用于最需要的地

方。此举还能够有力地激励排放者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找到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类产权要求政府决定采取何种产权分配方式、分配标准和交易方式。由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存在差距，如果谁出价最高，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等必需品就归谁所有，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极其不公平的。政府应监督和落实此类机制。

当财产以遗传物质片段、分子排序、千兆字节的软件代码，或者信息和理念的形式出现时，涉及界定产权的基本机制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类财产并不存在于特定空间和时间，我们无法对它进行称量或测量。它的生产成本主要是用于发现工作或者制作第一份复制品，之后的附加生产成本经常为零。不过此类知识产权是新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政府未能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即谁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拥有此类财产的哪一部分，那么新型经济就荡然无存。

在这一问题上，公地悲剧造成了令人苦恼的困境。除非发现者和发明家能够拥有他们所发现和发明的成果，并且能够通过出售或提供许可来赚钱，否则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会为之付出努力。一些人可能不求回报，只是追求新发现带来的快感或者声誉，或者让其他人能够免费使用这些新发明——许多人将自己的创作成果上传到互联网供其他人免费使用。不过免费劳动不能为他们支付房租，并且经济不能完全建立在免费劳动的基础之上，所以某种程度的产权还是有必要的。不过一旦有了新的发现或发明成果，如果公众能够全面使用它，且成本不超过复制它的成本（经常接近于零），他们就从中受益最大。当一家公司研制出的畅销药本可以让许多病人真正受益，但后者却买不起，而药品的仿制成本又非常低，凭什么这家公司能靠它赚几十亿美元呢？

政府应该赋予具有潜力的发明者足够的所有权，让他们有动力从事发明和创造，与此同时也应让公众能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使用这些发明成果。那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呢？这一问题并不涉及“自由市场”和政府之争。立法机构、法院和行政机构必须就此做出决定。

处理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是让发明者暂时拥有垄断权，且这一财产权将在一定时间后失效。宪法制定者考虑到这一问题，授权国会授予专利和版权，“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的著作和发明家的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注]不过由于他们无从知晓什么可能被发明，所以没有精确地规定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或者专利期限有多长。美国1790年通过的第一部专利法仅简单地规定：“任何实用的技艺、产品、发动机、机器和装置，以及上述各项的任何以前从未被知晓和使用过的改进”可以获得专利权，且专利权期限为14年。[注]自此以后，国会将专利保护年限延长至20年（适用于1995年后提交的专利申请），不过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如何界定“新颖和实用”。[注]专利商标局逐案进行裁决；另外一个部门则负责处理文学作品的版权事务。

人们如果对专利局的裁决结果持有异议，可以上诉至专门受理此类问题的特别法院；如果最高法院愿意审理，他们就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随着发明日趋复杂，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增加，诉讼时间也拉长了。通常，此类诉讼涉及专利所有人和竞争对手或其他人之间的法律斗争。竞争对手认为专利所有人的专利权无端地侵害了他们自身的专利，而其他人则认为不应该授予专利所有人专利权。截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雇员已近万人，大部分人在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五层楼的总部办公。[注]联邦法院设有特别上诉法院负责审理专利案件。[注]在各种专利中，软件专利占多数。大部分专利涉及技术性问题，例如哪些属于新事物或者哪些属于早已被发现的事物。一些专利申请只是介绍能够转化为软件的设想或概念。例如，亚马逊“一键下单”的概念获得了专利。[注]在2014年，苹果公司有关在电子书上提供作者签名的设想获得了专利。[注]

持久有力的产权能够激励人们进行投资和创新，不过同时也推高了消费品价格。重要的是，产权所有人手中的经济权力经常转化为政治和法律权力，这让产权保护力度更大，时间更长。

整个法律产业通过专利辩护或者专利侵权诉讼而发展起来。大型高科技公司经常聘请一批律师专门处理专利事务。在2013年，国会否决了一项提案。依据该提案，专利局可以加快复审有问题的软件专利。不过此类软件专利通常是大公司申请的，旨在对大量可能的发明提出权利要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微软等公司的说客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提案的通过。[注]

最大的几家高科技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积累专利组合，以及起诉和反诉竞争对手。例如，谷歌在2012年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公司，借此获得1.7万件专利，其中许多专利在谷歌、、苹果三家公司之间的智能手机专利大战中成为颇具价值的证据。[注]正如白宫知识产权顾问钱为德2012年所指出的，谷歌和苹果公司专利收购和诉讼费用超过了其研发费用。[注]

同样，根本问题不在于人们偏好“自由市场”还是政府，问题在于政府如何界定产权、产权界定程序包括什么，以及谁最有权力来决定最终的结果。

尽管普通美国人服用的处方药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但是美国人均药费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注]2014年，美国健康方面的费用支出达到3.1万亿美元，其中药费占到了10%。[注]政府通过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平价医疗法》所规定的补助来支付一部分药费。我们通过纳税间接地承担一部分费用，然后再通过定额手续费、自付款和保险费间接地承担剩下的费用。

美国药价居高不下，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强大的议价权进行谈判，降低价格。[注]相比之下，其他政府能够设定本国药品批发价格。不过美国药价之所以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药品获得了专利，并且在专利过期后（现在专利期限为20年），此类临时垄断权仍然继续存在。我在下文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利局和法院最初裁定天然产品不能获得专利。由于早期疫苗是利用病毒加强人体免疫力，属于天然产品，因此它们无法成为制药公司的私有财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制药公司不愿意进行投入，开展必要的研究，研制新型疫苗。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关规则发生了变化。医药公司获准申请疫苗和其他天然产品生产工艺专利。疫苗专利申请数量由此上涨了十倍，超过一万件。[注]疫苗价格不出意料地也随之猛涨。在2013年，辉瑞Prevnar13价疫苗销售额将近40亿美元。[注]Prevnar13价疫苗能够预防肺炎球菌引发的各种疾病，从耳部感染到肺炎。辉瑞是唯一一家生产这种疫苗的公司。

许多救命药在基础专利过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由一家公司继续单独生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专利局经常基于原创药无关紧要的小变化，延展药品的专利。从技术角度来讲，原创药品经过小调整后，可以被认定为新药，并且能够申请专利。专利局却没有责任来权衡它的决定会给消费者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当专利药出现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药房都不能出售仿制药。例如，森林试验室制药公司2014年2月宣布将停止出售广泛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盐酸美金刚药片，以此推销新型盐酸美金刚XR缓释胶囊。它只是将药片再制成胶囊形式[注]，但是由于这种细小变化，虽然该药片专利即将过期，但是药剂师不能替代使用这种药片的仿制药。由于此类“产品跳转”行为，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医药公司口袋中，而消费者和医疗保险公司则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许多药在其他国家属于非处方药，但到美国却变成了处方药。这些药品的专利虽然早已过期，但医药公司仍积极地进行营销，希望病人会要求医生开这些药。允许直接面向消费者投放处方药广告的发达国家不多，而美国就是其中之一。[注]

国外药店出售的药品比美国国内便宜，但如果美国人进行购买，无论是专利药和仿制药，都属于违法行为。2012年，国会授权美国海关销毁所有此类药品。此举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假药的危害。[注]不过在这之前的至少十年中，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购买处方药达数千万次，还没有出现一例美国人因使用在国外药店网购的药品而受害的报道。这一禁令的真正目的是保护美国医药公司利润不受影响。美国医药公司为此竭力进行过游说。不过真正威胁公众健康的是药品定价过高的问题[注]；据美国消费者联盟统计，2012年估计有五千万美国人没有按方抓药，其中有超过1/4的人患有慢性疾病。

依据美国法律，当医生给病人开医药公司生产的药品时，医药公司可以向医生提供报酬作为回报。在2013年5个月的时间里，医生从医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商拿到的演讲费和咨询费高达3.8亿美元。[注]有些医生一个人就能拿到50多万美元。[注]有些医生如果参与研发药品，可获得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专利权使用费。医生声称这些报酬不会影响他们开什么药。不过如果这不能给医药公司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那它们凭什么要花这么一大笔钱?

医药公司花钱让仿制药生产商推迟生产低廉的仿制药。此类所谓的有偿延迟协议是完全合法的，为原始制药商和仿制药生产商带来了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出自不得不承受更高药价的消费者、医疗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身上。医药公司这种做法让美国人每年估计多支出35亿美元。[注]欧洲则不允许有此类有偿延迟。美国主要的制药公司和仿制药生产商击退了任何试图阻止有偿延迟的努力。

医药公司声称它们需要这些额外的利润来研发新药。也许情况真是如此。但是医药公司的说辞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每年医药公司广告和营销费用支出高达数十亿美元——经常一种药品的广告宣传费用就达到数千万美元。[注]它们每年游说费用高达数亿美元。2013年，医药公司游说费用达到2.25亿美元[注]，超过美国军工合同商的游说费用。此外，医药

行业还大手笔地捐助政治竞选活动。2012年，医药行业政治献金超过3600万美元[注]，成为美国捐赠政治献金最多的行业之一。[注]

在美国，天然药品能够获得专利，药品可以基于无关紧要的变化续展专利，医药公司积极地营销处方药，消费者被禁止在国外药店购买药品，医药公司为医生提供报酬作为开特定药品的回报，以及仿制药生产商有偿延迟生产仿制药。普通美国民众并不知道存在这样的制度，也不了解哪些法律和行政决定在巩固这一制度。不过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存在这种制度，美国人均药费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键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作用：没有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专利，这将导致医药公司没有动力生产新药；问题在于政府如何组织市场。只要大型医药公司对这些决定拥有不成比例的发言权，我们就要为此花掉一大笔冤枉钱。

艺术品和音乐版权的情况也差不多。根本的困境在于创作者拥有多少著作权，才会有足够的动力继续进行创作，同时让社会能够以较低成本或免费使用他们的创作成果。通常复制这些创作成果的成本很少或者为零。不过创作者（经常是获取版权的大企业或托拉斯）胃口越来越大，经常如愿以偿。这导致它们赚的钱越来越多，而我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随着他们的利润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会扩大。

美国在建国之初，版权只涵盖“地图、海图和书籍”；它赋予作者14年独家出版作品的专有权，且该专有权能够续展一次，专有权保护期限最长可达28年。[注]在1909年，国会将版权保护期限延长到56年。这一规定执行了半个世纪。从1962年开始，国会11次立法延长版权保护期限。1976年，国会再次延长最长期限，规定保护期限为创作者终生加上逝世后50年。创作者版权自动续展。如果创作作品为公司所有，则版权保护期限为75年。（这一规定具有追溯效力[注]，所以这一新法律于1978年生效时，如果作品版权仍归公司所有，则作品版权保护期限可延长19年。）

1998年，国会将企业法人版权保护期限延长20年。自此，作品自首次出版算起版权保护期限达到了95年。在华盛顿，1998年《版权期限延长法》又被称为《米老鼠保护法》，这是因为该法案主要是因米老鼠而起。华特·迪士尼1928年创造了米老鼠这个卡通角色，所以当时依据公司版权保护期限为75年的规定，米老鼠将于2003年进入公共领域。布鲁托、高飞和其他卡通角色不久之后也将成为公共财产。这将给迪士尼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迪士尼公司为此竭力游说，说服国会将版权保护期限再延长20年。与此同时，由于时代华纳公司拥有20世纪创作的大批电影和音乐的版权，它和已故的盖希文兄弟的继承人一同进行游说。最后他们如愿以偿。现在大部分的老的版权保护期限延期到2023年失效。[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到2023年之前，版权保护期限肯定会再次得到延长。此外，现在版权涵盖包括计算机程序在内的所有创作性作品，并且版权所有人（现在主要是大企业）拥有所有衍生作品的权利。

20世纪创作的大部分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额外延长20年，这不仅包括米老鼠和其他迪士尼动画形象，还有20世纪创作的许多偶像人物形象，包括超人和至尊神探，《飘》《卡萨布兰卡》等大批优秀电影，乔治·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扬》等20世纪涌现出的伟大音乐作品，以及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家的经典文学著作。公司利润因此上升，消费者成本增加，我们的使用途径则受限。例如，在亚马逊网站出售的纸质书籍中，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数量多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免费再出版早期的作品。

由于华特·迪士尼或者盖希文兄弟不在人世，这一市场重组不可能再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在世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要在他们死后70年，而不是50年才会进入公共领域。这一市场重组能否激励他们进行创作，这值得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迪士尼许多原创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经典人物和故事，例如阿拉丁、小美人鱼和白雪公主，而这些人物和故事一直存在于公共领域。不过现在公共领域空间变得狭小得多。

虽然版权保护期限一再延长，但是企业仍咄咄逼人，不惜对簿公堂，力图扩大所有权范围，覆盖到所有可能被视为版权衍生品的作品。这提高了他们的收益和经济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给计算机程序员等创作者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些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可能与获得版权的作品过于相似。导致大玩家不惜重金，影响涉及界定市场的决定，继续保持赢家地位，而其他人则沦为输家。

总而言之，财产是市场经济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涉及下列问题的政治决定，即人们可以拥有什么，以及相关条件是什么。由于大公司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知识产权呈现出更为复杂、隐蔽的特征，大企业常常利用这些政治决定，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自身财富和影响力。赢家擅长玩这一类游戏。其他人由于缺乏影响力，也不清楚由此产生的后果，经常沦为输家。在我们激烈辩论“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个问题时，这个游戏仍在继续，并且奖金也在不断累积。

---

1.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 162, no.3859 (1968): 1243-48.
2. Adam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5), p.2.
3. 参阅 Heather Cox Richardson, To Make Men Free: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New York: Basic Books,2014), pp.6-12.
4.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p.3.
5. Constance Johnson, “Mauritania; United Nations: Plan to End Slavery Expected,”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website, March 11, 2014.
6. 参阅Shared Hope International,National Colloquium 2012 Final Report, Shared Hope International website, May 2013, p.80.
7. “Teaching with Documents: The Homestead Act of 1862,” National Archives website.
8.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25th ann.ed.(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2), p.9.
9.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25th ann.ed.(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2), p.x.
10. 参阅Julian L.Simon, “The Airline Over- sales Auction Plan: The Results,”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28, no.3 (1994): 319-23.

11. U.S.Constitution, art.I, sec.8.

12. Patent Act of 1790, 1 Stat.109-12 (1790).

13. 1793年专利法规定应为“任何新颖、实用的技艺”提供专利。Patent Act of 1793,1 Stat.318-23 (1793).

14. U.S.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 Fiscal Year 2009,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website, p.11.

15. 参阅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Courts, “Caseload Statistics 2014: Caseload Analysis,” table “Federal Circuit Filings, Percent Change Over Time,” U.S.Courts website (http://www.uscourts.gov/Statistics /FederalJudicialCaseloadStatistics/caseload-statistics-2014/caseload-analysis.aspx).另参阅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2013 Patent Litigation Stud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website, 2013, p.6.

16. Peri Hartman, Jeffrey P.Bezos, Shel Kaphan, and Joel Spiegel, Method and System for Placing a Purchase Order via a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S.Patent 5,960,411, filed September 12, 1997, and issued September 28, 1999.

17. Casey Maureen Dougherty and Melissa Breglio Hajj, Embedding an Autograph in an Electronic Book, U.S.Patent 8,880,602, filed March 23, 2012, and issued November 4, 2014.

18. 参阅Timothy B.Lee, “Software Patent Reform Just Died in the House, Thanks to IBM and Microsoft,”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0, 2013.

19. Phillip Elmer-DeWitt, “Is Google Buying Motorola for Its 24,000 Patents?” Forbes, August 15, 2011.

20. Colleen Chien, “Reforming Software Patents,” Houston Law Review 50, no.2 (2012): 323-88.

21. OECD, Health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2013), pp.160-61.另参阅 Valerie Paris, “Why Do Americans Spend So Much on Pharmaceuticals?” PBS NewsHour website, February 7, 2014.

2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ealth, United States, 2013: With Special Feature on Prescription Drug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website, 2014, tables 112 and 114.

23. Robert Pear, “Bill to Let Medicare Negotiate Drug Prices Is Blocked,”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7.

24. Elisabeth Rosenthal, “The Price of Prevention: Vaccine Costs Are Soaring,”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4.

25. Elisabeth Rosenthal, “The Price of Prevention: Vaccine Costs Are Soaring,”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4.

26. Ed Silverman, “Actavis Is Ordered to Continue Selling the Namenda Alzheimer's Pill,”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1, 2014.

27. C.Lee Ventola, “Direct-to-Consumer Pharmaceutical Advertising: Therapeutic or Toxic?” Pharmacy & Therapeutics 36, no.10 (2011): 669-84.

28.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afety and Innovation Act (FDASIA),” 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ebsite.

29. Sara R.Collins, Ruth Robertson, Tracy Garber, and Michelle M.Doty, Insuring the Future: Current Trends in Health Coverage and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Commonwealth Fund website, April 2013, pp.9-10.

30. Katie Thomas, Agustin Armendariz,and Sarah Cohen, “Detailing Financial Links of Doctors and Drug Mak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4.

31. Katie Thomas, Agustin Armendariz,and Sarah Cohen, “Detailing Financial Links of Doctors and Drug Mak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4.

32. “Pay-for-Delay: When Drug Companies Agree Not to Compet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ebsite.

33. Marc-André Gagnon and Joel Lexchin, “The Cost of Pushing Pills: A New Estimate of Pharmaceutical Promotion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LoS Med 5, no.1 (2008): 0029-0033.

3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bying: Pharmaceuticals/Health Products: Industry Profile: Summary, 2013,”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indusclient.php?id=H04&year=2013).

3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Pharmaceuticals/Health Products Summary,”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indus.php?cycle=2014&ind=H04).

36. 在扣除物价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直接政治献金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大幅增加，但与企业用于游说、诉讼和寻求影响决策制定者的经费相比要少得多。不过与企业从中获得的好处相比，这些费用只能算九牛一毛。这是因为企业只需花该花的钱，就能达成目标。随着抗衡力量日渐式微，企业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得偿所愿。我将在后面的篇章介绍抗衡力量。

37. Copyright Act of 1790, 1 Stat.124 (1790).

38. 欲了解美国版权史，参阅“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History,” U.S.Copyright Office website.

39. 欲了解迪士尼案，参阅Timothy B.Lee, “15 Years Ago, Congress Kept Mickey Mouse out of the Public Domain.Will They Do It Agai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5, 2013.

第五章 新型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第二大组成部分，它和产权密不可分。商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才有动力冒险创业。如果随便一家竞争企业能够毫不费力、迅速地夺走对手的竞争优势，那么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进行投资。商人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才算合适呢？这个问题与产权规则（包括知识产权规则）相似，都涉及权衡问题。商人获取到强大的市场势力，才会有强大的动力进行投资和创新，但同时也会提高消费者价格。这种势力也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进一步扭曲市场，使之有利于拥有市场势力的人。“最佳”的权衡是什么样的呢？此类决定通常淹没在反托拉斯法和反垄断法当中。这些法律由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检察官和法院负责解释。

根本问题不在于如何在“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理论上的抉择。政府必须决定一家公司或几家公司所掌握的市场势力是否“过度”。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出此类决定以及如何对它们施加影响。许多公司通过下列方式，实现对经济领域的支配：扩大知识产权范畴；扩大自然垄断行业所有权（在这些行业，实现规模经济非常关键）；与同一市场的其他公司进行合并或收购它们；控制成为行业标准的网络和平台；或者利用许可协议提升自身支配和控制地位。与此同时，它们凭借这一经济权力，进一步影响政府有关是否允许此类做法的决定。

这一切掣肘着小公司的发展。传统观念认为美国经济拥有众多具有创新力的小公司，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知识产权、网络效应、自然垄断、高昂的研发成本、负责起诉潜在对手的律师军团，以及大批说客等因素给新进入者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近几年美国新公司成立速度明显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5月发布的研究报

告，在1978~2011年，随着新的企业巨头控制市场，这一速度减半。[注]这一下滑趋势超越了商业周期。[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扩张，以及2001年和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似乎对这一下行趋势没有任何影响。[注]此外，这一趋势也不受哪个党派入主白宫或控制国会的影响（见图5.1）。

不过新的企业巨头无法确保自己能够维持支配地位。新进入者可以凭借更好的理念，蚕食企业巨头的市场。而企业巨头可能会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前收购新进入者。反垄断执法者如果积极有为，也许可以胜诉，迫使企业巨头放弃市场份额。不过企业巨头的律师军团会阻止执法者的进攻，此外它的议员盟友可能从一开始就不鼓励执法者发起进攻。企业巨头更有可能面临来自试图抢占市场的其他巨头的威胁。

新企业巨头得心应手地利用企业利润来巩固自身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获得稳固的地位。它们一边为“自由市场”欢呼叫好，一边忙于塑造市场，使之有利于自己。它们主宰着新型经济，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普通美国民众。



图5.1 美国经济创业活动持续减少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商业动态统计

到2014年，美国一些宽带服务的资费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网速最慢。美国平均互联网连接速度峰值比中国香港或韩国低了近40%。注美国许多低收入家庭付不起网费，没有安装高速网络。注大多数美国人上网只能依赖本地宽带垄断企业，网费非常高，但网络服务质量非常糟糕。注有线网络公司铺设的有线网络速度远低于光纤。在光纤连接方面，美国落后于瑞典、爱沙尼亚、韩国、中国香港、日本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注在全球互联网连接速度和资费方面，美国分别排在第28和23位。

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所有居民家里都装有高速网，每月资费仅为28美元。斯德哥尔摩市铺设光纤网络，将光纤出租给多家私人运营商。

此举带来了运营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低廉的网费，以及覆盖全民的网络服务。这一工程很快便收回了成本，并且到2014年初为该市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注]

是谁阻碍着美国各个城市这样做呢？答案是有线网络运营商。它们财大气粗，颇具政治影响力，是新型垄断商的典型代表。它们每年向各个城市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视频营业执照费，来维持自身垄断地位。此外，它们还向说客和律师支付数百万美元，确保这些城市不会背离它们。它们成功地推动20个州通过法律，禁止各个城市铺设光纤。[注]2011年，全球最大的有线网络公司自由全球公司的董事长约翰·马龙承认，在美国大容量数据连接领域，“有线网络基本是垄断”。[注]事实上，到2014年，80%以上的美国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依赖一家有线网络公司来获得互联网大容量有线数据连接服务。[注]所有的有线网络公司没有真正的竞争压力，因此没有动力投资铺设光纤网络，或者让消费者享受规模经济效益带来的低廉网络服务。[注]

只有田纳西州的查特努加市逆势而为，铺设了光纤网络。幸运的查特努加市民能在一分钟之内下载一部时长两小时的电影，而普通高速宽带网络则需要近半个小时才能下载完毕。不过有线运营商进行了反击。到2014年，康卡斯特两次针对这一市政公用设施提起诉讼，并且耗资数百万美元开展公关活动，试图抹黑这一公共运营服务。[注]康卡斯特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有线网络运营商。

问题同样不在于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无论是谁，只要铺设了有线网络，就能够拥有垄断权，而其他人不会有经济动力来铺设新的有线网络。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垄断是有组织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斯德哥尔摩市推动了私营部门的竞争。康卡斯特和其他美国有线网络公司面临的竞争很少或根本没有。[注]它们正进一步巩固手中的权力。有线宽带最终可能会面临竞争对手，例如电话公司提供的升级DSL（数字用户线路）服务、下一代无线网络，以及类似于谷歌在一些城市推出的超高

速光纤网络。但人们不可能很快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多数城市缺乏资金和专门的技术来铺设谷歌推出的超高速光纤。简而言之，目前有线网络是许多城市唯一的选择，而有线网络运营商希望保持这一现状。

康卡斯特和其他有线网络运营商每年游说和捐助竞选活动的经费高达数百万美元（在2014年，在所有企业和组织中，康卡斯特的游说经费和竞选献金分别位列第13和28位）。它们还为做出相关市场决定的官员提供工作。2002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在离职后成为有线行业游说组织的负责人。[注]（美国全国有线和电信协会2014年的游说活动经费排名第12位。[注]）

康卡斯特也是华盛顿最大的“旋转门”之一。2014年，康卡斯特共聘请了126名说客，其中104人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注]例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梅雷迪斯·阿特维尔·贝克尔2011年投票批准康卡斯特收购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案，在4个月后加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她之后效力于无线通信行业游说组织）。[注]康卡斯特公司专职说客包括多名两党参众议员的前幕僚长，以及一位联邦通信委员会前委员。[注]

我并不是说有谁存在违法行为。相反，首席执行官们认为，他们应该实现股东回报的最大化；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需要尽可能地玩好政治游戏，并且派出最佳的法律和游说团队上场应战。贸易协会认为自己代表着企业会员的最佳利益，这就需要它们开展激烈的游说工作，为言听计从的议员尽可能多地筹集竞选经费，甚至向前政府官员提供工作。政府官员认为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公众利益。不过通常在他们看来，公众利益源自与他们打交道的有组织利益集团所达成的共识。游说组织越大、财力越雄厚，它们所聘请的律师和专家更有能力主张什么最符合公众利益。如果官员曾经为游说组织效力，或者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会为它们效力，那么他们会倾向于认同它们的观点，觉得特别有说服力。

在“自由市场”机制内部，新型垄断者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相互依

存、相辅相成。

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公司掌握着美国农民种植的90%以上的大豆和80%的玉米的基因特征。[注]它精心谋划运作，逐渐取得垄断地位。它为自己研发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申请专利，其研发的除草剂只会杀死野草，不会影响转基因种子长出的大豆和玉米。除草剂和抗除草剂种子一开始给农民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不过农民购买孟山都产品时会遇到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在未来将困扰着他们，即农民如果想购买具有该类基因特征的玉米或大豆种子，则只能去孟山都公司购买。此外，即使农民种子有富余，他们也必须同意不会保留下来，用于以后进行种植。换句话说，一旦被套牢，农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得永远购买孟山都的种子。为了确保它的支配地位，孟山都阻止种子经销商向它的竞争对手进货，并且收购了大多数的小型种子公司。[注]

不出人们所料，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美国大多数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开始依赖孟山都。[注]由此出现的一个后果是种子价格越来越高，甚至远超生活成本上涨速度。自2001年以来，孟山都玉米和大豆种子的价格翻了不止一番。在1994~2011年，平均每英亩[注]的大豆种植成本增加了325%，而玉米种子的价格上涨了259%。[注]另外一个后果是我们所依赖的种子基因多样性急剧减少。这导致下列风险增加，即当出现病害或气候变化，多年的作物可能遭到彻底摧毁。[注]第三个后果是转基因食物泛滥。[注]

孟山都步步为营，凭借日益强大的经济权力，扩大政治权力，推动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经济权力。孟山都一开始利用1970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法》作为法律武器，并开展一系列的诉讼，加大了对转基因种子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注]国会和多个州屡次努力，试图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或者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孟山都成功地挫败了它们这一努力。[注]孟山都利用自己在华盛顿的政治势

力，击退其他国家禁止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努力。

为了巩固和确保自身的支配地位，孟山都雇用了一大批律师。这一律师军团负责起诉侵犯专利的其他公司和希望保留种子用于来年种植的农民。[注]孟山都的律师还阻止独立科学家研究它的种子，称此类研究侵犯了公司专利。[注]你可能认为孟山都拥有势不可当的市场势力，这会让它成为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调查目标。情况却并非如此。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曾就该公司支配种子行业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但在2012年，孟山都成功地终结了这一调查工作。[注]

孟山都的游说经费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它2013年游说经费将近700万美元。[注]此外，孟山都前员工（和未来的员工）常常把持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农业部高层领导位子，或者效力于负责农业政策事务的国会委员会，或者担任国会领袖和白宫的顾问。[注]孟山都两位说客分别是前众议员维克·法齐奥和前参议员布兰奇·林肯。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一度是孟山都公司的律师。孟山都和其他垄断势力一样，战略性地利用自身经济权力来获取政治权力，然后再利用它的政治权力来巩固市场势力。

我们可以认为新型垄断者这一策略是将经济和政治控制一体化。他们获取关键性专利，然后不惜重金保护这些专利，并且控告其他人侵犯专利权。此外，他们通过强制性许可协议，要求潜在的竞争对手使用他们的全线产品，并且阻挠消费者使用竞争对手的产品，从而建立事实上的行业标准。有了有利的法庭判决和法律，以及不起诉他们违反反托拉斯法或允许他们起诉竞争对手的行政决定，此类事实标准得以推广应用于经济多个行业。

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高科技行业，这样的案例很多。谷歌、苹果、脸书、推特、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几家公司积极地开发专利系统，这些系统成为世界标准和网络平台。用户越多，

标准或平台的用处越大。当标准或平台用户达到足够数量时，其他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这一标准或平台。

例如，如果你使用苹果公司日趋流行的iPhone或者其他硬件产品，你就得接受它的软件。尽管其他开发者的应用程序可以在苹果设备上运行，但是苹果公司自带软件经常运行得更为流畅。谷歌公司的Chrome浏览器在苹果硬件产品上运行的速度不如苹果自带免费浏览器Safari。Safari是苹果硬件产品唯一默认的浏览器。这是因为苹果公司不让其他软件开发者使用运行苹果软件的Nitro Java Script加速引擎。苹果公司表示希望确保顾客获得无缝体验，因此它的软件和硬件完美地融为一体。[注]更有可能的是，苹果希望全面进行控制，确保它的软件能够像iPhone及其他苹果硬件产品一样，成为顾客心目中的一种标准。

在20世纪90年代，联邦政府指控微软公司为了建立事实上的行业标准，非法捆绑出售Windows操作系统和IE浏览器。（微软公司就此案达成了和解，同意与其他公司共享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注]）那么政府是不是同样会起诉苹果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严格来讲，苹果公司确实允许其他公司开发的软件在它的硬件产品上运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苹果公司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军团，愿意不惜代价来打赢官司。和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公司一样，苹果在华盛顿派驻了一大批说客，这可不是偶然的事情。（据政治响应中心表示，在2013年，苹果公司游说费用达到1.049千万美元；亚马逊公司为345.6万美元；脸书为643万美元；微软为1.049千万美元；谷歌为1.58千万美元。[注]到2014年，谷歌是美国游说总支出最多的企业。）

在201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竞争局职员提交了一份长达160页的报告，分析谷歌支配搜索市场的情况，认定“谷歌的行为……将对顾客和创新造成实质性伤害”[注]，并建议对谷歌进行起诉。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不接受职员建议报告的情况非常罕见，但这次委员们决定拒绝起诉谷歌。他们没有解释不起诉谷歌的理由，不过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谷歌的政

治影响力与日俱增。[注]相比之下，欧盟反托拉斯监管部门在2015年对谷歌提起诉讼。

一家公司只要拥有标准化平台，利润自然滚滚而来，例如苹果的移动硬件产品和相关软件、谷歌的搜索引擎和内容、推特的推文、脸书的人际关系网、亚马逊的购物平台和阿里巴巴的贸易平台。当然，标准化平台有时能方便创新者推出应用程序、书籍、视频，或者他们希望展示的任何其他内容。不过最终获得实权和利润的是标准化平台所有人，而不是使用平台的创新者。随着平台所有人获取越来越多的权力和利润，依赖于平台的创新者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来越少，无法为自己所做出的贡献争取到不错的回报。随着新型垄断者产品销售数量的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到几乎为零，它们能够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或者收购对手），几乎完全控制市场，从而获取利润以及法律和政治影响力。

此类网络效应为少数几家巨型企业带来了种种好处。它们的网络规模越大，搜集的数据越多，最终它们的效率就越高，权力也越大。消费者可能满足于这样的结果，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垄断企业扼杀了多少创新或者从中作梗，他们花了多少冤枉钱，以及游戏规则如何朝着有利于标准平台所有人的方向转变。

例如，到2014年，大部分美国人想了解新闻资讯时，选择访问的第一站是谷歌和脸书；[注]美国知名新闻机构的互联网访问流量已经低于50%，这包括全国新闻报纸、网络电视和新闻采集机构。媒体公司成立的时间越晚，它越有可能依赖于谷歌或脸书的平台来吸引观众或读者。[注]Buzzfeed网站就是一个例子。谷歌和脸书对这些网站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美国近1/3的消费者购物时选择的第一站是亚马逊。[注]尽管在过去十年网站数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网页访问量却日益集中在几家网站。2001年，前十家网站网页访问量占到美国所有网页访问量的31%。到了2010年，前十家网站网页访问量占到了75%。[注]权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美国图书市场，亚马逊公司销售份额占据半壁江山。2014年，亚马逊推迟或停止配送美国第四大出版商阿歇特公司出版的图书，原因是它希望阿歇特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据称亚马逊希望从电子书销售收入中抽取50%的分成，而不是30%）。[注]亚马逊称这很公平[注]：阿歇特在美国市场出售的电子书有60%是通过亚马逊销售的，而且阿歇特的电子书销售收入高于实体书，所以为什么亚马逊不能从中获得应有的分成呢？不过亚马逊对整个图书出版业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为了让2007年推出的Kindle电子书阅读器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它愿意在出售图书时受点损失。当亚马逊在图书出版市场占据足够大的份额时，它会像对待阿歇特那样，向其他人开列条件。最终，亚马逊允许阿歇特自行对电子书定价，但亚马逊向图书出版行业证明，如果出版商不合作，它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手中的权力对付它们。[注]鲍德斯等多家大型图书零售商早已破产，巴诺书店岌岌可危，并且数千家小书店已经倒闭。[注]亚马逊公司同样也在出版图书。那么在多久之后亚马逊会让出版商也倒闭呢？亚马逊公司会在多少年后拥有庞大的云端电子图书馆，提供电子书下载，来取代实体书呢？换句话说，在多久之后亚马逊将掌握足够的权力，并能够滥用这一权力呢？

毫无疑问，亚马逊能让消费者省钱，并享受网购带来的便利。亚马逊的平台允许更多的作家直接面向读者营销自己的作品。不过亚马逊在推动书商和出版社走向消亡，进一步巩固对作家等其他行为主体的经济影响力。如果作家不接受亚马逊开出的条件，他们就没有多少其他渠道向潜在读者推销自己的作品。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亚马逊最终将会限制思想市场，就像谷歌和脸书禁锢新闻市场一样——这与孟山都种子产品导致我们食物供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情形异曲同工。

此外，随着亚马逊经济权力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扩大。政府需要决定如何组织市场，而亚马逊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市场规则。在2012年，亚马逊背地里推动司法部起诉五家大型出版商和苹果公司非法共谋提高电子书价格。不过在2014年，司法部并没有质疑亚马逊

强迫出版商提高抽成的做法。（也许这纯属意外，但《纽约时报》数码博客2014年9月报道称两本在亚马逊出售的书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一本是丹尼尔·舒尔曼的《威奇托之子》，书中讲述科赫兄弟的故事；另一本是共和党议员保罗·瑞恩所著的《前进之路》，瑞恩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亚马逊表示，可在两日内配送瑞恩的书，而《威奇托之子》需要2~3周才能送达读者手中。[注]）其他国家出台法律保护书店和出版商。例如，在法国，书商出售新书时折扣力度不得超过标价的5%，所以在法国，读者在实体店购书的价格，甚至是网购价格和图书实际标价差不多。[注]法国政府将图书和水电、面包一同列为“必需品”。[注]

美国正奔向由亚马逊塑造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市场。亚马逊公司年度游说经费从2008年的130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50万美元，以及2014年的400万美元。[注]在2013年，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购了受人尊重的《华盛顿邮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在华盛顿的势力。[注]

老式垄断企业控制着生产，新型垄断公司则控制着网络。老式垄断企业常常因为反托拉斯法四分五裂。但是新型垄断公司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豁免于反托拉斯法。

到2014年，华尔街五家最大的银行拥有美国约45%的银行资产，而在2000年这一比重约为25%。[注]它们手握大权决定公司能否公开上市，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参与美国国内所有大型并购案和海外众多大型并购案，并且负责大部分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复杂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提供最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和奖金，吸引顶级人才。它们管理着最大的资金池，并有效地控制着金融业。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金融业增长速度最快。在1980~2014年，金融行业增长速度为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6倍。[注]

在金融业，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相互滋养。当大银行支配整个金融业时，它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也日益扩大。它们是两党候选人竞选筹款的

重要来源。据无党派组织“政治响应中心”表示，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金融业向巴拉克·奥巴马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慷慨捐款，在所有捐款行业组织中排名第四位。[注]奥巴马从华尔街筹集到约1660万美元的捐款，远超过他的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筹集到的930万美元捐款。[注]高盛公司员工积极为奥巴马竞选活动捐款，比其他任何公司都要多。[注]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华尔街捐款主要流向米特·罗姆尼阵营。[注]

华尔街还向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关键的经济职位输送人才，并且在经济官员卸任后为他们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罗伯特·鲁宾和小亨利·保尔森分别出任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财政部长一职之前，都曾担任高盛公司董事长一职。[注]鲁宾离任后重返华尔街工作。他钦点蒂莫西·盖特纳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后者后来在救助华尔街期间，曾出任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离职后重返华尔街。[注]多年来，众议院前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埃里克·坎托一直是最为坚定地支持华尔街的国会议员之一。作为负责监管华尔街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成员，他力争救助华尔街，保留华尔街所享受的有利税率和补助，并且让《多德-弗兰克法案》效力大打折扣。[注]2014年，坎托从众议院辞职，两周后于9月加入华尔街投资银行美驰银行，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一开始的薪酬为40万美元的底薪、40万美元的初期现金分红和100万美元的股票。[注]坎托将负责美驰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他的工作可能是为国会议员大开方便之门，延续美驰银行慷慨对待议员的做法[注]。坎托解释说：“我认识肯（美驰银行首席执行官）有一段时间了，并且……一直关注美驰银行的发展和成功。”[注]情况确实如此。他们曾一起经商多年。从华盛顿通往华尔街这条行迹斑驳的道路从未如此清晰；华盛顿和华尔街相互迎合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从未如此显而易见。

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防止大银行过度冒险的行为。但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中，几家最大的银行成功说服国会和总统废除多项法律规定，从而得以发展壮大，获

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冒险行事，引发了2008年股市大崩盘事件。之后，美国纳税人为他们提供紧急救助，这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他们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能够让任何旨在防止未来爆发危机的新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大公司为了攫取更多利润而沆瀣一气。例如，在2014年，三家领先的私募公司KKR集团、黑石集团和德州太平洋集团同意向政府支付总额为3.25亿美元的罚款，终结有关他们合谋压低被收购公司股价的指控。[注]有证据显示，当黑石集团有意收购一家公司时，集团总裁汉米尔顿E.詹姆斯写邮件给KKR的乔治·罗伯斯说，“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而不是和你们作对。如果我们合作，将势不可当；但如果我们作对，双方都会损失一大笔钱。”[注]罗伯斯回复说：“同意。”

要找一个金融业大规模串通勾结的案例，就想想所谓的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政府对这桩丑闻的调查仍在继续。LIBOR是世界数万亿美元贷款的基准利率。[注]它是几家大银行借贷利率报价的平均值。有证据显示，银行业者通过操纵LIBOR，利用内幕信息，在全球金融市场这一赌场中下注。[注]一开始总部设在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成为丑闻的焦点，但巴克莱银行不可能独力操纵LIBOR。[注]事实上，巴克莱银行辩护称，所有大银行出于同样原因，以同样的方式操纵LIBOR。

华尔街的新型垄断者为了一己之利操纵金融市场，而为此埋单的还是我们。

美国医疗保健业占到经济近1/5的份额。[注]在这一行业，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美国筹划推出《平价医疗法》之前，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医院系统早已合并成日益庞大的实体。多年来，保险公司精心构建了牢固的政治关系网。1945年，它们设法说服国会赋予它们反托拉斯法豁免权，允许他们操纵价格，瓜分市场，并且合谋制定有利于自

己的投保条款，不过这一切是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上，即他们同意接受州保险业监理专员的监管。(注)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发展壮大，摆脱了州政府的监管；它们合并成几家全国性大公司，跨州经营。这让它们在华盛顿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在合并后，保险公司在医疗报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议价权。面对这一情况，医院开始合并为巨型医院系统，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医疗报销。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医疗保健费用节节升高，而可供人们选择的医院越来越少。1992年，美国中等城市有四家医院；到2014年仅剩两家医院。

合并让医院和保险公司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等到了国会考虑《平价医疗法案》时，医院和保险公司在华盛顿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该法案能够提高大保险公司和巨型医院系统的利润。它们愿意支持这一法案，但前提条件是所有人必须购买保险，并且不能为人们提供“公立医疗保险选项”，来选择类似于医疗保险的公共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这为它们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为此埋单。

反托拉斯法有效地制约着垄断公司，那今天它为什么未能有效地制约新型垄断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忘记了反托拉斯法的初衷是防止大型经济权力集合体获取过度的政治影响力。

市场需要规则来决定经济权力在不伤害到市场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到何种程度。不过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它取决于如何权衡大企业带来的效率及其提价能力；平衡通用平台和标准带来的创新与它们扼制其他人创新的能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合理地分配经济权力。

它还取决于一些更为基础的问题，即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对民选官员，以及他们任命或批准的检察官、总检察长和法官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些官员又是如何影响涉及市场规则的决定。

现在我们已不再讨论这一问题，不过在19世纪末，人们非常关注经济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当时国会通过了美国首部反托斯法。正如我所提到的，经济学领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将会侵蚀政治和经济领域。19世纪末是“强盗大亨”的时代，其中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和考尼列斯·范德比尔特。他们的钢厂、石油钻塔、炼油厂和铁路为美国工业实力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把威胁到自身支配地位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且践踏民主。他们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来竞选公职，并且肆无忌惮地贿赂公职官员，甚至指使手下人提着一袋袋的钱，直接贿赂言听计从的议员。范德比尔特曾咆哮道：“我干吗要在乎法律？难道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注”这话让他名誉扫地。1868~1896年，在政府内阁任职的73人中，有48人曾为铁路公司游说过，效力于铁路公司，任职于铁路公司董事会，或者其亲戚和铁路公司有关系。注

当时被称为“托拉斯”的联合企业手握经济和政治大权，公众为此感到担忧。1873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G.瑞恩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警告指出，“我们国家的企业正合并成大型联合公司。它们掌握着不可比拟的资本，放肆地追逐政治权力，而不是力求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谁将统治美国——财富还是人；什么将指引美国——金钱还是才智；谁将担任公职——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爱国人士，还是公司资本的封建农奴？’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充分地考虑这一问题。不过人们将会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你们这一代已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了。注”

公众清楚地认识到，未受制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两种相生相伴的危险。华尔街充当着黏合剂。平民派注改革家玛丽·利斯在1890年代表农场主联盟讲话时指责道：“我们的国家成为华尔街的私有财产。我们政府不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而是为华尔街所有、由华尔街治理和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注反托拉斯法旨在切断新型联合企业经济

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恶魔般的联系。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广受好评的《财富与国民的对立》（1894年）中写道：“自由创造了财富，但财富反过来摧毁了自由。新经济发展的火焰包围着我们；我们转身发现竞争谋杀了竞争，企业发展壮大，比国家还要强大……我们时代赤裸裸的问题在于财产反仆为主。”[注]

1890年，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敦促他的国会同僚采取行动，解决产业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这一问题威胁到了美国。当时他并没有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区分开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被视为不可区分。谢尔曼大声疾呼，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掌握政治权力的国王，那我们也不应容忍控制任何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国王的存在。”[注]

面对美国民众敦促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参议院以52票对1票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众议院很快全票通过，最后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于1890年7月2日签署批准这一法案。[注]不过在早期，该法律沦为打击劳工组织的工具；保守的检察官和法官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解释为禁止工会。我在后文中将介绍相关的情况。不过随着美国于1901年进入进步主义时代，总统愿意运用谢尔曼法切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泰德·罗斯福总统指责“罪恶的大富豪”“根本不在乎工人和国家的生死。他们剥削工人，并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注]他动用这一法律对付铁路大王E·H.哈里曼的北方证券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当时支配着西北地区运输业。正如罗斯福后来所回忆的，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旨在提醒所有人，统治美利坚合众国的是政府，而不是哈里曼家族”。[注]杜邦和美国烟草公司同样也遭遇反托拉斯诉讼。[注]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于1911年拆分了洛克菲勒庞大的标准石油帝国。[注]在1913年出版的《新自由》一书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用类似的措辞解释了过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危险的关联：“我不指望垄断势力能够自我制约。在这个国家，如果有谁强大到足以掌控美国政府，那他们肯定会

这样做。”[注]

不过在随后的年代，反托拉斯工作的重心不再是制约政治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执政的总统均为共和党人。他们仰仗美国最大企业的捐款，因此并不是特别担忧经济组合体强大到足以掌控美国政府。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即便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鼓励企业开展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时他任命瑟尔曼·阿诺德主管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阿诺德启动了反托拉斯诉讼的圆锯）。在“二战”之后，反托拉斯工作的重心基本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也就是防止大公司或联合公司拥有足够的市场势力，设定过高的价格。AT&T贝尔系统垄断巨头于1984年被拆分重组，但原因不是它掌握令人生畏的政治和法律影响力，而是政府认为它不利于竞争，并且定价过高。[注]

现在我们身处新的镀金时代，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情况和第一个镀金时代相似。当时美国颁布了多部反托拉斯法。当前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其政治效应的重要性不亚于当时；现代反托拉斯工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这肯定与经济权力的运行有关。在新的镀金时代，我们应提醒自己美国首部反托拉斯法的中心指导目标是什么，并且同样勇敢地运用这一法律。

---

1. Ian Hathaway and Robert E.Lita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p.1.

2. Ian Hathaway and Robert E.Lita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p.1.

3. Ian Hathaway and Robert E.Lita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p.1.图5.1.

4. Akamai Technologies, Akamai's State of the Internet, Akamai Technologies website, 2014, figures 12 and 22.

5. 2013年，仅有52%的家庭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家庭装有宽带，而在家庭收入达到或超过7.5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达到91%。Pew Research Internet Project, “Broadband

Technology Fact Sheet,”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data from 2013.

6. 参阅Susan Crawford, Captive Audience: The Telecom Industry and Monopoly Power in the New Gilded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5.

7. 欲了解网速，参阅“Global Broadband: Household Download Index,” Ookla website.欲了解资费, see “OECD Broadband Portal,” section 4.01, “Range of Broadband Prices per Megabit per Second of Advertised Speed,” OECD website, figure 7.17.

8. Susan Crawford,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in Fiber Optics,”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14.

9. Allan Holmes, “How Big Telecom Smothers City-Run Broadband,”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website, August 28, 2014, updated September 15, 2014.

10. David Lieberman, “Liberty Media's John Malone Says Cable Is ‘Pretty Much a Monopoly' in Broadband,” Deadline Hollywood, May 6, 2011.

11. Prepared remarks of FCC chairman Tom Wheeler, “The Facts and Future of Broadband Competition,” 1776 Headquarter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4, 2014.

12. Susan Crawford, “Let America's Cities Provide Broadband to Their Citizens,” Bloomberg View, February 14, 2012.

13. Stephen Seufert, “Chattanooga v.Kabletown,” Philly.com, June 29, 2014.

1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bying: Lobbying: Top Spenders, 2014.” 另参阅“Comcast Corp.: Profile for 2014 Election Cycle,”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orgs/summary.php?id=D000000461&lname= Com cast+Corp).

15. 参阅“Michael Powell,” National Cabl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 tion website.

1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bying: Lobbying: Top Spenders, 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indexType=s&showYear=2014).

1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mcast Corp.: Lobbyists Representing Comcast Corp., 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 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lbs.php?id=D000000461&year=2014).

18. “Tying Up the Cable Business,” The Economist,October 4, 2014.

19. 参阅Alex Rogers, “Comcast Has About 76 Lobbyists Working Washington on the Time-Warner Cable Merger.This Is Why,” Time, April 29, 2014.

20. Food and Water Watch, Monsanto: A Corporate Profile, Food and Water Watch website, April 2013.

21. 欲了解孟山都种子相关情况，参阅Donald L.Barlett and James B.Steele, “Monsanto's

Harvest of Fear,” Vanity Fair, May 2008.

22. 欲了解孟山都种子相关情况，参阅Donald L.Barlett and James B.Steele, “Monsanto's Harvest of Fear,” Vanity Fair, May 2008.

23. 1英亩约等于40.5公亩。——编者注

24. 参阅 Center for Food Safety & Save Our Seeds, Seed Giants v.U.S.Farmers, Center for Food Safety website, 2013.另参阅Rachel Tepper, “Seed Giants Sue U.S.Farmers over Genetically Modified Seed Patents in Shocking Numbers: Report,”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3,2013.

25. Richard Schiffman, “Seeds of the Future,” Truthout website, December 4, 2014.另参阅Center for Food Safety & Save Our Seeds,Seed Giants v.U.S.Farmers.

26. Center for Food Safety & Save Our Seeds, Seed Giants v.U.S.Farmers, p.5.

27. Kristina Hubbard, “Monsanto's Growing Monopoly,” Salon, May 30, 2013.

28. Mina Nasseri and Daniel J.Herling, “Ho Ho Ho GMO! The 2014 GMO Legislation Scorecard,” National Law Review, December 23, 2014.另参阅 Connor Adams Sheets, “GMO Labeling Debate Headed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December 4, 2014.

29. 参阅Barlett and Steele, “Monsanto's Harvest of Fear”.

30. 参阅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Eight Ways Monsanto Fails a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o.7, “Suppressing Research,”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website.

31. 参阅Monsanto, “Monsanto Notified That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Concluded Its Inquiry,” Monsanto website, November 16, 2012.另参阅Tom Philpott, “DOJ Mysteriously Quits Monsanto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Mother Jones, December 1, 2012.

32.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Agricultural Services/Products: Summary,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 www.opensecrets.org/lobby/indusclient.php?id=A07&year=2012).

33. 参阅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Monsanto Co.: Lobbyists Representing Monsanto Co., 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lbs.php?id=D000000055&year=2014), 和Janie Boschma, “Monsanto: Big Guy on the Block When It Comes to Friends in Washington,” OpenSecrets.org website, February 19, 2013.另参阅Food and Water Watch, Monsanto: A Corporate Profile, figure 3, p.10, and Janice Person, “I Heard Monsanto Employees Control USDA, FDA, etc.,” Beyond the Rows blog, February 15, 2012.

34. 苹果公司称它的“商业战略是利用它独特的能力，设计和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硬件、应用软件和服务，为客户提供设计创新、操作超级简易和无缝整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参阅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pple Inc.Proxy Statement, part 1, item 1,

"Business Strategy," p.1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 /AAPL/3750879716x0x789040/ed3853da-2e3f-448d-adb4-34816c375f5d/2014_Form_10_K_As_Filed.PDF).

35. United States v.Microsoft Corporation, U.S.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vil action no.98-1232 (CKK), 2002.

3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lient Profiles: Summary, 2013," for Apple, Amazon, Facebook, Microsoft, and Google, and "Influence and Lobbying: Lobbying: Top Spenders, 2013,"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showYear=2013&indexType=s).

37. Brody Mullins, Rolfe Winkler, and Brent Kendall, "Inside the U.S.Antitrust Probe of Googl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2015.

38. Tom Hamburger and Matea Gold, "Google, Once Disdainful of Lobbying, Now a Master of Washington Influence,"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14.

39. 可参阅Frédéric Filloux, "Do the Media Really Have an Alternative to Distribution via Face- book and Google?" Quartz, October 20, 2014.

40. 可参阅Frédéric Filloux, "Do the Media Really Have an Alternative to Distribution via Face- book and Google?" Quartz, October 20, 2014.

41. "Fifty Favorite Retailers (2013),"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website.

42. 参阅Taylor, The People's Platform: Taking Back Power and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Toronto: Random House Canada,2014), p.37.

43. Nick Statt, "Amazon Facing United Front of Authors in Hachette E-book Dispute," CNET, July 25, 2014.

44. David Streitfeld, "Amazon, a Friendly Giant as Long as It's Fed,"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14.

45. David Streitfeld, "Amazon and Hachette Resolve Disput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2014.

46. Jeremy Greenfield, "How the Amazon-Hachette Fight Could Shape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Atlantic, May 28, 2014.

47. David Streitfeld, "Amazon Is Not Holding Back on Paul Rya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4.

48. Elaine Sciolino, "The French Still Flock to Book-stores,"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12.

49. Pamela Druckerman, "The French Do Buy Books.Real Books,"New York Times, July 9, 2014.

50.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Amazon.com, Client Profile: Summary,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sum.php?id=D000023883&year=2008), and “Summary,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sum.php?id=D000023883&year=2012).

51. Paul Farhi, “Washington Post Closes Sale to Amazon Founder Jeff Bezo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 2013.

52.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Top 100 Banks and Thrifts, Nationally by Asset Size,” December 31, 2000, and September 30, 2014, and “FDIC—Statistics o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Report,”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cember 31, 2000, and September 30, 2014.

53. Thomas M.Hoenig, “Statement by Thomas M.Hoenig, Vice Chairman, FDIC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2013 Living Wills Submitted by First Wave Filers,”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website, August 4, 2014.

5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Barack Obama (D): Top Industries,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pres08/indus.php?cycle=2008&cid=N00009638).

5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John McCain (R): Top Industries,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pres08/indus.php?cycle=2008&cid=N00006424).

5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Barack Obama (D): Top Contributors,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pres08/contrib.php?cycle=2008&cid=N00009638).

5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 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Mitt Romney (R): Top Industries,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pres12/indus.php?cycle=2012&id=N00000286).

58. CBS Investigates, “Goldman Sachs'Revolving Door,” CBS News website, April 8, 2010.See also Eric Dash and Louise Story, “Rubin Leaving Citigroup; Smith Barney for Sale,”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2009.

59.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Employment History, “Geithner, Timothy, Bio,”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www.opensecrets.org/revolving/rev_summary.php?id=78265).

60. Josh Israel, “After 30 Years of Fighting for Wall Street, Eric Cantor Will Make Millions at an Investment Bank,” ThinkProgress, September 2, 2014.

61. 参阅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Moelis & Company, Form 8-K, September 2,2014, Item 5.02 (d)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596967/000110465914064087/a14-20284_18k.htm).

62. Dana Cimilluca and Patrick O'Connor, “Eric Cantor to Join Wall Street Investment Bank,”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 2014.

63. Moelis & Company,“Moelis & Company Announces the Appointment of Eric Cantor as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 2014.

64. William Alden,“K.K.R., Blackstone and TPG Private Equity Firms Agree to Settle Lawsuit on Collusion,”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4.

65. William Alden,“K.K.R., Blackstone and TPG Private Equity Firms Agree to Settle Lawsuit on Collusion,”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4.

66. Halah Touryalai,“Libor Explained: How Manipulated Rates Could Be Hurting (Or Helping) You,”Forbes, July 9, 2012.

67. “Timeline: Libor-Fixing Scandal,” BBC News website, February 6, 2013.

68. “Timeline: Libor-Fixing Scandal,” BBC News website, February 6, 2013.

69. 据估计，医疗保健支出占到GDP的17.9%。参阅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 Data Repositor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tistics Summary (2002-pres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70. McCarran-Ferguson Act of 1945, 15 U.S.C.§§ 1011-1015 (2011).

71. H.W.Brands,American Colossus: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1865-1900(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1), p.8.

72. Jack Beatty,Age of Betrayal: The Triumph of Money in America,1865-19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p.192.

73.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New York: Triangle Books,1931), pp.297-98中援引首席大法官爱德华·G.瑞恩的话.

74. 原文为populist，又可译为民粹主义者，但在本文为平民派或平民党的意思——译者注

75. Bruce Levine,Who Built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 p.147中援引玛丽·利斯的话.

76. 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02), pp.2, 494.

77. Winfield Scott Kerr, John Sherman: His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vol.2 (Boston: Sherman, French & Co., 1908), p.215.

78. Sherman Antitrust Act,15 U.S.C.§§ 1-7 (1890).另参阅 Kerr, John Sherman, p.204.

79. Kathleen Dalton, Theodore Roosevelt: A Strenuous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pp.208, 224-26, 253.

80. Doris Kearns Goodwin, 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p.299.

81. Marc Winerman,“The Origins of the FTC: Concentration, Cooperation, Control, and Competition,” Antitrust Law Journal 71, no.1 (2003): 1-97.

82. Marc Winerman,“The Origins of the FTC: Concentration, Cooperation, Control, and Competition,” Antitrust Law Journal 71, no.1 (2003): 1-97.p.12.

83. Woodrow Wilson,The New Freedom (BiblioBazaar, 2007).

84. Spencer Weber Waller, Thurman Arnold: A Biogra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6.

85. “AT&T Breakup II: Highlights in the History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Giant,”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1, 1995.

第六章 新型合同

合同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合同指买卖双方同意做某事或提供某物来换取其他东西的协议。合同是人们开展和执行交易的手段。如果财产和市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合同则是其命脉。不过与财产和市场势力一样，合同并非从天而降。虽然可靠的声誉非常重要，但承诺不可能自动兑现，合同也不是自我执行的。任何交易制度都需要规则，来决定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什么情况构成诈骗或胁迫，以及交易方无法履行承诺时该怎么办。在民主国家，这些规则来源于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

“自由市场”和政府之争再次掩饰了下列问题，即规则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谁对规则制定的影响力最大。由于这一争论由来已久，我们无法发现并辩论存在的两大核心问题，即现行规则实际上服务于谁，以及如何改变现行规则，让它们服务于其他人。今天我们很难了解根本的规则制定过程是什么样的，因为许多交易物都是无形的，例如在互联网上播放的电视剧、债券、基金、股份等。新型技术提供的一些服务牵扯令人恼火的道德问题，例如出租子宫进行代孕。有了这些技术，世界各地的人们尽管素昧平生，却能够进行交易。这些变化引发了众多新的问题，即什么可以成为交易对象。矛盾的是，信息变得日益复杂和丰富，但这让我们更难界定诈骗或胁迫行为，或者当出现违约问题并且公平分摊损失时，更难判断谁应承担责任。这相当于打开一扇大门，让政治因素能够影响到新型合同的方方面面。

社会准则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例如，随着医学、在线交流和交通运输领域不断进步，人们能够更容易地开展人体器官、血液、代孕或性交易活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交易活动是合法的。美国禁止出售人体

器官。[注]（禁止此类交易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984年。[注]当时弗吉尼亚州一位名为H.巴里·雅各布斯的医师宣布一项计划。他将收购肾脏，且收购对象主要是愿意出售自己肾脏的穷人，然后他再转手卖给负担得起的人。这吓坏了美国公众。国会阻止了雅各布斯这一计划。其他几个国家也禁止此类交易活动。）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可以在美国、墨西哥、泰国、乌克兰和印度出售自己的血液。[注]但你不能在加拿大和英国出售自己的血液。在美国大多数的州，妇女可以有偿出租自己的子宫（在2014年，妊娠代孕服务的市场价格为20万~30万美元）。[注]但大多数欧洲国家禁止这一有偿交易活动（英国允许向代孕母亲支付相关费用，但仅此而已）。

在1999年，瑞典宣布“卖春”不再属于非法行为，也不再将妓女视为罪犯。不过它宣布“买春”属于非法行为。瑞典警方发现，在这之后，被贩卖至瑞典的女性人数急剧减少。相比而言，在它的邻国丹麦，由于“买春”属于合法行为，有数千名妇女被贩卖到该国。

人体器官、血液、代孕或性交易活动之所以遭到禁止，是因为人们担心穷人遭到富人可耻、危险的剥削。富人很少出售自己的肾脏或血液，富家女子通常不会出租自己的子宫或者出卖肉体。研究显示，大多数娼妓出身贫寒，十几岁时就受成年男子胁迫进入这一行当。[注]弱势地位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哪怕对于合法药物，美国人也担心出现下列问题，即卖方向可能无法做出知情决定的买方出售药物。在2012年，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30亿美元的罚款，并且停止向18岁以下的儿童推销一种仅获准供成人服用的抗抑郁药物；停止将两种抗抑郁药物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其中包括治疗性功能障碍；停止向医生提供礼物、咨询合同、演讲费，甚至是体育赛事门票，来提高处方药的销量。[注]

反映社会不同群体地位和势力情况的假定也隐藏在涉及什么可以交易和什么不可以交易的规则当中。例如，精英阶层的许多人选择服食粉

末可卡因，而穷人则选择强效纯可卡因。它们不过是同一违禁毒品的两种不同形式。不过在2010年前，出售或购买强效纯可卡因的人员刑期与服食粉末可卡因人员刑期差异为100:1。这是非裔美国人因贩卖毒品这一非暴力罪行而服刑的时间和白人因暴力犯罪而服刑的时间相等的一个原因。在2010年，国会通过《公平量刑法》，将强效纯可卡因和粉末可卡因犯罪的刑期差距缩小到18:1。[注]

另一个考量因素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管加拿大或欧洲大多数国家禁止买卖枪支，但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却不遗余力地确保美国民众“有权”购买速射机关枪。[注]（不过该协会没有同意向民众出售地对空导弹或原子弹。）

同样，美国禁止买卖选票的行为，不过任何人只要对竞选捐款问题稍微有所了解，就可能会对美国是否信守这一原则心存疑虑。在20世纪之前，涉及游说政府官员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理由是游说活动违反公共政策。[注]例如，在1874年特里斯特诉蔡尔德案中，前外交官员特里斯特声称政府欠了他的钱，并聘请蔡尔德游说国会批准还钱；等到国会最终同意了，特里斯特拒绝向蔡尔德支付酬劳。[注]蔡尔德提起诉讼。最高法院拒绝执行特里斯特和蔡尔德之间的合同，理由是此类合同将会引发腐败问题。“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一家大企业为了谋取私利，雇用如此出卖自己的投机者，来推动通过一部通用法律，那么任何一位拥有道德观的正直之士都会本能地谴责深陷腐败的雇主和受雇者，以及这一不光彩的雇用行为。”[注]这一判决逻辑显然未能让68年后的最高法院信服；它裁定，企业属于第一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人”，有权在其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雇用说客投机分子。[注]

诚然，如果社会明令禁止交易双方自愿达成的特定协议，那么它们仍会出现在黑市中。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失败案例，就像今天的大麻禁令一样。在黑市，人们只能通过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的方式来履行非法的合同，所以黑市具有内在的风险和危险（这就

解释了一些人支持管制而不是全面禁止销售下列物品，即能够吸引急切的买家且对公众危害极小的物品）。

与此同时，技术不断为新型产品和服务创造机遇，这引发了有关什么可以出售的问题。契约苦役是被禁止的，但是学生以出售未来一部分收益为代价，通过提前预支来支付学费呢？[注]哄抬物价也是被禁止的，但优步司机在暴风雨天气收取为平时8倍的车费呢？[注]高频股票交易目前占到公共电子交易所交易额的一半[注]；如果交易商设计出大部分投资者无法使用到的超速通信系统，比其他所有人提前零点几秒接收到股票交易数据，并从中获利，这一做法公平吗？

政治权力在决定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方面发挥着与日俱增的作用。例如，1934年《证券交易法》禁止人们利用先于其他人获取且有可能影响股价的内幕消息进行股票交易。[注]（这部法律并没有明确做出规定，只不过法院解读认定它应禁止这一做法。）这是因为内幕人员利用机密信息进行交易时，拥有优势，能够操纵市场，确保从他们那获取到内幕消息的人员从中牟利，这是欺骗其他投资者的一种行为。多年以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联邦检察官和法官进行界定，确定非法内幕交易者包括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资者，即知道他本人所使用的信息来自谋求个人利益而违反保密义务的人员。[注]

不过当今世界信息几乎在瞬间传播开，并且人们只需提前零点几秒获取相关信息，就可以大赚一笔，因此监督内幕交易活动的难度很大，更别说对其进行界定了。在2014年，对冲基金公司地平面全球投资者公司利用戴尔公司员工透露的内幕消息，卖空戴尔股票，获利5400万美元。地平面全球投资者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安东尼·恰森事后表示，他不知道内幕消息的来源，也不知道走漏消息者是否从中获利。[注]他还说，华尔街没有几个交易员知道内幕消息的来源。据恰森的律师表示，机密信息是“证券市场的法定货币”。不过恰森最终被证明有罪。2014年12月，上诉法院推翻了对恰森的有罪判决，裁定恰森与走漏消息者隔了太

多层关系，不可能直接认识消息来源者，或者知道走漏消息者是否获得“实质性利益”作为回报。法院因此将华尔街一项非正式法律变成了正式法律，即一切取决于你认识谁。例如，如果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向高尔夫伙伴透露有关公司下一步行动的机密信息，他的伙伴又把这一信息透露给对冲基金经理，然后这名经理利用这一机密信息大赚一笔，那么对冲基金经理的获利是完全合法的。

由于机密信息是华尔街的“法定货币”，华尔街很大一部分的收益就有可能来自下列交易，即华尔街利用普通投资者无法获取的信息进行的交易。内幕人员为了一己之利操纵市场。那国会修改法律来阻止内幕交易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只要华尔街继续慷慨解囊，向国会议员和总统竞选捐款，那么这一可能性几乎为零。在欧洲，内幕交易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交易员知道或有理由相信特定信息还没有公布于世，那么他们不得使用这一信息。

如果经济效率是唯一的目标，那么禁止内幕交易的意义不大，像欧洲一样严格界定内幕交易也毫无意义。金融市场对所有可获取的信息的适应速度越快，无论是机密还是公开信息，市场的效率就越高。所谓的高频交易让一些交易员比其他人提前零点几秒知道资金流向。尽管高频交易会给动作迅速的交易员带来很大的优势，但它能提高市场效率。如果宽泛地界定内幕交易，禁止交易员使用并非所有交易员都可以获取的信息，那么市场将丧失效率。不过很多人认为此类系统性不平等现象非常不公平，就像在骰子中注铅一样。它们损害了小投资者对金融市场诚信的信心。这也是很多人听说内幕消息是华尔街的“法定货币”时感到不安的原因。

当内幕人员利用机密信息进行交易时，并不是只有小型交易者因此处于劣势。当员工通过公司注资的养老基金，将一部分薪水投入股市时，如果基金向他们收取高于正常收费标准的费用，然后将多收的部分以其他金融服务折扣的形式返回给公司，那么员工的利益就会受损。注

公司没有和员工分享这一信息，这相当于利益冲突，等同于欺骗行为。不过这一做法是完全合法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而在于政府官员决定了如何组织市场，以及哪个外部团体对此类决定的影响力最大。近几十年的情况是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和富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再举个例子，长期以来法律规定，如果合同一方在遭胁迫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则合同不予以执行。这一问题还涉及道德原则：协议方不得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做出承诺。对于在枪口下签订的合同，没有人有义务履行这一合同，法律也不会予以执行。

不过我们该如何界定“胁迫行为”呢？当大企业利用知识产权控制标准或网络平台，或聘请大批律师和说客来控制市场时，买方和卖方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具有内在的胁迫性，或者看上去是如此。今天的合同常常充斥着各种条款（条款有可能是使用小号字体），不让员工、借方和顾客拥有任何有意义的选择。尽管如此，大企业拥有足够的政治和法律影响力，能够确保这些合同得到执行。

在近几年，一项合同条款非常常见，即当员工申诉或声称公司剥夺自己的基本权利时，应交由仲裁员（经常是由公司选定）进行仲裁，并且员工必须接受仲裁结果，不得上诉到法院。[注]显然这一条款对游戏进行操纵，使之有利于将此类条款写入标准合同中的大公司。近期一项研究显示，当员工控告公司就业歧视并选择仲裁时，他们获得救济的概率为21%；当员工选择起诉到法院，则这一概率上升到50%~60%。[注]

同样，许多流行的互联网网站要求用户同意接受下列服务条款，即当出现什么差错时，用户不得（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起诉网站所有人。在一些网站，用户直接点击鼠标，确认他们接受此类条款和条件。事实上他们从未阅读这些条款和条件，并且他们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同意。其他网站则只是提供此类条款的链接，用户只要访问网站，

网站就认定用户同意接受这些条款。这导致许多用户在访问网站后，发现自己放弃了本以为拥有的法律权利。例如，有消费者起诉几家宾馆和在线旅行社涉嫌共谋操纵宾馆客房价格。在法庭上，旅游城市网的律师成功地进行辩护，指出使用这一网站的用户已经“同意”不会进行起诉，因此不能参与诉讼。[注]

对于和大企业签订合同的小商家而言，此类条款甚至可以阻止它们指控大企业垄断整个行业。小商家没有或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这一合同。加州奥克兰市小餐馆意大利色彩的所有人曾指控美国运通公司滥用垄断势力，对餐馆收取不合理的信用卡费率。对此，美国运通公司回应称，意大利色彩餐馆和它签署了一份合同，合同包括一条强制性仲裁条款，禁止意大利色彩餐馆提起此类诉讼[注]。这一案件一直上诉至最高法院。[注]2013年，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包括共和党任命的所有大法官）认同美国运通的说法。不过正如埃琳娜·卡根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写到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小商家身陷难以摆脱的困境，而垄断大企业得以轻松脱身。“大型垄断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势力，坚持要求签署合同，从而有效地剥夺了受害者所有的合法追索权。[注]”

顾客在“我同意”处画勾时，甚至有可能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注]如果你希望将个人信息存储在苹果公司的iCloud上，你必须得首先同意它的服务条款：

> 您自行负责您账户的保密和安全，并对您的账户发生的或通过您的账户发生的一切活动负全责……在我们运用了合理的技能并尽到适当的审慎义务的条件下，如果因您未遵守这些规则而导致您的账户未经授权而被使用，则对于由此引起的任何损失，苹果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注]

换句话说，如果黑客入侵iCloud，盗取了不利于你的照片，并在全

世界范围散布这些照片，那就太糟糕了，但是苹果公司不会为此负责。严格来讲，你是有选择的，因为你可以不同意苹果公司的服务条款。事实上，其他所有服务也有同样的条款，因此用户没有其他选择。

此类新型合同不是由议价能力大致相当的两方经谈判达成的结果，它们是大公司造成的既成事实。大公司手握大权，能够要求用户接受合同条款。抵押贷款申请人必须签字同意接受一大堆银行条款，可能因此放弃起诉银行掠夺性贷款行为的权利，才有资格申请贷款。低收入借款人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相关条款，同意如果未能按时还款，将支付两位数的费用和利息。学生申请大学生贷款时，别无选择，只得同意放弃特定的权利要求。特许经营小商家加盟前必须和母公司签署合同。合同巨细无遗地列出它们应承担的义务，方便母公司在它们轻微违约时，借机关闭商店，将特许经营权以高价转售给其他经营商。

州和联邦立法者曾一度对大企业和金融公司的合同条款进行了限制，试图保护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雇员和借款人。不过在近几年，在企业和银行的政治压力之下，这些限制措施力度遭到削弱。例如，数个州的立法者允许银行提高个人贷款利息，这导致分期偿还贷款利率高达36%。[注]此举影响到数百万名低收入借款人。如果借款人申请100~500美元的发薪日预支贷款，他们必须同意在数周内还钱，并且贷款年化利率达到300%及以上，这一情况非常常见。花旗集团旗下的OneMain金融控股公司是一家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领先贷款公司，它因为这一规定赚得盆满钵满。[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花旗集团和其他银行不吝于资助州议会选举。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瑞克·格莱兹亚反对该州提高利息限度。他向《纽约时报》表示，“根本没有必要修改法律。这是特殊利益集团为了提高利润做出的最为无耻的一个举动。”[注]

与此同时，大公司的员工通常须签约，同意接受非竞争条款。[注]此类条款禁止他们为竞争对手公司效力，这损害了员工未来就业前景。（加州和北达科他州禁止此类条款，不过个别情况除外。）如果雇主和

竞争对手达成互不挖角协议，这将进一步损害员工的就业前景。例如，在2014年，一位联邦法官裁定硅谷几家高科技公司“彼此勾结”对付自己公司的员工，同意不挖走对方的工程师。[注]法院文件显示，在2005年，谷歌公司试图雇用苹果公司一批工程师，对此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威胁说：“如果你们胆敢雇用其中任何一个人，这将意味着战争。”[注]谷歌不仅做出让步，乔布斯甚至还让谷歌解雇了一位试图雇用苹果公司员工的招聘工作人员。[注]非竞争条款和互不挖角协议的辩护者可能会说，员工和雇主拥有相等的议价权力。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少见。

当大公司拥有不对称的权力，不仅能够影响到可以出售哪些商品，还能影响到决定着哪些合同有效和可执行的规则，那么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毫无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讲，“自由市场”并不是自由的。它未提供任何切实可行的可替代选择。

---

1. The 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Act of 1984, 1984 Pub.L.98-507;参阅Title III—Prohibition of Organ Purchases, sec.301.

2. Laura Meckler,“Kidney Shortage Inspires a Radical Idea: Organ Sales,”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3, 2007.

3. 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PG Sec.230.150 Blood Donor Classification Statement, Paid or Volunteer Donor,” 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ebsite, last updated September 18, 2014.

4. Tamar Lewin, “Coming to U.S.for Baby, and Womb to Carry It,”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14.另参阅 Surrogacy Arrangements Act 1985, 1985 ch.49.

5. 参阅Heather J.Clawson, Nicole Dutch, Amy Solomon, and Lisa Goldblatt Grace, Human Trafficking Into an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ebsite, August 2009.

6.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GlaxoSmithKline to Plead Guilty and Pay $3 Billion to Resolve Fraud Allegations and Failure to Report Safety Data,”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website, July 2, 2012.

7. Fair Sentencing Act of 2010, Pub.L.No.111-220, 124 Stat.2372 (2010).另参阅 Gary G.Grindler, “Memorandum for All Federal Prosecutors,”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website,

August 5, 2010.

8. Ruth Levush,“Firearms-Control Legislation and Policy: Comparative Analysis,”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website, last updated September 16, 2014.另参阅 Philip Alpers, Amélie Rossetti, Daniel Salinas, and Marcus Wilson, “United States—Gun Facts, Figures and the Law,” Sydne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Sydney, GunPolicy.org website, August 20, 2014.

9. Zephyr Teachout,Corruption in America: From Benjamin Franklin's Snuff Box to Citizens Unit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54.

10. Trist v.Child, 88 U.S.441 (1874).

11. Trist v.Child, 88 U.S.441 (1874). p.451.

12.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13. Beth Akers,“How Income Share Agreements Could Play a Role in Higher Ed Financing,”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October 16, 2014.

14. Joe Coscarelli,“The Uber Hangover: That Bar Tab Might Not Be the Only Thing You'll Regret in the Morning,” New York Magazine, December 27, 2013.

15. Bart Chilton, “No Need to Demonize High- Frequency Trading,”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14.

16.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Pub.L.73-291, 48 Stat.881.

17. “Insider Trading,”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website.

18. Floyd Norris, “Loosening the Rules on Insider Trading,”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4.

19. Anya Kamenetz, “Is Your 401(k) Plan Is \［sic\］ Ripping You Off ?” Chicago Tribune, July 8, 2014.

20.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Worker-Management Relations,”ch.4, “Employment Litig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U.S.Department of Labor website.

21. Alexander Colvin,“An Empirical Study of Employment Arbitration: Case Outcomes and Processes,” Cornell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ILR website, February 2011.另参阅 David Benjamin Oppenheimer, “Verdicts Matter: An Empirical Study of California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Wrongful Discharge Jury Verdicts Reveals Low Success Rates for Women and Minorities,” U.C.Davis Law Review 37 (2003): 511-66.

22. 欲了解服务条款协议，参阅Jeremy B.Merrill, “One-Third of Top Websites Restrict Customers' Right to Su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4.另参阅“In re.Online Travel Company (OTC) Hotel Booking Antitrust Litigation,” Consol.Civil Action No.3:12-cv-3515-B (http://s3.amazonaws.com/ cdn.orrick.com/files/Order-re-Motion-for-Leave-to-Amend.pdf).

23. American Express Co.et al.v.Italian Colors Restaurant et al., 570 U.S.——(2013).

24. American Express Co.et al.v.Italian Colors Restaurant et al., 570 U.S.——(2013).

25. American Express Co.et al.v.Italian Colors Restaurant et al., 570 U.S.——(2013).

26. Aleecia M.McDonald and Lorrie Faith Cranor, “The Cost of Reading Privacy Policies,”I/S: A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4, no.3(2008):540-65.

27. “iCloud Terms and Conditions,”Apple website, last revised October 20, 2014.

28. Michael Corkery,“States Ease Interest Rate Laws That Protected Poor Borrow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2014.

29. Michael Corkery,“States Ease Interest Rate Laws That Protected Poor Borrow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2014.

30. Michael Corkery,“States Ease Interest Rate Laws That Protected Poor Borrow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1, 2014.

31. Steven Greenhouse,“Non-compete Clauses Increasingly Pop Up in Array of Jobs,”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14.

32. David Streitfeld,“Court Rejects Deal on Hiring in Silicon Valle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4.

33. David Streitfeld,“Court Rejects Deal on Hiring in Silicon Valle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4.

34. David Streitfeld,“Court Rejects Deal on Hiring in Silicon Valley,” New York Times, August 8, 2014.

第七章 新型破产

1984年在大西洋城特朗普广场开业之日，身着深色大衣的唐纳德·特朗普站在赌场大厅，炫耀称自己新投资的广场是大西洋城，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最美的建筑。[注]30年后，特朗普广场倒闭了，近千名员工因此失业。[注]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已经和大西洋城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自吹自擂说自己撤出投资“时机非常棒”。[注]

在美国，富人一有要出事的苗头就撤走资金，从而轻易地避免承担押注失误带来的后果和巨大损失。法律通过有限责任和破产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不过当普通人搬到大西洋城这样的地方工作、投资买房和学习工作技能时，法律可没有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保护。当工作岗位消失，房价一落千丈，工作技能突然变得毫无用处时，他们便身陷困境。破产制度的初衷是让人们能够从头再来。不过在今天，只有大公司、有钱有势的大亨和华尔街能够轻松地从头再来。他们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能够根据自身需要塑造破产法。

破产是市场的第四大基本组成部分。和其他市场规则一样，它反映了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权衡关系。合同有赖于一个处理欠债不还问题的机制。如果买家、债务人和借方能够轻易地逃避责任，那么他们下一次再欠债时同样会满不在乎，而这一态度可能传染给其他人。（此类道德风险问题甚至会波及华尔街的大银行。）不过如果将无力还债的人关进监狱，或者惩罚他们（19世纪情况就是如此），那么他们可能无法赚钱来偿还所欠的债务。

许多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身负重债的人们可能会在债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最终将整个社会拉下水，引发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许多

历史学家表示，“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推动了法西斯的崛起）。在19世纪末，美国铁路公司巨头负债累累，无法偿还债务。债主威胁拆走铁轨当废铁卖。[注]精明的商人估计，如果债主同意免除一部分债务，让铁路公司能够继续运营下去，为铁路公司带来收入，那么铁路公司至少能够偿还大部分债务，这对债权人更有好处。

大多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利用破产制度，推动下列两者达成合理的平衡，即允许债务人将债务减少到可控的水平，与此同时让所有债权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这一切都是在破产法官的密切监督之下进行。破产制度的中心理念是共同牺牲——债务人和债权人，以及债权人之间共同做出牺牲。这一机制要求政府就各种问题做出决定，并且此类决定经常隐藏在法院判决结果、政府部门指令和法案条款当中。例如，谁有资格申请破产，以及破产适用于哪些类型的债务？如何公平合理地让债权人分担损失？如果不能进行破产那该怎么办？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以及诸多相关联的问题。“自由市场”本身不会提供解决方案。很多时候，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提供解决方案。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条第4款）授权国会制定“在合众国内一致适用的、有关破产的法律”[注]；国会于1800年、1841年、1867年、1874年、1898年、1938年、1978年、1994年和2005年分别修订和通过破产法。华尔街银行和大型信用卡公司在最近几部破产法的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用卡行业针对2005年破产法的游说费用超过1亿美元[注]；华尔街捐助竞选活动的费用惊人，这确保他们对此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因此无须如此大手笔地进行游说。）

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注]通常它们破产的目的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会达成的合约。依据破产法（主要是由信用卡公司和银行一手炮制而成的），当涉及债务清偿顺位时，劳动合同通常都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而劳动合同涉及工人报酬问题。这意味着公司甚至可以将威胁破产作为撒手锏，迫使工会成员在早已达

成共识的工资问题上做出牺牲。2003年，美洲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卡蒂威胁进行破产，迫使美洲航空公司几家大工会做出让步，同意接受近20亿美元的减薪协议。卡蒂鼓吹着“共同牺牲”的必要性，却没有透露他暗地里建立了一项特殊的公司高管养老金计划。[注]该养老基金的资金存入一家信托机构，在公司破产时不会受到影响。由于有这一秘密计划，卡蒂辞职时拿到了将近1200万美元的报酬。

尽管员工做出让步，美洲航空公司2011年还是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当时，公司拒绝履行劳资协议，并且冻结员工的养老金计划。[注]2013年，美洲航空公司破产重组成功，向债权人偿还所有债务，并支付利息。甚至连股东在公司破产重组后都变得更加有钱。（当年年末美洲航空公司与全美航空公司合并，公司股价随之上扬。[注]）更有甚者，主导公司破产重组的首席执行官汤姆·霍尔顿拿到了超过1990万美元的离职补偿金。[注]所有人都捞到了好处，但就是没有美洲航空公司员工的份。美洲航空公司员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和福利待遇大幅缩水。[注]“共同牺牲”也不过如此。

最为严重的未能偿还债务的案例发生在2008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当时华尔街几近崩溃。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购买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高风险产品，例如次贷、债务抵押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尽管这几家银行将大量高风险产品出售给不够警觉的投资者，它们还留存了许多产品并在账簿上按全值记账。当债务泡沫爆裂时，大银行和众多投资者发现自己手里只剩下几乎一文不值的欠条。[注]一些评论人士（包括我在内）敦促迫使银行破产，以此解决它们存在的问题。[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破产案。[注]雷曼兄弟公司资产超过6910亿美元，但仍然资不抵债。这一事件撼动了整个华尔街，为此即将卸任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出面，说服国会注资数千亿美元用于保护其他大银行。此外，美联储还向大银行提供估计83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注]保尔森财长和他的继任者蒂

莫西·盖特纳并没有明确表示大银行大到不能倒。确切地说，这些银行太大，无法进行破产重组。

华尔街几近崩溃，由此产生的实际负担落在了小投资者和私房屋主的肩上。随着房价一落千丈，许多私房屋主发现所欠的抵押贷款甚至高过房屋本身的价值，而且他们不能再次贷款。不过《破产法》第13章（这一法律主要由金融行业起草）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贷款申请破产。[注]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以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迪克·德宾为首的一些国会议员试图修改这一法律，允许陷入困境的私房屋主申请破产。[注]这将为房主提供有力的筹码，进行讨价还价，防止银行或其他贷款服务机构强制收房。如果债权人不同意，他们的案件将交由破产法官处理；破产法官可能会同意减免部分贷款，而不是将人们从家中赶出去。

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但在2009年4月底，当德宾在参议院提交他的修正议案时，金融业开始发威，进行阻挠，称该议案将极大地提高房贷成本。[注]（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情况是这样的。）虽然当时民主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但最终仅有45名参议员投票支持这一法案。[注]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陷入困境的私房屋主毫无议价能力。超过500万人丢掉了自己的房子。到2014年，又有200万人即将面临止赎的问题。“共同牺牲”也就这么一回事。

许多人毕业后仍背负着学生贷款，这一个债务人群体同样也无法通过破产来重新商讨贷款问题。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就业市场的复苏情况令人失望。许多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找不到工作，但仍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据纽约联储银行表示，到2014年，学生贷款在美国所有债务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0%，仅次于房屋抵押贷款，但高于汽车贷款（8%）和信用卡债务（6%）。[注]不过破产法不允许人们寻求破产保护，解决学生贷款债务问题。[注]如果债务人无力还债，贷款人可以截留他们的薪水。[注]（如果人们退休时仍未能还清学生贷款，那贷款人甚至可以截留

他们的社保支票。(注)）在学生贷款行业的要求下，美国于1998年通过一项法律。依据该法律，毕业生减免学生贷款只有一种办法，即提起诉讼，证明偿还贷款会导致本人和家属生活“极度困苦”。(注)这一标准甚至比破产法院适用于寻求减免赌债的赌徒的标准还要严格。(注)

国会及其在银行业的金主担心大学毕业生可能根本不愿努力偿还学生贷款就申请破产。(注)他们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学生贷款条件明显不合理（例如贷款利率达到两位数），或者贷款学生就读于毕业生就业率低的学校，则应允许毕业生申请破产。这一替代方案更好，且更符合共同牺牲的理念。

严格来讲，城市破产问题并不属于“自由市场”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城市破产对如何组织市场来分配损失的影响重大。在2013年，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它希望通过破产来削减70亿美元的债务，并且投资17亿美元恢复市政公共服务。对于挣扎在破产边缘的其他美国城市而言，底特律就是它们的榜样。底特律希望各个债权人群能够做出牺牲。这些群体包括底特律退休员工，和购买了底特律2005年发行的参与证书的投资人。(注)底特律退休员工如今依靠该市几年前承诺支付的养老金和医保福利生活。2005年秋季，密歇根州东部地区破产法庭开庭权衡底特律破产问题，决定是否同意或驳回一项损失分配计划。在法庭上，这两个群体均声称：这一计划不公平，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最终，持有2005年参与证书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不过许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医疗福利也遭大幅削减。

不过底特律附近的奥克兰郡在此次破产中毫发未伤，那里居住的居民多为富人。奥克兰郡居民没有被要求分担底特律破产带来的损失。奥克兰郡主要居住着白人，该郡远比以黑人居民为主的底特律富裕。在居民人数达到或超过100万的美国郡县中，奥克兰郡是最富有的郡县之一。事实上，奥克兰郡郊区属于大底特律都市区的一部分。大底特律都市区跻身于美国顶级金融中心行列，在美国高科技就业中心中排名前

四；它还曾是第二大工程和建筑人才输出地。[注]这一地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将近5万美元。[注]伯明翰市与底特律市相邻，是底特律都市区的一个郊区，近几年它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超过9.9万美元。[注]附近的布隆菲尔德山也属于底特律都市区的一部分，它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将近14.8万美元。底特律的高档郊区拥有优质的学校、反应迅速的安保设施和美丽的公园。

40年前，底特律还是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大杂烩”之地。但在2000~2010年，随着中产阶级和白人居民纷纷迁至郊区，底特律流失了1/4的人口。[注]在宣布破产时，居住在底特律的几乎全是穷人。[注]它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2.6万美元。[注]超过一半的儿童属于贫困阶层。[注]这导致底特律房价低迷，社区荒芜，房屋空置，学校破败不堪。该市40%的路灯是坏的。[注]在过去五年里，2/3的公园关门。[注]2014年，底特律每月堆积的水费账单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官员开始对15万户交不起水费的家庭进行断水。[注]

如果官方将奥克兰郡划入底特律，那么奥克兰郡的富人（以及他们的银行和债权人）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帮助解决底特律的问题，而底特律也就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账单，并且为居民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底特律内城区的穷人不得不独自应对日益严峻的问题，而郊区白人和富人以及服务于郊区的银行却独善其身。事实上，只要有人提到郊区应承担一些责任，就会招致义正词严的反驳。奥克兰郡郡长L.布洛克斯·帕特森讥笑说：“现在他们突然有麻烦了，就想将一部分责任转嫁给郊区？他们不可能说服我当这个好人的。‘自己的担子自己挑，是吧？’哈哈。”[注]

一些基本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被掩埋在古板的破产法当中。“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美洲航空公司是否仅代表股东和高管，还是也代表它的员工呢？波及大银行和私房屋主的金

融危机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如果毕业生无法偿还学生贷款，银行有责任吗？我们的社会有责任吗？毕竟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能为社会带来种种好处。当“底特律”无力支付账单时，难道只有底特律、它的公职人员、退休人员和贫困居民需要做出牺牲吗？难道底特律富人郊区和银行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吗？要知道，在底特律没落时，富人便纷纷逃至郊区居住。

破产和合同恰好掩盖了这些问题。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协议一方根本无力履行对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如何进行弥补是唯一关键的问题。这正是“自由市场”所希望看到的——而与此同时，内在机制却未能得到检视。

---

1. “Trump Plaza: 4th Atlantic City Casino Shutdown,”Associated Press, September 16, 2014.
2. “Trump Plaza to Close, Costing Atlantic City 1,000 Jobs,” Bloomberg News, July 14, 2014.
3. Vicki Hyman, “Donald Trump Crows about Casino Woes: Atlantic City ‘Lost Its Magic After I Left,’” NJ.com website, September 16, 2014.
4. Todd Zywicki,“The Auto Bailout and the Rule of Law,”National Affairs, no.7 (2011): 66-80.
5. U.S.Constitution, art.I, sec.8, cl.4.另参阅 “The Evolution of U.S.Bankruptcy Law: A Timeline,”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http://www.rib.uscourts.gov/newhome/docs/the_evolution_of_bankruptcy_law.pdf).
6. Timothy Egan, “Newly Bankrupt Raking in Piles of Credit Off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5.
7. “The Last Great American Airline Merger ...and the Last Great American Airline Bankruptcy?”The Economist, January 12, 2013.
8. Richard Finger, “Why American Airlines Employees Loathe Management,” Forbes, April 29, 2013.
9. Gregory Karp, “American Airlines Parent Will Freeze, Not Terminate, Pensions,” Chicago Tribune, March 7, 2012.
10. 欲了解美洲航空公司破产重组情况，参阅Jack Nicas, “American Airlines Delivers Rich Payout,”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8, 2014.
11. Nick Brown,“American Airlines-US Airways Merger Gets Court Approval,” Reuters,

March 27, 2013.

12. Finger,“Why American Airlines Employees Loathe Management.”

13. U.S.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14. 参阅Robert Reich, “The Coming Bailout of All Bailouts: A Better Alternative,” Robert Reich blog, September 18, 2008.

15. Jon Hilsenrath, Deborah Solomon, and Damian Paletta, “Paulson, Bernanke Strained for Consensus in Bailout,”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0, 2008.

16. Bob Ivry, “Fed Gave Banks Crisis Gains on Secretive Loans Low as 0.01% ,” Bloomberg News, May 26, 2011.

17. James C.Duff, Bankruptcy Basics, rev.3rd ed.,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Courts, April 2010 (http://www.uscourts.gov/uscourts/FederalCourts /BankruptcyResources/bank basics.pdf).

18. Helping Families Save Their Homes in Bankruptcy Act of 2008, S.2136 (110th).

19. Dick Durbin, “Durbin's Bankruptcy Amendment to Help Homeowners in Foreclosure,” 2009年4月29日在参议院发表的讲话(http://www.durbin.senate.gov/ public/index.cfm/statementscommentary?ID = 5f256057-e6ed-442b-a866-396a16735b0a).

20. Anne Flaherty, “Senate Votes Down Foreclosure Mortgage Relief Bill,” USA Today, April 30, 2009.

21.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August 2014, p.3 (http://www.newyorkfed.org/householdcredit/2014-q2/data/pdf/ HHDC_2014Q2.pdf).

22. Josh Mitchell, “Trying to Shed Student Debt,”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 2012.

23. Annamaria Andriotis, “Student Debt Takes a Bite Out of More Paycheck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3, 2014.

24. Annamaria Andriotis, “Student Debt Takes a Bite Out of More Paycheck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3, 2014.

25. Federal Student Aid, “Forgiveness, Cancellation, and Discharge: Discharge in Bankruptcy,” Federal Student Aid website.

26. Tim Donovan,“Student Loan Debt Should Be Treated Like Detroit's,” Salon, July 24, 2013.

27. Tim Donovan,“Student Loan Debt Should Be Treated Like Detroit's,” Salon, July 24, 2013.

28. 欲了解底特律破产案，参阅Monica Davey and Mary Williams Walsh, “Plan to Exit Bankruptcy Is Approved for Detroi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2014.

29. “Detroit: Economy; Major Industries and Commercial Activity,” City-Data.com website, 2009.另参阅Automation Alley, Automation Alley's 2013 Technology Industry Report, Anderson Economic Group website.

30. U.S.Census Bureau, 2008-2012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etroit-Warren-Livonia, MI, Metro Area, table DP-03 5-Year Estimates, American FactFinder website.

31. U.S.Census Bureau,2009-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Birmingham and Bloomfield Hills,5-Year Estimates, “Community Facts,” American FactFinder website.

32. U.S.Census Bureau, “Profile of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2010 Demographic Profile,” table DP-1, and “Profile of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ensus 2000 Summary File 1 (SF 1) 100-Percent Data,” table DP-1, Detroit, MI, American FactFinder website.

33. 64%的人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00%。参阅U.S.Census Bureau, 2009-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etroit, MI, 5-Year Estimate, “Poverty Status in the Past 12 Months,” table S1701, American FactFinder website.

34. U.S.Census Bureau, 2009-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etroit, MI, 5-Year Estimate, “Community Facts,” American FactFinder website.

35. 55%的儿童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参阅 U.S.Census Bureau, 2009-13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Detroit, MI, 5-Year Estimate, “Children Characteristics,” table S0901, American FactFinder website.

36. “Proposal for Creditors,” City of Detroit website, June 14, 2013, p.12.

37. “Proposal for Creditors,” City of Detroit website, June 14, 2013, p.12.

38. Rick Cohen, “UN Declares Detroit Water Shutoffs Violate Human Rights,” Nonprofit Quarterly, June 26, 2014.

39. Paige Williams, “Drop Dead, Detroit!” New Yorker, January 27, 2014.

第八章 执行机制

市场第五大组成部分是执行。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当市场势力过大时，必须对它进行约束。合同必须予以执行（或者被禁止）。人们必须共同分担破产造成的损失。如果存在市场的话，这一切至关重要。人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过当涉及具体问题时，相关的决定却不尽相同，例如哪些“财产”可以得到保护，市场势力怎样才算过大，应该禁止或执行哪些合同，以及当协议一方无法履行协议时该怎么办。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不过这些答案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通过立法修正案、推翻或忽视判例的法院判决，以及行政法律和法规的变化，我们不断地重新审视这些答案。

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为既得利益者提供机会来施加影响。他们的确抓住了机会，不断施加影响。他们还对如何执行这一切施加影响。从许多方面来讲，这一执行机制最为隐蔽，不被大众所了解。这是因为有关什么无须予以执行的决定不会公之于世，并且人们很难决定应将有限的执行资源优先用于哪些工作，也很难评估惩罚力度是否到位。此外，富人和公司有能力聘请大批经验丰富的律师，因此相对于普通人和小企业而言，他们拥有持久、彻底的优势。

我先谈追责问题，即出事时应追究谁的责任。当一个行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时，它能够免予被起诉。例如，1988年，制药业说服国会实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注]当疫苗出现副作用时，这一计划有效地为疫苗生产商和医生提供免责保护伞。当枪支使用造成人员伤害时，枪支生产商也受到保护，无须为此担责。2002年，一名步枪狙击手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大开杀戒，造成多人遇难。2004年，法院判决要求步枪生产商和销售商向8名遇难者的亲属赔偿250万美元。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对此

采取了行动。[注]2005年，国会通过了《合法枪械买卖保护法》。[注]依据该法律，当枪械制造商、批发商和经销商出售的枪支造成任何伤害时，他们只需承担极为有限的责任。

不是所有行业都能这么成功地免责。数十年前，汽车业宣称汽车安全性能非常高，安全带毫无必要。烟草行业推销香烟时，声称香烟有益身体健康。数万人为此丧失了性命，两个行业向受害者支付了高达几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之后，两个行业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今天，汽车的安全性能更高，美国烟民人数也在减少。

财力雄厚的公司仍然能够逃避责任。它们可以说服友好的国会议员和监管官员对它们手下留情。例如，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造成太平洋大片水域受到污染。在此之前，通用电气公司推出了Mark 1型沸水反应堆。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及美国16家核电厂）都是使用这一型号的反应堆。这一反应堆由于采用了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安全壳，因此与竞争产品相比更具价格优势。不过Mark 1型反应堆存在的危险也是众所周知的。[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核管理委员会官员哈罗德·丹顿警告说，当发生事故时，Mark 1型反应堆燃料棒如果出现过热熔解的问题，反应堆有90%的可能性会发生爆炸。[注]委员会召集的研究小组提交后续报告指出，“Mark 1型反应堆在堆芯熔融后的前几个小时内出现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大”。[注]

为什么委员会没有要求通用电气公司改进Mark 1型反应堆的安全性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通用电气公司拥有惊人的政治和法律影响力。例如，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它的高管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款将近400万美元（在2.0766万家公司中排名第63位），而它的游说活动费用接近1900万美元（在4372家公司中排名第5位）。[注]此外，在它聘请的144名说客中，有104人曾在政府部门任职。[注]

同样，负责调查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国家委员会认定，英国

石油公司在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开展深海油井安装作业时未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英国石油公司事先也知道哈里伯顿公司缺乏测试防喷水泥的经验，并且之前开展类似的作业时表现得也不尽如人意。[注]简而言之，两家公司为了省事，没有充分地对水泥进行测试。与此同时，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局（现在改名为海洋能源管理、监督和执行局）与英国石油公司和哈里伯顿公司的关系亲密，未能有效地监管这两家公司。[注]这家监管机构和它负责监管的两家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运行顺畅。同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更热衷于满足汽车业的需要，而不是努力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安全。[注]汽车行业在国会拥有强大的盟友。数十年以来，以密歇根州众议员约翰·丁格尔为主的国会议员努力确保汽车业的需要得到满足。

再以美联储纽约分行为例。纽约联储银行担负着监管华尔街银行的主要责任。在华尔街几乎崩溃之后，纽约联储银行派检察官进驻华尔街银行。这些银行拥有强大的法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给检察官们浇了一盆冷水，把他们的工作热情浇灭了大半。美联储高官指示级别较低的监管者对大银行手下留情，不要查得太严。在一次会议上，高盛公司一名银行高级职员对美联储监管者说，“当客户足够富有时，一些消费者法便不再适用于他们”。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监管员向更为资深的同事诉说了对这一评论的担忧之情。她的同事回应说，“你就当没有听到”。[注]这一会议情况在2014年遭到曝光。

富有阶层为了扼杀他们所厌恶的法律，采取的另一种手段是确保国会不会划拨足够的经费用于执法。例如，2003年4月，得州韦斯特化肥厂发生爆炸，造成14人遇难，超过200人受伤。[注]在过去近30年中，相关监管部门从未对这家工厂进行过全面的检查。职业安全健康局（OSHA）和它的州级伙伴单位总共才有2200名检查员。[注]这些检查员却负责保护800多万处工作场所的1.3亿名工人的安全。平均计算下来，每名检查员负责约5.9万名工人。多年以来，国会不断地削减职业安全

健康局的经费。该部门遭到有计划地挖空。负责汽车安全问题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情况也是如此。它在2013年的预算为1.34亿美元，这似乎足以解决美国每年高达3.4万起交通死亡事故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比当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三个月的安保经费还要少。[注]

国税局（IRS）也遭到挖空。越来越多的富人和大企业想尽一切办法逃税，例如通过影子公司和避税港洗钱，或者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尽管如此，国税局2014年预算与2010年相比还是减少了7%。

与此同时，国税局少了一万多名员工——裁员率达7%。[注]紧缩国税局预算并不能让政府节省经费。相反，国税局执法工作无力，这会导致国家税收减少。国税局每多一美元的执法工作经费，估计可以多追回200美元的未缴税金。[注]不过随着国税局执法工作减少，这也降低了对富人和大企业进行审计的可能性。

同样，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之后，华尔街确保政府相关执法机构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履行职责。在华尔街几近崩溃整整六年之后，《多德-弗兰克法案》诸多规定的执行工作仍处于筹划阶段，其中包括所谓的“沃尔克规则”。该规则旨在限制衍生品交易。华尔街一开始就是因为衍生品交易而陷入麻烦的。

有些行业不希望特定法案获得通过，但又担心如果它们公开反对拟议的法案，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暗地里使招，确保国会划拨的经费不足以执行这一法律。食品行业就是这样对付《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注]在数千人因食用腐坏食品生病后，该法案于2011年正式成为法律。随后，在食品行业的成功游说下，国会划拨用于执行该法律的经费少得可怜，导致该法律基本上形同虚设。

由于公众不知情，利益集团可以“挖空”政府执法机构，从而削弱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通常引人注目。白宫甚至有可能为此举行签字仪

式。新闻媒体会适时记录这一事件。但是没人关注政府执法部门经费遭到削减的问题，而这实际上相当于废除了法律。

还有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可以达到废除法律的效果，即让法律条文中充斥着各种漏洞和例外，让法律形同虚设。通常，当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立法，界定法律的含义或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时，利益集团会制造种种漏洞。《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限制商品期货投机行为的规定就是一个例子。多年来，华尔街在粮食、原油、铜和其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投机，获利颇多。投机活动导致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当商品价格出现波动时，华尔街在多数情况下正确押注价格走势，从而大发其财。不过他们的押注行为导致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增加，这属于从中产阶级和穷人向富人进行的隐性再分配。多德·弗兰克指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拟定一项具体的规定，以此减少华尔街此类投机行为。委员会考虑了1.5万条建议，其中大部分建议是由华尔街撰写和提交的。[注]该委员会还进行了多次经济和政策分析，慎重地权衡这一规定为公众带来的好处，以及给华尔街带来的成本。

几年之后，委员会公布了拟议的规定。该规定纳入了华尔街所寻求的一些漏洞和例外。但华尔街仍然感到不满意。因此委员会同意至少推迟一年才执行这一规定，让华尔街有更多时间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华尔街大银行还是不知足。它们的律师向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推翻这一规定。[注]理由是委员会的成本效益分析工作不够充分。[注]这一招非常高明，要知道成本和效益很难衡量。华尔街把这一难题抛给了联邦法官，这让它拥有重要的战术优势，因为华尔街银行几乎拥有无限的资金，有能力聘请所谓的专家证人（其中许多人为专业学者；只要出价合理，他们什么证都愿意做）；这些专家利用复杂的方法论，证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夸大了效益，低估了成本。

这可不是大银行第一次使这样的招了。2010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执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项规定，让股东能够更容易任命公司

董事。华尔街为此起诉证券交易委员会，称委员会针对这一新规定开展的成本效益分析工作不够充分。银行聘请的律师和“专家”证人涌入联邦上诉法院进行辩护。最终法院同意华尔街的看法。国会希望赋予股东更多的公司董事任命权，但法院的判决结果终结了国会这一努力，至少暂时如此。

显然，每当政府采取重大行动时，必须权衡相应的成本和效益。不过大企业和大银行拥有先天的优势，能够影响到政府权衡的结果，即它们有财力聘请专家和顾问，让他们按照它们所希望的方式来衡量成本和效益。法规程序的其他参与方基本没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无法开展如此全面的研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此外，在华尔街监管问题上，我们在权衡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成本，即公众对整个经济制度的不信任度与日俱增。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不信任感是华尔街屡屡滥用权力的行径造成的。由于华尔街诡计多端，很多美国人认为经济游戏受到了操纵。

资本主义取决于民众的信任。没有信任感，人们甚至会规避合理的经济风险。他们开始认为，既然大公司明目张胆地作弊都没事，那像他们这样的小人物小打小闹也应该不会有事。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信任我们的经济制度。此外，当人们认为经济游戏遭到操纵时，政治煽动者能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兜售愚蠢的观点，轻松地蛊惑人心。

如果把这些成本进行加总，我们会发现得出的结果令人吃惊。华尔街导致美国弥漫在愤世嫉俗的负面情绪之中。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坚信，华尔街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能够无条件地获得由纳税人出资的救助；由于华尔街的影响力，政府没有要求华尔街银行重新商定普通美国人的抵押贷款；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所作所为，美国经济才会崩溃，导致普通美国民众好多年资不抵债。他们这样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沃伦·巴菲特出资救助高盛公司时，他获得了相应比例的股权。纳税人出资救助华尔街大银行时，为什么不能像巴菲特一样获得相应的股权

呢？当银行再次实现盈利，纳税人没有享受到股价上扬带来的好处。我们只是帮它们缓冲股价下挫的风险。

虽然华尔街银行高管冒险行事，或者忽视过度冒险行为，但他们仍能保住工作，免予被起诉，逃过牢狱之灾，并且继续赚大钱。这一现实情况与华尔街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不是没有关联的。这也是为什么旨在防止金融危机重演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效力遭到削弱，并且用于执行这一法律的规则充斥着各种漏洞，漏洞大到足以允许华尔街高管开着法拉利豪车穿过。愤世嫉俗情绪造成的成本已经渗入美国整个社会，激起民众的怀疑和愤慨，而这些负面情绪又深深地困扰着美国政坛。

行政部门规定引发诉讼、罚款金额太少，并且和解协议过于温和，这一切导致这些规定被注水，效力大打折扣，实际效果相当于废除了不讨喜的法律。以摩根大通公司为例，摩根大通是华尔街最大的银行，它依仗着雄厚的财力，涉足政治，并且高价聘请大批法律人才来维护自身利益。2012年，这家银行因为押注与企业债务有关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亏损了62亿美元；事后它公然撒谎，矢口否认损失惨重。[注]后来公众发现，摩根大通一开始还非法行贿，结果自讨苦吃。同年，摩根大通被指控涉嫌多项罪名，包括在催讨信用卡债务时进行诈骗；在取消房屋抵押贷款赎回权问题上采用错误、误导性的做法；为了赢得在华业务，违反《反海外腐败法》，雇用中国官员的子女。司法部和证券交易所针对它展开了多项调查。[注]

在2012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摩根大通花了九页纸的篇幅，介绍它所面临的法律纠纷问题，并估算解决所有的纠纷可能需要耗费68亿美元。[注]不过鉴于摩根大通总资产达到2.4万亿美元，股东权益达到2090亿美元，68亿美元对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注]关键的是，摩根大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罚款，但这并未能阻止它无视法律。没有一家大银行或企业愿意错过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除非当被抓和起诉的概率乘上可能的罚款金额，得出的结果大于潜在的收益。如果与潜在收

益相比，罚款金额很少，那么在他们看来，它可以被算入商业成本。

2013年，摩根大通支付了130亿美元的罚款，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不当出售不良按揭贷款一事与司法部达成和解。这对它的股价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注]2014年，花旗集团支付70亿美元，就相同的欺诈行为达成和解，这也没有明显地影响到花旗集团的股价。[注]美国银行2014年和解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66.5亿美元，此事产生的效果也差不多。事实上，在美国银行达成和解的前几天，这一新闻在华尔街尽人皆知，但是美国银行的股价仍然大幅上扬。[注]这是因为美国银行支付的和解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抵税的。（抵税标准取决于和解金是否支付给受害者。例如，在美国银行166.5亿美元的和解金中，至少有70亿美元用于救济私房屋主和被殃及的社区。[注]显然美国银行会将这70亿美元算入应税收入当中。）此外，这一和解金与美国银行收入相比则相形见绌。美国银行2013年税前收入高达170亿美元，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40亿美元。[注]

2014年，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宣布，银行巨头瑞信对有关帮助美国富人避税的刑事指控表示认罪。霍尔德自鸣得意地说："这一案件证明，任何金融机构，无论它的规模和全球影响力有多大，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注]但金融市场对28亿美元的罚款不以为然。[注]事实上，在霍尔德宣布瑞信表示认罪的当天，瑞信股价上扬，而且它是当天唯一一家股价上涨的大型金融机构。[注]瑞信银行随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瑞信银行首席执行官甚至表现得很乐观："我们和客户进行了讨论。大家感到放心，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注]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司法部甚至没有要求瑞信银行交出避税客户名单。

当一项法律规定了最高罚款时，金额经常定得很少。如果许多行业不希望人们知道它们反对某项法律，同时又希望削弱它的效力，这时它们会采取这一政治策略。例如，在2014年，公众严厉指责通用汽车未能

处理好汽车点火开关存在缺陷的问题，导致至少13人丧生。几十年来，通用汽车多次收到有关点火开关的投诉，但对此无动于衷。最后，政府采取了行动，对这家汽车制造商处以350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国家交通与机动汽车安全法》所允许的最高罚款金额。交通部长安东尼·福克斯之后斥责说："通用汽车违反了法律……他们未能履行维护公众安全的义务。"[注]对于总值达1000亿美元的通用公司而言，3500万美元的罚款根本算不了什么。《国家交通与机动汽车安全法》甚至没有规定可以对故意违反安全标准并致人死亡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

在2013年，哈里伯顿公司对一项刑事指控表示认罪，承认销毁了深海地平线原油泄漏事故的相关证据。这一刑事认罪登上了新闻头版头条。但它仅支付20万美元的罚款，这还是相关法律针对此类轻罪行为的最高罚款。（它还同意向国家渔业和野生动物基金会提供5500万美元的可抵税"自愿捐款"。[注]）哈里伯顿2013年收入达到294亿美元，所以20万美元的罚款只是一个零头。[注]此外，哈里伯顿没有高管因此而锒铛入狱。

政府官员喜欢在电视镜头前作秀，愤慨陈词，宣布对违法企业进行貌似严厉的处罚。但真正应感到愤慨的是公众，此外对企业的处罚与企业收入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企业和政府达成和解，接受处罚，无须受审。企业达成和解时，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最多是进行含混不清或避重就轻的事实陈述。这样，它们可以避免出现下列情况，即股东或者其他私人诉讼当事人可能因为利益受损，利用有罪判决，对公司提起诉讼。

政府也倾向于达成和解，避免旷日持久的庭审。政府执法部门本身预算少得可怜，如果庭审时间过长，则无力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此外，华尔街银行和大企业通常重金聘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级别的律师；相比而言，政府部门的律师收入低微，通常更年轻、经验更少，并且在开展庭前准备工作时，也没有这么多律师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协助他

们收集书证和进行取证。此外，政府执法部门和公司达成和解，可以避免败诉的尴尬。对于企业和政府而言，达成和解似乎是双赢，但此类和解有损于执法机制。

公司高管下令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最终都逍遥法外。制药巨头辉瑞多次达成和解与认罪，并承诺将改过自新。但在2009年，它再次认罪，承认行贿医生开一种超说明书使用的止痛片，并缴纳12亿美元的刑事罚金。不过辉瑞没有一名公司高管因此被指控犯罪或被定罪。同样，华尔街高管犯罪，导致华尔街几近崩溃，无数美国人的积蓄化为乌有，但6年过去了，没有一名华尔街高管被定罪或起诉。雷曼兄弟公司的"回购105"计划旨在蓄意隐藏公司财务问题，这是公认的事实。雷曼兄弟公司在每个季度末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转移出公司资产负债表，等过了几天到了下一个季度初，又将这些债务转移回资产负债表。这是雷曼兄弟公司精心设计的骗局。[注]法院指派的审查员对此中细节进行了详细披露。不过雷曼兄弟公司的前管理人员没有因此面临刑事起诉。相反，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出售一盎司的大麻而被判刑几年。

我还要指出，州法官和总检察长人数众多，他们都是通过选举当选的，这让富有阶层有机可乘，来影响市场规则的解释和执行方式。

32个州通过选举选出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初审法庭法官。[注]美国全国87%的州法院法官是经选举产生的，这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其他国家，在征求立法机构的建议和同意之后，法官即可获得任命。正如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所说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通过选举的方式挑选出公平公正的法官。"[注]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司法选举不是很引人注目。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司法竞选活动费用大幅增加，并且争议频频。最高法院

2010年对联合公民案做出裁决结果，放开了企业选举捐款的闸门。之后外部团体对司法选举活动的捐款飙升。在2012年选举周期，独立支出金额达到2410万美元，是2001~2002年选举周期的270万美元的9倍。[注]埃默里大学法学院乔安娜·谢泼德教授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法官从企业获得的捐款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有利于企业诉讼当事人的裁决。[注]美国进步中心一份报告也显示，捐助司法选举能为企业带来回报。报告指出："在短短几年里，在大企业的努力下，得州和俄亥俄州最高院等法院发生了变化，试图追究企业责任的个人在法院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注]作者还举例称，俄亥俄州保险业捐助法官竞选活动，法官当选后投票推翻了保险业所厌恶的多项决定；得州能源公司资助法官竞选活动，法官则在解释法律时偏袒它们。

州总检察长负责通过法律诉讼来执行规定。他们也面临着选举和重新选举的问题。企业捐助总检察长竞选活动的经费持续增加。《纽约时报》在2014年底调查发现，企业通过大型律师事务所将竞选捐款输送给总检察长，以争取他们的合作，让他们同意中止对企业的调查，商定对企业有利的和解协议，并且说服联邦监管部门不要进行起诉。[注]例如，犹他州总检察长在与美国银行一名说客秘密会面之后，不顾手下人员的反对，撤销了针对美国银行的未决案件。这名说客也曾担任过总检察长一职。制药巨头辉瑞被指控推销一种药物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至少遭到20个州的起诉。为此，辉瑞在2009~2014年向多位州总检察长捐助了几十万美元，希望推动达成有利的和解协议。AT&T公司是多位州总检察长的大捐助商；在多个州调查该公司乱收费行为时，这些总检察长选择对它手下留情。[注]

市场规则执行工作并不是仅仅依赖于政府检察官。个人、公司和团体如果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进行起诉，例如专利侵权、垄断、违约、诈骗和其他涉嫌违规的行为。不过此类诉讼成本非常高。许多小企业和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无力承担诉讼费用，除非诉讼案件涉及严重的

伤害情节，有出庭律师愿意进行辩护，认为自己有把握为客户赢得一大笔损害赔偿金，从而能从中分一杯羹。

这让大企业和富豪们拥有先天的优势。他们能够聘请律师进行起诉或者辩护。孟山都、康卡斯特、谷歌、苹果、通用电气、花旗集团、高盛等公司财力雄厚，经常战略性地运用诉讼手段，设置障碍，阻止新兴企业进入市场。相比之下，新兴企业根本没有如此深厚的法律资源。大企业提起诉讼，或者仅是威胁起诉，就足以吓退最为乐观的小企业主或创业者。富人同样聘请大批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防止遭人索赔，并且为了一点小事就威胁打官司。大公司或富人拥有经济支配力，可以通过掠夺性诉讼手段，攫取法律和政治权力，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经济支配力。

直到最近，小企业和普通民众还能够进行集体诉讼，不过现在他们发起集体诉讼的难度加大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合同包括强制仲裁条款，有效地阻止了他们发起集体诉讼。此外，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由共和党籍总统任命。他们一直忙于把集体诉讼的道路堵死。他们在被任命为大法官时得到了企业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会顾及企业的利益，这一点不容置疑。2011年，在“康斯普什夫妇诉AT&T移动有限公司”一案中，多数大法官裁定，公司能够合法地在消费者合同中加入禁止客户进行集体诉讼的条款。[注]卡尔顿·菲尔兹·乔登·伯特公司调查显示，在2012年，将禁止集体诉讼的条款纳入合同的大公司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注]2013年，在“比伦德诉康卡斯特”一案中，五位共和党大法官推翻了有关康卡斯特向费城地区消费者支付8.75亿美元损害赔偿金的判决结果。[注]之前康卡斯特被指控排除竞争和收费过高。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在为最高法院撰写司法意见书时指出，康卡斯特用户未能证明康卡斯特公司针对整个用户群体实施侵权行为，以及损害赔偿金是针对所有人，而不是个人的合理赔偿。

这些判决结果削弱了消费者、员工或小企业联合起来实施法律的能

力。AT&T和康卡斯特等巨型企业手握大权，能够压制消费者和员工的声音。因此我们怎么估计这一权力都不为过。

---

1. 欲了解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的历程，参阅“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s,”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History of Vaccines website.欲了解制药公司如何采取行动推动设立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参阅 “History of Vaccine Safet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ebsite, last updated November 4, 2014.
2. 参阅Gregg Lee Carter, Gun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2006), pp.193-94.
3. Protection of Lawful Commerce in Arms Act, House Report 109-124, June 14, 2005.
4. Tom Zeller, Jr.,“Experts Had Long Criticized Potential Weakness in Design of Stricken Reactor,”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11.另参阅 “U.S.Boiling Water Reactors with ‘Mark 1’and‘Mark 2’Containments,”U.S.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website.
5. Zeller, “Experts Had Long Criticized Potential Weakness in Design of Stricken Reactor.”
6. “Hazards of Boiling Water Re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Nuclear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Service website, last updated March 2011.
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General Electric: Profile for 2012 Election Cycle,”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orgs/summary.php?id=D000000125&cycle=2012).
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 bying: Lobbyists Representing General Electric,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lbs.php?id=D000000125&year=2012).
9. 参阅国家委员会有关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漏油和海底钻探情况的报告，Deep Water: The Gulf Oil Disaster and the Future of Offshore Drilling, U.S.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website, January 2011.另参阅 Stephen Power and Ben Casselman, “White House Probe Blames BP, Industry in Gulf Blast,”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11.
10. Stephen Power,“Regulators Accepted Gifts from Oil Industry,Report Say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5, 2010.
11. “Chronology: A Regulatory Free Ride? NHTSA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UV,” PBS website(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 /rollover/unsafe/cron.html).
12. 参阅“The Secret Recordings of Carmen Segarra,”radio broadcast, This American Life, Chicago Public Media, September 26,2014.
13. Daniel Gilbert, Alexandra Berzon, and Nathan Koppel, “Deadly Explosion Prompts Fresh Look at Regul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2013.

14. “Statement of David Michaels, PHD, MPH, Assistant Secretary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U.S.Department of Labor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 Subcommittee on Workforce Protections,” October 5, 2011 (https://www.osha.gov/pls/oshaweb /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TESTIMONIES&p_id=1482).

15. 欲了解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参阅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Budget Information: Fiscal Year 2015 Budget Overview,” NHTSA website, p.14.欲了解巴格达使馆安保支出，参阅U.S.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Inspection of Embassy Baghdad and Constituent Posts, Iraq, U.S.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website, May 2013.

16. John Koskinen, speech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April 2,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IMC7syoX0&feature=youtu.be).

17. “IRS Releases FY 2012 Data Book,”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website, March 25, 2013.

18. Rob Nixon, “Funding Gap Hinders Law for Ensuring Food Saf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8, 2015.

19. Commissioner Michael V.Dunn,“Opening Statement, Public Meeting on Final Rules Under the Dodd-Frank Act,”U.S.Commodities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website, October 18, 2011.

20. SIFMA v.U.S.CFTC, 1:11-cv-02146-RLW (2011) (http://www.scribd.com/doc/74545374/Financial-industry-groups-lawsuit-against-the-C-F-T-C).

21. Business Roundtable and Chamber of Commerce v.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Chamber Litigation Center website.另参阅 Christopher Doering, “Wall St.Sues CFTC Over Commodity Trading Crackdown,” Reuters, December 2, 2011.

22. U.S.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JPMorgan Chase Whale Trades: A Case History of Derivatives Risks and Abuses,”U.S.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website, March 15, 2013, p.1.

23. Jessica Silver-Greenberg and Ben Protess,“JPMorgan Caught in Swirl of Regulatory Woes,”New York Times, May 2,2013.

24. “Form 10-Q, Quarterly Report,”JPMorgan,filed August 7,2013, pp.198-206 (http://investor.shareholder.com/jpmorganchase/secfiling.cfm?filingID =19617-13-354).另参阅 Stephen Gandel,“JP Morgan's Legal Problems Continue to Mount,”Fortune, August 19, 2013.

25. Floyd Norris, “The Perils When Megabanks Lose Focu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3.

26. Francesco Guerrera,“The J.P.Morgan Settlement: Misconceptions Debunked,”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5, 2013.

27. Michael Korkery, “Citigroup Settles Mortgage Inquiry for $7 Billion,”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14.

28. Christina Rexrode and Andrew Grossman, “Record Bank of America Settlement Latest in Government Crusad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1, 2014.

29. “Bank of America to Pay $16.65 Billion in Historic Justice Department Settlement for Financial Fraud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website, August 21, 2014.

30.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2013 Annual Report, Bank of America website, table 2, p.23.

31. James Kwak, “Why Is Credit Suisse Still Allowed to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lantic, May 20, 2014.

32. “Credit Suisse Pleads Guilty, Pays $2.6 Billion to Settle U.S.Tax Evasion Charges,” Forbes, May 20, 2014.

33. Katharina Bart, Karen Freifeld, and Aruna Viswa- natha, “Credit Suisse Guilty Plea Has Little Immediate Impact as Shares Rise,”Reuters, May 20, 2014.

34. John Cassidy, “Credit Suisse Got Off Lightly,” New Yorker, May 20, 2014.

35. Jonathan Berr, “GM's Pain Will Exceed That $35 Million Fine,” CBS News website, June 1, 2014.

36. Clifford Krauss, “Halliburton Pleads Guilty to Destroying Evidence After Gulf Spill,”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3.

37. Halliburton, “Halliburton Announces Fourth Quarter Income,” press release, January 21, 2014, p.1.

38. “Court-Appointed Lehman Examiner Unveils Report,”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10.

39. Adam Liptak, “Rendering Justice with One Eye on Re-election,”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08.

40. Adam Liptak, “Rendering Justice with One Eye on Re-election,”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08.

41. Alicia Bannon, Eric Velasco, Linda Casey, and Lianna Reagan, The New Politics of Judicial Elections 2011-12, New York University,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October 2013, p.5 (http://newpolitics report.org/report/2012-report/).

42. Joanna Shepherd, “Justice at Ris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nd Judicial Decisions,”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for Law and Policy website, June 2013.

43. Billy Corriher, “No Justice for the Injured,”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ebsite, May 2013.

44. Eric Lipton, “Lobbyists, Bearing Gifts,Pursue Attorneys General,”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4.

45. Eric Lipton, “Lobbyists, Bearing Gifts,Pursue Attorneys General,”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4.

46. AT&T Mobility LLC v.Concepcion et ux., 563 U.S.321 (2011).

47. Jeremy B.Merrill,“One-Third of Top Websites Restrict Customers'Right to Su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4.

48. Comcast v.Behrend, 569 U.S.——(2013).

第九章 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机制

现在该进行总结了。市场是人类的创造物，就像国家、政府、法律、企业和棒球一样。和其他体系一样，市场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市场规则都激励着人们。在理想的情形下，它们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相互协作，追求成效和创造力；它们帮助人们过上所追求的生活。市场规则还反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善恶、价值和公平的判断。市场规则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我们希望市场规则朝着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更好、更公平的方向发展变化，不过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市场规则有时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些人掌握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规则。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私有财产、约束垄断、合同、破产或处理违约问题的其他方式，以及规则的执行是所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需要它们。如前所述，市场各大组成部分取决于立法者、行政部门主管官员和法官做出的大量决定。随着环境发生变化、技术出现变革、新的议题和问题不断涌现，以及老的解决方案变得过时，他们对这些决定进行修正或修改。这一重要机制与政府的大小或"侵扰性"没有任何关系。它与政府税收或支出规模也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这些决定，市场根本无法运转。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都必须做出相关的决定。

是什么指导着这些决定呢？由于人们通常无法就公共利益达成共识，有关公共利益的抽象概念很难提供有益的指导意见。由于我们很难评估拟议措施的效益和成本，"提高效率"也无法提供实际的指导意见。此外，虽然一项决定能够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同时又没有导致其

他人陷入困境，但是如果受益群体本来就属于顶层阶级，那么这一决定将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在理想的状态下，此类决定应能够反映相关人员在民主制度的授权下，依据大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和意愿做出的最佳判断。

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些决定通常是人们暗地里讨价还价、经协商达成的结果。巨型企业、大银行和富人掌握着大量资源，能够对这些协商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确保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他们财力雄厚，能够聘请说客，捐助选举，开展公关活动，聘请大批专家，资助研究项目，雇用大批律师，并且暗地里承诺公职人员在离职后为他们提供工作。

正如我所指出的，这对立法者、民选法官和民选总检察长的影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对于负责实施和执行法律的委任官员而言，这一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但同样有效。（虽然最高法院一些大法官和任命他们的总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不出意料，近些年获得任命的大法官更具党派性。）

这一机制由此形成并维持一个恶性循环，即经济支配力滋长着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反过来进一步扩大经济支配力。政治制度就市场组织方式做出决定，而大企业和富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最终成为此类决定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的财富因此进一步增加，进而提升了未来进一步影响这些决定的能力。

我所描述的现象并不等同于腐败问题。美国很少有公职人员会直接索要或收受贿赂。大企业和富人不动声色地诱惑着政府公职人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如果选择说客、有偿专家证人、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律师所精心铺设的大道，而不是在整个制度认为存在威胁的领域独力开辟新路，将要容易得多。此外，企业和富人提供竞选献金，并承诺为官员离开公职之后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这让官员所首选的道路更具有诱惑力。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奖励着受过良好教育和出身好的人，同时也惩罚着不具备这些优势的人，但这并不是人们财富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唯一原因。政府降低税收，慷慨地增加补贴，法律漏洞不断扩大，这一切有利于企业和富人精英阶层；诚然，精英阶层的游说活动也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政府税收和补助只是冰山一角。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渗入“自由市场”各大组成部分中。即便没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也没有减税和补贴，相对于劳动者收入而言，企业、高管和投资者收入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仍会上升。高管和投资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情况。上文所提到的恶性循环可以独立做到这一点。

在2014年，企业税前利润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到至少近85年来的峰值，与1942年创造的纪录持平。[注]1942年正值“二战”，战争推高了企业利润（不过政府以征税的方式征收了绝大部分利润）。在2000~2014年，企业税后季度利润从5290亿美元上涨到了1.6万亿美元。[注]这并不代表着资本收益增加了，而是意味着企业的经济权力在扩大。正如我在后文所提到的，股市因此屡创新高，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而大多数投资者本来就属于美国顶层富人阶层。同时，劳动收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滑。在2000年，劳动收入在非农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63%。[注]在2013年，这一比重下跌为57%，这代表着每年从劳动部门转移到资本部门的收入约为7500亿美元。[注]重要的是，随着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不平等增加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份额上（见图9.1和图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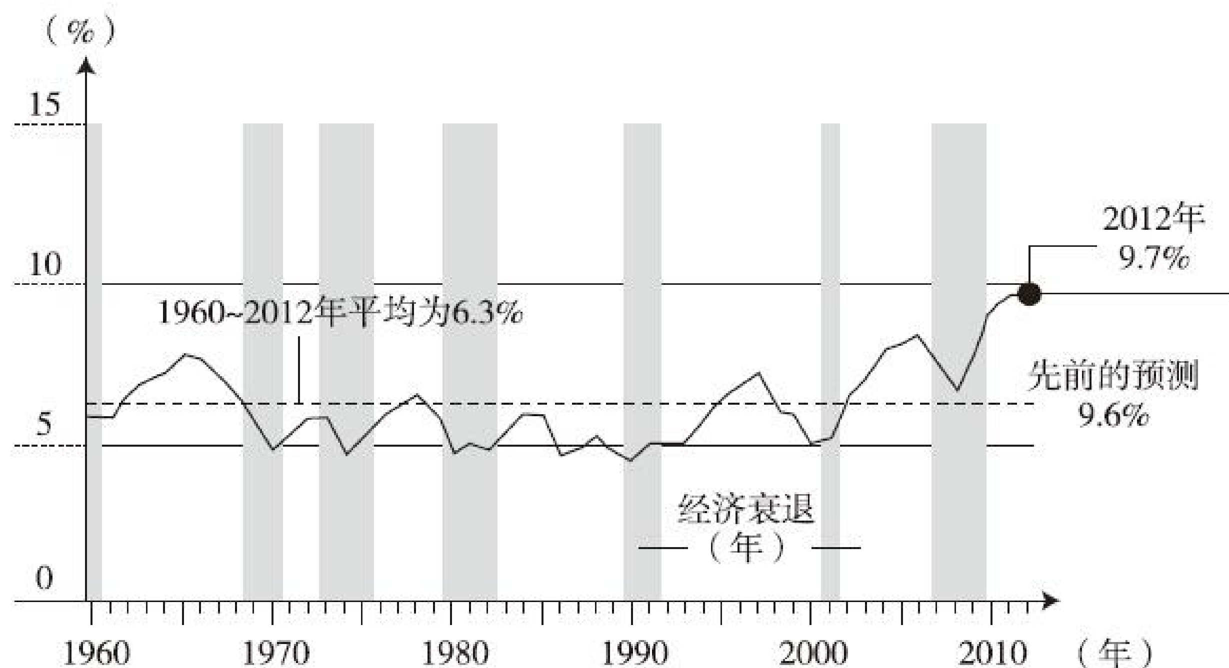


图9.1 企业税后利润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的趋势。注我所描述的这一进程有助于解释这一论点中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皮凯蒂假设，只要资本收益率在长期内高于经济增长率，则资本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不过他未能解释为什么资本收益率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下滑。通常情况下，人们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难获得不错的资本收益率。他在书中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最近几十年里，多数超级富豪的财富来自劳动收入，而不是继承，至少美国的情况是如此。一种可信的解释是富人对市场运行规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富人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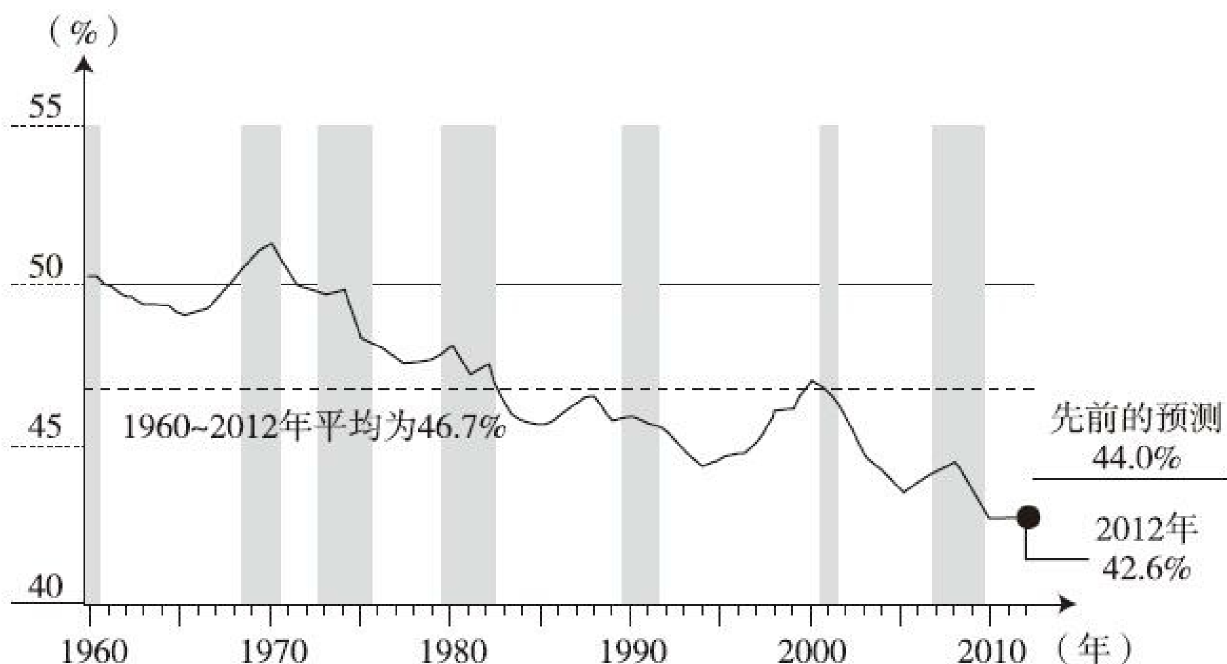


图9.2 个人工资和酬薪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洛伊德·诺里斯提供的哈沃分析图

这一恶性循环并非不可避免或者不可逆转。我们同样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即共同繁荣带来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通过组织市场，让更多人享受经济成果和获得机遇。在“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里，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经历了这一良性循环。在本书第三部分，我将探讨如何再次实现这一良性循环。

许多人不希望现行市场机制遭到全面曝光。有关独立且有别于政府的“自由市场”的理念为他们提供了掩护。他们对这一市场机制的影响力最大，并希望保持现状。有关“自由市场”的神话非常有用，掩盖了他们手握大权这一现实。为了扭转这一恶性循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清市场机制的本质。这也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分析市场机制对经济成果的分配情况产生何

种影响，以及它距离我们心目中的必要、公平的结果有多远。我将在第二部分探讨这一问题。为了让社会最富裕群体从事当前的工作，当前作用于他们的激励机制有必要吗？为他们提供的激励是否公平地反映了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工作价值？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激励是否足以让大部分人过上他们所期望的生活，并且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和下一代能够通过努力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为穷人提供的激励是否足以让他们努力上进，达到社会对他们的预期，同时确保他们拥有一定的尊严？正如我将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

1. Floyd Norris, “Corporate Profits Grow and Wages Sl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4.
2. “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with Inventory Valuation Adjustment (IVA) and Capital Consumption Adjustment (CCAd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updated December 23, 2014.
3. Robert J.Samuelson, “Robert Samuelson: Capitalists Wait, While Labor Loses Ou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13.
4. Robert J.Samuelson, “Robert Samuelson: Capitalists Wait, While Labor Loses Ou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13.
5.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5.

第二部分 工作和价值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几年前，我应邀到一家发电厂做演讲，听众是厂里的工人。当时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成立工会。一个年轻人打算投票进行反对。他对我说他的时薪为14美元，他认为自己只值这点工资。“那些能赚几百万美元的人很厉害。如果我念过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我也能赚那么多钱。但我没有，所以我现在只能干体力活。”注注

他显然不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当时，美国私营部门劳动大军有超过30%的人加入了工会。这让美国的蓝领工人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到相等于30美元的平均时薪（按当前美元价值计算）——要知道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读完中学。他们可不是靠聪明才智争取到这一工资待遇的，而是依靠他们的议价能力。不过自那以后，工会为小时工争取不错工资的能力大幅下降。这就是我遇到的这位年轻人每小时的“价值”不超过14美元的缘故。

不过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等。这一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致许多低收入者认为赚得少是自己的错。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智商不高或者品格存在缺陷，自己很失败，所以羞愧难当。同样，这一观念让许多高收入者觉得自己很聪明、有胆识且高人一等，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如此成功的。这一信念令人宽慰，似乎为他们的荣华富贵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正当性。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财富只是一场经济竞赛的奖品，而他们和其他高收入者对竞赛规则有着不成比例的

影响力。可能他们也不希望公众这么看。

在2013年，SAC资本顾问有限公司经理史蒂夫·A.科恩收入达23亿美元。他在掌舵这家对冲基金公司的20年间，累积的财富约为110亿美元。[注]他真的值这么多吗？从无关紧要、套套逻辑的角度来讲，他肯定值这么多，因为他赚了这么多。我曾公开质疑科恩的薪酬。对此，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丹·米歇尔回应说：“只有当客户自愿选择私人对冲基金进行投资，认为这样物有所值，私人对冲基金人员才有可能赚钱。”[注]

不过人们选择史蒂夫·A.科恩进行投资，也许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一理由同样会让人质疑他的“价值”。司法部2013年提起刑事诉讼，指控SAC资本顾问公司在科恩主导下进行的内幕交易“数额巨大、普遍存在，且规模在对冲基金业历史上没有先例”。[注]科恩九名前员工和现任员工对涉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指控表示认罪。SAC资本顾问公司认罪，并支付18亿美元的罚款。多年来，投资者之所以选择SAC资本顾问公司进行投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这为他们带来不菲的回报。如果内幕交易行为早被发现，SAC资本顾问公司因此遭到起诉，那它的投资回报就没这么高，投资者也不会选择这家公司进行投资，而科恩个人财富也不可能达到110亿美元（减去18亿美元的罚款）。[注]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的工会和60年前一样势力强大，则和我交谈的工人时薪很可能达到30美元，而不是14美元。如果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更有力，并且得到全面执行，那么史蒂夫·科恩不可能积累高达110亿美元的财富，他的客户也不可能会“自愿”选择他的公司进行投资，认为这样“物有所值”。

很多人认为，人们的价值和市场给他们的回报相当。从这一毫无意义的角度来讲，人们的“价值”和他们在市场上获得的报酬相等。一些人

将这一套套逻辑与下列道德主张混为一谈，即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应得的。人们普遍认为，在当前经济制度下，一个人的收入与自身努力程度和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属于精英社会[注]。[注]不过略加思索后，我们会发现，除了个人价值，诸多其他因素也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例如金融遗产、个人社会关系，以及因自身长相、运气、婚姻和所处社会阶层而受到的歧视或青睐。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曾说过：“如果我们宽待自己，放松要求，我猜我们可以说自己1/5（的收入）是‘挣来’的。其他收入是我们作为这个极富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一员而获得的世袭财产。”[注]

这一“极富生产力的社会制度”现在将很大一部分收入分配给了顶层人群，前0.1%人群的收入占比达到80多年来的最高值。[注]这一不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如何分配和利用权力所产生的结果。除非有人认为权力分配非常公平，否则不能由此推定，从道义角度而言，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应得的。

正如我之前所提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企业和企业高管、华尔街的大银行和富人对市场组织方式拥有不成比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资本主义各大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让资本所有人（公司、公司股东和高管；华尔街交易员、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股权经理）拥有优势，同时对普通工人设置障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股价上涨，工资中位数却下滑。

股价上涨，让顶层人群收入和财富大幅增加。[注]在1994~2014年的牛市期间（尽管2008~2011年经济出现衰退），股票大涨，美国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到2010年，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群直接或间接通过养老金计划持有的股票价值占到美国股票总价值的35%。[注]前10%的最富有人群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则超过了80%。不过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储蓄来投资股市，所以未能享受到牛市带来的好处。底层90%的人群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仅为19.2%。在2014年，超过2/3的美国人过

着“月光族”的生活。[注]

如果市场组织规则全面照顾社会不同角色和职业的利益，那么一些群体的收入可能比现在要高得多。社工、教师、护士、保育员和老人护理员属于最低收入职业，不过有证据证明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具有奉献精神，颇具才能，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远高于他们的收入。例如，一项研究显示，一名优秀的教师可以让每个班的学生终生收入平均现值增加25万美元。[注]如果提高教师工资待遇，这一职业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许多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高频交易员、说客和高端企业律师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远低于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在不断加速的零和游戏中，将一部分人口袋中的钱拿出来，放进另一部分人的口袋中。以高频交易员为例，他们借助电子系统获得微弱的优势，比其他交易员提前零点几秒获取信息，从而实现获利。这导致各家公司不得不竞相加大对此类电子系统的投入。同样，由于对手高薪聘请大批企业律师发起诉讼或进行辩护，各家公司不得不同样花大价钱聘请律师军团。

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并不能取得能够改变社会的新发现，或者创造出丰富和深化人类意识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创新属于金融和战术创新，也就是找到新方法，从一组资产（包括员工的资产）中榨取更多的油水，或者将他人资产和收入据为己有。这类竞赛耗尽了美国一些接受过最好教育的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本可以运用自己的才能，从事对社会更有益的工作。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哈佛大学近一半的毕业生投身华尔街。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比例有所下滑，但是在2009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回升。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的研究显示，哈佛高年级约70%的学生定期向华尔街和企业咨询公司投送简历。[注]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的情况也差

不多。在普林斯顿2010届毕业生中，有近36%的人投身金融界。[注]虽然这一比例与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6%相比有所下滑，但是如果算上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作的毕业生，则这一比例超过了60%。

由于富有的校友慷慨进行捐款，这些精英大学拥有庞大的捐赠基金。校友在捐款时获得税收补贴。他们中有很多人希望通过捐款提高他们的孩子被母校录取的概率，这样他们的下一代毕业后也同样能够成为极为富有的金融家、管理咨询顾问和企业高管。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让纳税人为更有益于社会的职业提供补贴，这个办法就是如果毕业生选择社工、保育、护理老人、医护、法律援助和教育等职业，则他们的学生贷款可被免除。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这一假设属于套套逻辑，忽视了法律和政治制度如何界定市场。最为根本的一点是，它忽视了权力问题。不知情的人们受它诱骗，误以为市场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他们无力也不应改变这一状况。

依据这一逻辑，我们不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因为拿最低工资的工人自身价值和收入相当。如果他们的价值更高，那他们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如果我们迫使雇主向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雇主将不得不进行裁员。同样根据这一逻辑，底层90%的人群中位数工资30年停滞不前，并且自2000年起开始下跌，这是因为新型软件技术和全球化进程导致许多老的工作岗位变得多余，中等收入工人的价值因此不如以前。[注]如果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报酬，那么唯一的方法是获取更好的工作技能，提高自身价值。

按照这一推理，大公司首席执行官配得上他们酬薪的每一分钱。50年前，他们的平均酬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今天则接近200倍。[注]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值这么多，否则他们拿不到如此丰厚的薪酬。如果削减或限制他们的工资，则有可能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他们的工作业

绩，进而损害仰仗于首席执行官的其他人的利益。依据这一逻辑，华尔街人配得上每年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的薪酬，因为人们愿意支付他们这么高的薪酬。如果限制他们的薪酬，将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扭曲市场，导致金融制度变得极为低效，甚至有可能到致命的地步。

这一逻辑纯属凭空捏造，取代了清晰的思路。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大企业通过影响财产、市场势力、合同、破产和执行等“自由市场”基本规则，提高公司利润，推高股价。企业高管、华尔街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股权经理成为前0.1%最高收入人群的主力军，他们很大一部分薪酬取决于公司不断上升的利润和股价。[注]此外，企业高管、华尔街交易员和经理能够对涉及诈骗、利益冲突、内幕交易和有限责任问题的特定规则施加政治影响力。此类规则同样影响他们的薪酬。如果对他们的税后收入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自己所支付的实际税率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过我关注的重点是他们在影响游戏基本规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作用不为外界所了解。正如我明确指出的，为鼓励社会最富裕群体从事当前工作而为他们提供的激励根本没有必要。这些激励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相对于其他人的社会价值。

我还将证明顶层人群政治和经济权力与日俱增，这与中产阶级政治和经济权力每况愈下有关。此外，我还将证明，当前作用于中产阶级的激励机制不足以让他们产生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和下一代通过努力工作，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最后，我将介绍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崛起。在美国，一些人贫困潦倒，另外一些人则过着富有的生活。有人将精英制度搬出来，为这一现象进行辩护，但是这两个群体的同时存在与这一解释相悖。正如我将要说明的那样，现行激励机制远不能够鼓励穷忙族努力，达到社会对他们的预期，并且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尊严。同时，为富闲族提供的物质奖励过多，远远超过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

1. 参阅Inequality for All, dir.Jacob Kornbluth, 72 Productions, 2014.
2. 这一对话被拍摄下来，出现在纪录片《不平等的时代》中。该纪录片由雅克布·科恩布鲁斯执导，荣获了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3. 参阅 Agustino Fontevecchia, “Steve Cohen Personally Made $2.3B in 2013 Despite Having to Shut Down SAC Capital,” Forbes, March 13, 2014.
4. Quoted in Joshua Rhett Miller, “Ex-Clinton Official Robert Reich Delivers Lecture on Greed While Earning $240G to Teach One Class,” FoxNews.com website, August 10, 2014.（郑重声明，福克斯新闻这一头条新闻中的声明是假的。）
5. 参阅U.S.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ealed indictme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SAC Advisors L.P., et al., July 25, 2013 (http://www.justice.gov/usao/nys/pressreleases/July13/SACCharging AndSupportingDocuments.php).
6. 参阅John Cassidy, “The Great Hedge Fund Mystery: Why Do They Make So Much?” New Yorker, May 12, 2014.
7.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的讽刺文章《精英统治的崛起》中杜撰“精英社会”一词。它用于描述下列社会，即固执地将智商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忽视了许多有天分、有才能的人，同时也忽略了测试表现优异的人品格存在缺陷的问题。不过自那以后，这一用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褒义词，用于描述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即所有人凭借个人优点取得成功，例如智商、努力工作、进取心和勇气等品质；此外，人们的经济回报与个人努力程度和能力成正比。参见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Jr.《精英社会的迷思》（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8. 参阅Stephen J.McNamee and Robert K.Miller, Jr., The Meritocracy Myth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9. Herbert Sim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oday's World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no.4 (2000): 749-56.
10. 参阅Anthony B.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1 (2011): 3-71.
11. “收入”通常被衡量为年收益流。“财富”则指每年未动用的收入流的累积总和。人们通常以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形式持有财富。财富也产生收入，例如储蓄、投资利息、红利，以及地产租金。
12. 参阅Edward N.Wolff,“The Asset Price Meltdown of the Middle Class,”panel paper, 2012 APPAM Fall Research Conference, presented November 10, 201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13. 参阅“Getting Paid in America 2014,”American Payroll Association, 2014

(http://www.nationalpayrollweek .com/documents/2014Getting Paid In America SurveyResults_FINAL_000.pdf).

14. 参阅Raj Chetty,John N.Friedman,and Jonah E.Rockoff,“Measuring the Impacts of Teachers II: Teacher Value Added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Adulthood,” NBER Working Paper No.1942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September 2013.

15. 参阅Amy J.Binder,“Why Are Harvard Grads Still Flocking to Wall Street?” Washington Monthly, September 2014.

16. 参阅Catherine Rampell, “Out of Harvard, and into Finance,”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1.

17. 参阅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1 (2003): 1-39 (tables and figures updated to 2012, September 2013, table A6).

18.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19. 参阅Jon Bakija, Adam Cole, and Bradley Heim,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Tax Return Dat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2010-22, Williams Colle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ebsite, 2008, revised January 2012.

第十一章 隐蔽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机制

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不断激增，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涨到1978年的30:1，到1995年的123:1，再到2013年的296:1，今天甚至超过300:1。[注]总的来说，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们过上了相当优越的生活。在1992年，美国酬薪最高的前500名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达到890万美元（按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注]其中大部分来自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的实现利润，我稍后会对此进行解释。20年后，这一平均薪酬激增到3030万美元，其中包括股票期权的实现利润。2009年，尽管美国经济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在剔除通胀因素后，仍接近1992年的两倍水平。

不仅首席执行官薪酬呈现爆炸式增长，其他的企业高管薪酬同样激增。以康卡斯特公司为例，我之前讨论过这家公司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依据康卡斯特公司2013年委托投票说明书，在2012年，康卡斯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L.罗伯兹酬薪总额达到了2910万美元，在美国酬薪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中排名第十。[注]在康卡斯特高管当中，罗伯兹并非孤例。康卡斯特子公司NBC环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克2012年酬薪达到了2630万美元。康卡斯特首席财务官迈克尔·安基拉基斯酬薪达到了2320万美元。康卡斯特有线通信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尔·史密特拿到了1830万美元，而康卡斯特执行副总裁戴维·科恩拿到了

1590万美元。

在1993年，大型上市公司薪酬前五名高管的薪酬总和平均占到公司收入的5%，2013年这一比重超过了15%。[注]公司本来可以将这笔支出用于研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或提高普通工人工资，不过这并非偶然现象。此外，这笔支出基本上都会从公司所得税中扣除，这也意味着我们其他人相应地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来补上这一差额。[注]

一个解释是这些年来公司股价一路高歌猛涨，而首席执行官和高管的职责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因此他们配得上不断飙升的酬薪。公司股价上涨，他们也完成了任务。正如哈佛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所言："对于首席执行官的高薪现象，最合乎常情的解释是一名优秀首席执行官的价值极高。"[注]即使我们假定他们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一问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首席执行官的价值比过去要高。这些年整个股市欣欣向荣。哪怕首席执行官过去30年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什么都不干，成天玩网络单人纸牌游戏，公司价值也照样会实现大幅增长。除非公司业绩优于整个股市的表现，否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首席执行官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配得上他们不断增加的酬薪。

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股市大涨和规则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变化有利于大公司和大银行，其中包括保护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大公司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特别是对标准平台和网络的控制（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没有强势的工会继续为他们争取利益，普通工人的市场势力日渐式微）；胁迫性合同（要求雇员、借方、顾客和特许经营商遵守有利于大企业的不公正条款）；有损小投资者利益的内幕交易；偏袒大银行和大公司而不是员工和小额贷款借款人的破产规则；让巨型企业和华尔街大银行受益的执法机制。诚然，一些首席执行官为了促成这些有利的结果，可能会开展游说或者其他政治活动，例如慷慨地提供或筹集政治捐款，为言从计听的政府官员

提供工作。不过这些活动可不是首席执行官获得优厚酬薪的理由。

虽然许多公司市值不断上升，但公司首席执行官并没有为此做出直接的经济贡献。那为什么他们的酬薪依然暴涨呢？一个理论是首席执行官在公司董事任命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首席执行官而言，公司董事必须可靠，和首席执行官意见一致。董事一年只需开三四次会，便能够获得丰厚的报酬，因此他们自然希望和公司高管搞好关系。公司董事是美国最好的兼职工作。在2012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董事的平均薪酬为25.1万美元。[注]此外，董事会包括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同行获得优厚的酬薪待遇，这对他们也有好处。董事会通常聘请被委婉地称为“薪酬顾问”的人员，就高管薪酬问题提供建议。“薪酬顾问”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卖淫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差不多。这些顾问通常依据其他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建立薪酬基准，其他公司的董事会通常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聘请他们。所有董事会都希望向首席执行官和华尔街分析师证明他们愿意重金聘请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逐年上调。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首席执行官为了自身和同行的利益，自导自演的一场虚假竞争。

依据美国公司法，股东在首席执行官薪酬问题上最多能够发挥咨询的作用。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纳入了“酬薪发言权”投票的规定，但这些投票对公司并没有约束力。[注]2013年，甲骨文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薪酬待遇达到惊人的7840万美元，甲骨文股东不得不投票进行否决。[注]但由于埃里森控制着董事会，股东投票反对丝毫不起作用。相比之下，在澳大利亚，如果公司25%或者更多的股东连续两年投票反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待遇，则股东有权迫使公司董事会进行重选。[注]由于这一规定，澳大利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幅度与美国同行相比要低得多；在2013年，澳大利亚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仅为该国普通工人工资的70倍。[注]

几十年来，美国公司董事会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它可以

解释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优厚的现象，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最近几年首席执行官薪酬激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首席执行官薪酬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司股份，而且这一份额保持稳步增长。[注]公司董事会热衷于向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提供股票期权（以特定价格购买股票的机会）和股票奖励（在公司股价达到一定水平时进行奖励）。当股价下跌时，董事会欣然地为首席执行官提供额外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补偿首席执行官遭受的损失；当股价再次上涨时，哪怕只是临时上涨，首席执行官也可以大量抛售股票，从中获利。

由于首席执行官能够获得此类形式的酬薪，所以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在短期内抬高公司股票价格，哪怕这一做法会影响到公司的长远发展。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的威廉·拉佐尼克教授证明，公司抬高股价的一种主要手段是利用公司收入或举债购回公司股票。[注]通过这一手段，公司减少公众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从而抬高公司股价。公司通过减少股票供应数量，可以轻松地抬高剩余股票的价格。在最近几年，公司一项重要支出是回购股票。在2001~2013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在回购股票方面的支出数额巨大，达到3.6万亿美元。

企业必须公开披露董事会批准回购股票的时间和回购股票总额，但无须公布何时进入股市回购股票。公司可以通过掮客匿名回购股票。所以当股价上涨时，股民根本不知道这是因为公司回购了股票。（如果股民知道公司这一诡计，他们购买或持有股票的意愿可能就没这么高了。）不过首席执行官们知道回购股票的具体时间和规模，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内幕消息，择机出售手中所持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他们很有可能选择在股价上涨时出售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公司股价上涨经常都是临时性的。

或许你们觉得这听起来非常像内幕交易或者利益冲突，但这并非偶然。首席执行官对股东担负着受信义务，因此他们这种行为构成了利益冲突。在1934~1982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股票回购是一种可用于开

展证券操纵和欺诈活动的潜在工具。[注]委员会要求公司披露回购股票的数量，并且规定公司在任何一个交易日内回购的股票价值不得超过公司股票总值的15%。不过到了1982年，里根总统任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翰·沙德在上任后不久便取消了这些限制规定。自那以后，首席执行官可以通过回购股票操纵公司股价。

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91年决定允许高管秘密兑现自己的股票期权，无须向公众披露。从技术层面来讲，高管属于内幕人员，清楚公司何时回购股票。股票期权因此变得更具吸引力。[注]到了1993年，克林顿政府规定，如果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也就是薪酬为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的形式，那么公司可对高管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注]不出意料，股票期权因此广受欢迎。

回购股票为公司高管抬高股价和兑现股票期权提供了便利，公司回购股票活动因此激增。在2003~2012年，回购股票金额最多的前十家公司（总计8590亿美元）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中有68%是股票期权或股票奖励。[注]仅在2013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的金额总计5000亿美元，消耗了他们1/3的现金流。[注]这一数额接近在2007年经济泡沫期间所创下的股票回购纪录。

股票回购让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损害了小投资者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公司回购股票的时机或数额。此外，回购股票占用了本可用于研发、长期业务拓展、员工再培训和提高员工工资待遇的支出。首席执行官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然后出售手中股票获利。首席执行官出售股票每“赚取”一美元，公司需要花更多的钱用于回购股票。显然这对公司优先目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二战”后的前30年中，美国大公司通常留存公司收入，进行再投资。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司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回购股票，且这一份额保持稳步增长。

在2003~2012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将大部分净收益用于回购股

票。[注]此举提振股价，首席执行官薪酬也水涨船高。例如，IBM一度以员工终生雇佣制和长期投资研发未来技术为豪。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IBM的重心开始发生转变，通过裁减员工、缩减研发经费和大举举债来回购公司股票。在2000~2013年，IBM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达到1080亿美元。虽然在此期间IBM的收益保持不变，但回购股票之举推高了公司股价。[注]到2014年，IBM出现了强弩之末的迹象。当它的股价终于开始下跌时，《纽约时报》撰文评论称，“所有这些‘股东友好’策略掩盖了一个丑陋的事实，即IBM近几年的成功更多地和金融工程有关，而不是和公司实际业绩有关”。[注]不管怎样，这一策略让IBM数任首席执行官获利不少，在2003~2012年他们的薪酬累计达2.47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注]

惠普公司的情况也差不多。它曾经一度推行员工终生雇佣政策，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解雇员工。[注]在2004~2011年，惠普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高达614亿美元，超过了它的全部收入。2012年，公司净亏损127亿美元。在2003~2012年，惠普公司几任首席执行官薪酬累计达2.1亿美元，其中超过1/3是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注]在2013年，苹果举债1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回购公司股票。[注]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2013年的薪酬达到了7380万美元，并且几乎都是股票期权，这并非偶然现象。[注]当苹果股票回购达到最大的效应时，想必库克会趁机兑现他的股票期权。

在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中，股票期权和限制性无偿配股所占的比重最大。[注]在2013年，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杰夫·比克斯基本工资只有区区200万美元，但他的股票奖励和股票期权高达1590万美元。[注]他和时代华纳签订的合同于2017年到期，届时他还将获得丰厚的离职金。不过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赚得更多。2013年，他兑现了价值33亿美元的股票。同一年他的基本工资为1美元。[注]

在首席执行官兑现手中股票之前，他们公司的股价通常都会上涨，就像在2008年股市崩盘的前一年，首席执行官们兑现了手中的股票。从这一狭义、错误的角度来讲，首席执行官们的“价值”和他们的薪酬相当。同样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股价也涨到令人“流鼻血”的高度。所以更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首席执行官薪酬和公司长期利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近期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犹他州大学的迈克尔·J.库柏教授、普渡大学的侯塞因·葛兰和剑桥大学的P.拉加文德拉·拉乌以三年为时间单位，研究了1500家公司在1994~2011年的业绩表现，注然后将它们的业绩表现与同业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与同业其他公司相比，首席执行官薪酬最高的前150家公司的股东回报率大约要低10%。事实上，首席执行官薪酬越丰厚，公司股东回报率越差。如果公司对首席执行官最慷慨，且股票期权在首席执行官薪酬计划中所占比例最高，那么公司的股东回报率平均比同业其他公司要低15%。库柏表示：“为首席执行官支付高薪的公司的回报率比支付低薪的公司要低2/3。这一浪费性支出破坏了股东价值。”更为糟糕的是，这几位研究人员发现，高薪首席执行官在职时间越长，所在公司业绩表现越糟糕。他们说，“公司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下滑”。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公司业绩在长期内表现很糟糕，它可以索回首席执行官在公司股价处于高位时兑现的股票期权和奖励股票。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2013年，在经历一个令人失望的财务年度之后，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平井一夫和他的高管退还了大约1000万美元的奖金。注不过这一做法不太可能成为常态。21世纪的美国经常是背道而驰——首席执行官即使捅了大娄子，仍可以将数百万美元收入囊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马丁·苏利文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美国国际集团股价下跌了98%，美国纳税人不得不出资1800亿美元来保住这家公司。尽管如此，他辞职时也拿到了4700万美元。注唐思腾仅担任维亚康姆首席执行官九个月就被解雇了，但他拿到了1.01亿美元的遣散费。虽然阿贝克隆比和费奇公

司2007年股价下跌了超过70%，但首席执行官迈克·杰弗里斯在2008年拿到了7180万美元，其中包括600万美元的留任奖金。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威廉·D.麦圭尔2006年因为一桩股票期权丑闻而被迫辞职，尽管他惹了不少麻烦，但仍拿到了价值2.86亿美元的薪酬。在汉克·A.麦金内尔出任首席执行官的五年里，辉瑞公司股票市值缩水1400亿美元，但他离职时拿走了价值近2亿美元的离职补偿金、终身免费医疗保险，以及一年650万美元的退休金（在辉瑞2006年公司年会上，一架飞机拖着横幅从上空飞过，横幅上写道“汉克，退还你的高薪！”）。[注]由于可口可乐公司在一段时间里业务停滞不前，收益下滑，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伊维斯特于2000年辞职，但他的离职补偿金高达1.2亿美元。[注]还有我前面提到的美洲航空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卡蒂。在美洲航空公司濒临破产并要求公司员工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时，卡蒂为了保护自己和其他高管的奖金不受影响，设立了一个秘密信托基金。[注]总之，公司高管即便搞砸了照样能拿到薪酬，且薪酬越来越高。[注]2011年9月，惠普首席执行官李艾科在被解雇后拿到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遣散费。无耻首席执行官的名单正在不断拉长。

与此同时，你、我和其他纳税人却要为这一切埋单。由于公司在申报所得税时可以从中减免首席执行官薪酬部分，我们不得不相应地缴纳更多的税来弥补这一差额。举个例子，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2013年拿到150万美元的工资，以及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和奖金。这为星巴克节省了8200万美元的税款。[注]1993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依据该规定，如果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则公司可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高管薪酬超出100万美元的部分。这项规定很快变成一场骗局。甚至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都看穿了这一规定。2006年，身为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他表示：“这项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公司发现他们能够轻易地绕过这一法律。它的漏洞比瑞士芝士上的洞孔还要多。它似乎助长了期权行业人员的气焰。这些精明的家伙利用像瑞士手表一样高端精密的设备，操

纵着像瑞士芝士一样漏洞百出的规定。”[注]

一种操纵方式是只要整个股市市值增加就发放股票“业绩奖”。不过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市值增加方面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只是看着自己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价一起上涨。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在2007~2010年，1215亿美元的公司收益用于支付公司管理层人员薪酬，并且其中大约有55%属于此类唾手可得的“业绩”薪酬。[注]

更有甚者，美国税制有利于财富持有者，而不利于工薪阶层。资本利得税率要低于普通所得税率。[注]首席执行官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与股市表现挂钩，当他们兑现股票期权和股票时，它们被计为资本利得。首席执行官们成为这一税制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在2010~2014年的牛市中，这些人大捞了一笔。

如果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的产权——我指如果他们真的拥有公司（我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想必股东能够决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此外，首席执行官本来就有义务向股东披露他们将股东的多少资金用于政治活动。“绩效工资”相当于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之间的合同，如果这一理念具有什么实际意义，想必首席执行官还应为公司长期业绩表现负责，并且向公司返还他们因公司股价只是临时上涨而获得的报酬。如果破产活动是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那么首席执行官不可能保护自己丰厚的高管薪酬，让破产法官碰不到。如果在执行市场的几大组成部分时不偏袒首席执行官，想必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如既往地禁止首席执行官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推高公司股价，然后借机兑现他们的股票期权。此外，如果首席执行官薪酬超过100万美元，哪怕它与公司业绩挂钩，也不能进行税前抵扣。如果市场几大基本组成部分不偏袒大公司，则这些公司不可能赚取到丰厚的利润，公司高管也不可能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能够阻止这些倡议，因此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首席执行官的捐款在所有竞选捐款中所

占的比例非常高。许多首席执行官还是“重要的绑金人”，能够从公司其他高管处筹集捐款。他们捐助竞选活动，进行捆绑捐助，对公司政策行动委员会施加影响力，聘请说客，并且含蓄地向特定政府官员承诺未来聘请他们，这一切让他们在游戏规则方面拥有不可小觑的发言权。

有关首席执行官薪酬和他们的价值相等的说法属于套套逻辑，毫无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证明首席执行官值这么高的薪酬呢？在经过诸多客观评估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并不值这么多。

---

1.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 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2. 参阅William Lazonick, Taking Stock: Why Executive Pay Results in an Unstable and Inequitable Economy, white paper, Roosevelt Institute website, June 5, 2014.
3. 参阅Comcast Corporation, Schedule 14A Definitive Proxy Statement, April 5, 2013, p.42(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66691/000119312513144100/d496632ddef14a.htm).另参阅 Karl Russell, “Executive Pay by the Numbers,”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3.
4. Lucian A.Bebchuk and Yaniv Grinstein,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a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1, no.2 (2005): 283-303.
5. 参阅Scott Klinger and Sarah Anderson, Fleecing Uncle Sam, Center for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ebsites, 2014.
6. 参阅N.Gregory Mankiw,“Yes, the Wealthy Can Be Deserv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14.
7. Jeff Green and Hideki Suzuki,“Board Director Pay Hits Record $251,000 for 250 Hours,” Bloomberg News, May 29, 2013.
8.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Adopts Rules for Say-on-Pay and Golden Parachute Compensation as Required Under Dodd-Frank Act,” press release, January 25, 2011.
9. Aaron Ricadela,“Oracle Investors Reject CEO Ellison's Pay at Annual Meeting,” Bloomberg Business, October 31, 2013.
10. 参阅Julie Walker,“Australia Has Had Three Years with the Two-Strikes Law and Executive Pay Pain Won‘t Go Away,” Business Insider Australia, October 17, 2013.
11. Trevor Chappell,“Pay Packets for Top Bosses Hit $4.8m,” The Australian, September 18, 2014.

12. 参阅Kevin J.Murphy, “Executive Compensation: Where We Are, and How We Got There,”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 ed.George Constantinides, Milton Harris,and René Stulz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North Holland, 2013), pp.211-356.

13. 参阅Lazonick,Taking Stock, p.5.

14. 参阅Lazonick,Taking Stock，p.8.

15. 参阅Lazonick,Taking Stock, p.9.

16. 参阅Steven Balsam, Taxe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riefing Paper #34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ugust 14, 2012.

17. William Lazonick, “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 2014.

18. “The Repurchase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3, 2014.

19. Lazonick,“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

20. IBM, What Will We Make of This Moment? 2013 IBM Annual Report, IBM website, 2013, p.7.

21. Andrew Ross Sorkin,“The Truth Hidden by IBM's Buyback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2014.

22. Lazonick, Taking Stock, p.12.

23. William Lazonick,“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Shareholder Value,” AIR Working Paper #14-03/01, Academic-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 website, March 2014, p.16.

24. Lazonick, Taking Stock, p.12.

25. Charles Mead and Sarika Gangar, “Apple Raises $17 Billion in Record Corporate Bond Sale,”Bloomberg News, April 30, 2013.

26. Gary Strauss, Barbara Hansen, and Matt Krantz, “Millions by Millions, CEO Pay Goes Up,”USA Today, April 4, 2014; see chart “2013 CEO Compensation, Realized Compensation.”

27. Murphy,“Executive Compensation,” pp.211-356.

28. William Launder, “Time Warner CEO Bewkes's 2013 Compensation Up 26% ,”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1,2014.

29. Facebook, Inc., Schedule 14A Definitive Proxy Statement, March 31, 2014, pp.21, 32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32680114000016/facebook2014 proxystatement.htm).

30. 关于首席执行官薪酬和业绩之间的关系，参阅Michael J.Cooper, Huseyin Gulen, and P.Raghavendra Rau, “Performance for Pay? The Relation Between CEO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nd Future Stock Price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se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ebsite, October 1, 2014.另参阅Susan Adams, “The Highest-Paid CEOs Are the Worst Performers, New Study Says,” Forbes, June 16, 2014.

31. Gavin J.Blair,“Sony CEO, Top Execs to Return $10 Million in Bonuses Amid Electronics Unit Losses,” Hollywood Reporter, May 13, 2014.

32. Michael B.Dorff, Indispensable and Other Myths: How the CEO Pay Experiment Failed and How to Fix I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1-2.

33. Gary Rivlin,“New Study Shows How Golden Parachutes Are Getting Bigger,” Daily Beast, January 11, 2012.

34. Liz Moyer,“Supersize That Severance!” Forbes, October 31, 2007.

35. Richard Finger,“Why American Airlines Employees Loathe Management,” Forbes, April 29, 2013.

36. Paul Hodgson and Greg Ruel, Twenty-One U.S.CEOs with Golden Parachut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GMI Ratings website, January 2012.

37. Sarah Anderson and Marjorie Wood,Restaurant Industry Pay: Taxpayers' Double Burde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ebsite, April 22, 2014, p.5.

38. Senator Chuck Grassley,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ackdating to the Future/Oversight of Current Issues Regard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luding Backdating of Stock Options;and Tax Treatment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tirement and Benefits,”closing statement, Finance Committee hearing, September 6, 2006 (http://www.finance.senate.gov/newsroom /chairman/release/?id=fa3baac7-174f-4e3e-b16d-2eda0b6cec87).

39. Steven Balsam, Taxe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riefing Paper #34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ugust 14, 2012.

40. “Topic 409—Capital Gains and Losse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website, August 19, 2014.

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高薪诡计

如果你依然觉得顶层人群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么让我们仔细审视华尔街的情况。华尔街人的薪酬待遇通常优于公司高管。那华尔街银行家“值这么多”吗？自2008年政府进行紧急救助以来，华尔街大银行源源不断地获得隐性补助。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认为华尔街大银行大到不能倒。要记得这些大银行因为过度冒险行为濒临崩溃。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为了防止几家最大的银行倒闭，政府救助它们的力度远远超过对其他银行提供的补贴。在一些重要方面，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仍然是大而不能倒，所以它们直到今天还享受着政府提供的补贴。

这一隐性补贴是这样运作的。这些大银行的储户办理存款或贷款业务时，利率要比小银行的低。这是因为将储蓄存入小银行的风险高于大银行；大银行如果陷入麻烦，基本上能够获得救助。因此华尔街大银行相对小银行而言更具竞争优势。这导致几家最大的银行钱越赚越多。随着利润增加，这几家银行进一步发展壮大。如果当初它们只是大而不能倒，那它们现在变成太大而不能倒了。正如我所指出的，到2014年，华尔街前五家最大的银行持有美国45%的银行资产，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5%。[注]现在它们变得如此之大，所以不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即银行倒闭或受到制约，或者银行从业者锒铛入狱。

这一隐性补贴的规模有多大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植田健一和德国美因茨大学的阿特丽斯·威德·迪毛罗估计这一补助约为0.8个百分点。[注]这听上去好像算不了什么，但如果你将它乘上华尔街前十大银行的存款总额，就会得出一个很大的数字。[注]在2013年，这一隐性补贴达到

830亿美元。顺便说一句，这一估计数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审计总署的其他研究人员所估计的一致。(注)纽约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锡拉丘兹大学的经济学家比较了小银行和大银行分别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货币市场账户提供的利率，发现大银行提供的利率比小银行要高多于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实际补贴会更高。(注)

我们无须成为行家，遑论是华尔家银行家，也能够计算出华尔街银行因大而不倒而获得的隐性补贴总额是华尔街2013年奖金支出的三倍左右。在这一年，华尔街奖金支出高达267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补贴，华尔街银行根本不可能存在奖金池。大部分补贴流向了前五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金额高达640亿美元。(注)640亿美元和这些银行的年收益差不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一补贴，华尔街银行不仅无力发放奖金，也不可能实现利润。

华尔街银行家之所以在2013年拿到267亿美元的奖金，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大部分美国人更努力、更聪明或者更有见地。他们之所以拿到这么高的奖金，是因为他们所效力的机构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中享有特权地位。大银行获得的补贴出自你、我和其他纳税人，因为是我们为上一轮救市掏的腰包。很多人觉得如果有下一轮救市，到时还得由我们来承担。

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必须拟定“生前遗嘱”。如果银行再无力支付账单，那么这一生前遗嘱将会生效。从本质上讲，这些生前遗嘱本应该成为蓝图，指导如何在不伤害美国金融系统其他机构的情况下对大银行业务进行清盘。但是我们可不能指望这些生前遗嘱。在评估这些生前遗嘱之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调查官员在2014年8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生前遗嘱“不切实际”。(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托马斯·霍尼格称这些计划均“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银行一旦倒闭，如何在不引发金融危机的前提下，能够克服障碍进入破产程序”。(注)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这些大银行宁可它们的生前遗嘱不切实际。如果大银行为了避免需要接受新一轮的补贴，拟订出切合实际的计划，那么这些隐性补贴、补贴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代表着竞争优势的奖金都将消失殆尽。

美联储已采取行动，旨在提高对大银行的资本要求。大银行也许会见风使舵，改变做法。不过国会或行政部门不太可能强迫它们拿出切合实际的生前遗嘱，限制它们的规模，拆分它们，或者向它们征收金额相当于隐性补贴的赋税。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这些金融机构之所以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中享有特权地位，是因为华尔街是重量级国会议员竞选人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捐助人，并且维持着连接它和华盛顿的旋转门。小银行高管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更遑论美国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大手笔捐款，或者为前政府官员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小银行家和普通民众拿不到这么高的奖金。并非偶然的是，华尔街银行家在2013年拿到了267亿美元的奖金，这笔钱足以让美国全国100.7万名拿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人当年工资翻上不止一番。[注]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获得的隐性补贴高达830亿美元，即使减去267亿美元的奖金，仍比政府当年依据劳动所得税抵免制为2800万名低薪工人及其家人提供的工资补贴总额要多200亿美元。[注]

这一隐性补贴还没有完全计入华尔街其他人所拿走的报酬，例如史蒂夫·A.科恩在2013年拿到的23亿美元。在2013年，排名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平均每人拿到了10亿美元的薪酬。[注]在大型对冲基金，就连普通的投资组合经理平均薪酬都可以达到220万美元。[注]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对冲基金和投资组合经理管理着数额庞大的理财资金，可能会萌生侵吞一部分资金的念头，投资者为了遏制他们这一念头，不得不向他们支付这么高的报酬（对冲基金通常收取2%的年费；如果投资收益率超过特定基准，还会抽取20%的收益）。其中的理论依据是投资经理由于担心损失合法的丰厚收入，因此不会非法侵吞自己所管理的资金。正如经济学家艾瑞克·福根斯坦所解释的，“投资组合经理之所以获得丰厚的报酬，是因为他们了解最优价格，而外部人员不知情。由于市场不

断变化，而且一些证券（例如抵押证券）流动性差，投资者并不清楚投资组合经理有没有尽全力，帮助他们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因此只得寄希望于提供丰厚的报酬，以此激励投资组合经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注]

依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将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看成投资者提供的贿赂，目的是确保经理不会侵吞他们的资金。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越多，投资者须支付的贿赂也越多。这一逻辑可能同样适用于许多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和交易员。

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投资者这一贿赂并不能保证对冲基金和投资组合经理不会进行附带交易和拿回扣，侵吞投资者一部分资金。事实上，SAC资本顾问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正是因为侵吞投资者的资金而被抓。我们可以很公平地推测，华尔街其他的投资组合经理和交易员半斤八两，只不过他们侥幸没有被抓到而已。正如我所提到的，国会在1934年出台规定禁止内幕交易，但同时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联邦检察官和法官广泛的权限，来界定内幕交易的确切含义。多年以来，华尔街非常清楚科恩的捞钱手段。SAC资本顾问公司管理着数额庞大的资金，通常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日交易额的3%和纳斯达克的1%。[注]它每年向华尔街银行家们提供的佣金超过1.5亿美元。这些银行家掌握大量的信息，对科恩和SAC资本顾问公司的其他人而言具有潜在的价值。这为双方达成有利可图的交易提供了诸多机会。事实上，《彭博商业周刊》2003年一篇报道指出，在SAC资本顾问公司遭起诉的前十年里，它定期为银行家提供佣金；这“让科恩打造的超强信息机器像上了油一样，顺畅运行”，并“为科恩（赢得）影响力，让他能够抢先对手一步，掌握交易和分析信息”。报道援引一位分析师的话说，“每当我对哪家公司有什么见解或者了解到它的花边新闻时，我都会打电话给史蒂夫。我知道他会用上这一信息，真正做到物尽其用”。曾经效力于SAC资本顾问公司的一位交易员表示，公司的信条是永远“抢先一步掌握信息”。

尽管科恩的九名投资组合经理从事内幕交易的罪名成立，但科恩本人得到从轻发落。他和联邦检察官达成和解，虽然他的公司被罚款18亿美元，但他所累积的其他财富安然无恙。[注]他也没有锒铛入狱。科恩之所以能够逃过牢狱之灾，也许是因为他高价聘请了律师军团为他进行辩护，联邦检察官知道如果对簿公堂，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从而知难而退。（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律师配得上他们的酬劳。）不过科恩之所以能达成和解，可能与下列事实有关，即他的财富主要是在2000~2008年积累起来的，这一期间担任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管官员都是由共和党人任命的，而科恩本人一直以来是共和党的主要捐款人。[注]到2008年总统大选时，SAC资本顾问公司和科恩成为奥巴马的有力支持者。

2014年，安东尼·恰森（他曾效力于SAC资本顾问公司）被指控进行内幕交易，对此他的律师辩护称机密信息是华尔街的“法定货币”。上诉法院似乎认同这一说法，推翻对他的有罪判决。如果机密信息真的是华尔街的“法定货币”，那么SAC资本顾问公司的情况并非罕见。[注]对冲基金行业管理着庞大的资金流，并且能够轻易地获取机密信息，利用机密信息进行交易，从中大牟其利。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对冲基金行业的大部分业务是以获取机密信息为前提。对冲基金经理有机会获取此类法定货币，从中大牟其利。因此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巨额薪酬，可能是因为靠两类慷慨的投资者：一类投资者不希望被坑，所以向对冲基金经理支付合法贿赂，而另一类投资者为了换取机密信息，向对冲基金经理支付非法的回扣（往好里说，在法律上存在争议性的回报）。至少对他们而言，这属于双赢。哪怕他们将很少一部分收入用于捐助政治候选人，以及聘请说客和律师军团，那么他们可以将因为进行内幕交易而被抓和起诉的风险和成本降到最低。史蒂夫·A.科恩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美国税收制度存在一个漏洞，允许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经理将他们的收入申报为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税率低于普通所得税率。他

们能够确保这一漏洞不会被堵住。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基本无法钻这一漏洞。我们也无法对这一漏洞进行逻辑论证。这些经理无须拿自己的钱来冒险，他们拿其他人的资金进行投资。2007年，密歇根州众议员桑德·M.莱文提议立法，将当时所谓的附带收益作为普通所得来征税。[注]当年对冲基金行业的政治经费支出大幅增加。不出意外，自那以后此类法案都不了了之。

华尔街人“配得上”他们的巨额薪酬吗？有人老生常谈，说显然一个人的价值与其在市场上挣得的收入相等。不过华尔街人特有的敛财机制证明他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纳税人和小投资者那里非自愿转移过来的。他们的敛财机制包括大而不倒的银行获得隐性补贴，以及利用内幕消息牟利。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来影响游戏规则，但从“价值”一词的意义上来讲，他们并不“值”这么高的薪酬。

---

1. Hester Peirce and Robert Greene, “The Decline of US Small Banks (2000-2013),” Mercatus Center website, February 24, 2014.
2. Kenichi Ueda and Bea- trice Weder di Mauro, “Quantifying Structural Subsidy Values for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MF Working Paper no.12/2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ebsite, May 2012, p.4.
3. “Why Should Taxpayers Give Big Banks $83 Billion a Year?” editorial, Bloomberg View, February 20, 2013.
4. 参阅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Moving from Liquidity-to Growth-Driven Markets,”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ebsite, April 2014, p.104; U.S.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Large Bank Holding Companies: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 Support, GAO-14-621,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website, July 2014, pp.50-51.
5. 参阅Viral V.Acharya, Deniz Anginer, A.Joseph Warburton,“The End of Market Discipline? Investor Expectations of Implicit State Guarantees,” Minneapolis Federal Reserve Ban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ebsite, June 2014.
6. “Why Should Taxpayers Give Big Banks $83 Billion a Year?”
7.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 tem and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Agencies Provide Feedback on Second Round Resolution Plans of ‘First-

Wave’Filers,”joint press release, August 5, 2014.

8.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托马斯·霍尼格声明, “Credibility of the 2013 Living Wills Submitted by First Wave Filers,”FDIC website, August 5, 2014, p.2.

9. Sarah Anderson, “Wall Street Bonuses and the Minimum Wag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ebsite, March 12, 2014.

10. “Rewarding Work Through Stat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s,” policy brief,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website, April 2014.

11. Nathan Vardi,“The 25 Highest-Earning Hedge Fund Managers and Traders,” Forbes, February 26, 2014.

12. Brendan Conway,“Entry Level Hedge Fund Pay: $353,000,”Barron's, October 31, 2013.

13. Eric Falkenstein,“Righteous Bonuses,”Falkenblog, February 2, 2009.

14. 欲了解SAC资本顾问公司，参阅Marcia Vicker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ly 20, 2003.

15. Agustino Fontevecchia,“Steve Cohen Personally Made $2.3B in 2013 Despite Having to Shut Down SAC Capital,”Forbes, March 13, 2014.

16. Peter H.Stone and Michael Isikoff, “Hedge Funds Bet Heavily on Republicans at End of Election,”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website, January 5, 2011.

17. Floyd Norris, “Loosening the Rules on Inside Trad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4.

18. 参阅Monica Vendituoli,“Hedge Funds: Background,” OpenSecrets.org website, updated September 2013(http://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background.php?ind=F2700).

第十三章 中产阶级议价能力削弱

我前面提到过，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卖裙子和女式衬衫给工厂工人的妻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我爸因此赚了不少钱，还在邻镇开设了第二家女装店。虽然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但由于他赚得也不少，我们家俨然成为实打实的中产阶级。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均时薪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注]当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增强，经济发展更快，推动了新的投资和创新，中产阶级因此变得更为富有，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这一良性循环让我们家和其他数千万家庭受益。

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良性循环停顿了。尽管生产率增速基本不变，经济也继续保持增长，但工资水平开始原地踏步（见图13.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在2013年，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为5.1939万美元，比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收入低了将近4500美元。到201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1989年的水平。[注]人们的工作日益没有保障，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不断下滑。[注]简而言之，美国很多中产阶层家庭变得更穷了。（并非偶然的是，我父亲最终不得不关闭他的两家店面。）

美国201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仍低于1998年的水平。[注]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07年的水平要低8%。时薪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2014年9月，他们的平均时薪为20.67美元。[注]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这一时薪的购买力与1979年的时薪差不多，甚至还低于

1973年1月的时薪（按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等于22.41美元）。



图13.1 美国不平等问题的根源：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

注：引用的数据为私营部门生产和非管理类工人时薪（按2012年美元的价值计算）；净生产率适用于整个经济，等于单位工时商品和服务产出减去折旧费后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劳工统计局劳动生产力和成本项目、劳工统计局当前就业统计数据和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生产核算未公布的整体经济生产率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这一图最初出现在go.epi.org/2013-productivity-wages.

依据标准解释，这一大转变可归因于“市场力量”，特别是削弱了美国许多工人竞争力的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可以外包给墨西哥和亚洲的工人，这些地区的工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干同样的活。此外，在美国国内，自动化设备、计算机控制的机器和机器人能够

低成本地完成工人的工作。不管怎么样，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工人过去能挣到可观的收入，但现在因为工资过高被挤出就业市场。如果他们希望找到工作，就需要接受更少的工资和更低的工作保障。他们如果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就需要掌握更好的工作技能。这一切由市场决定。

这一标准解释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解释大多数的现象。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短短几十年间会突然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虽然也面临类似的市场力量，却没有这么容易屈服。（例如，到2011年，德国中位数收入增加速度比美国要快；德国最富有1%的人群税前收入约占到总收入的11%，而美国最富有的前1%人群收入占比则超过17%。[注]）此外，这一标准解释也未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经济大衰退后的前六年复苏期间，美国底层90%的人群平均收入却下跌了。

这一标准解释也未能说明为什么年轻一代大学毕业生中位数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停滞不前。尽管近期毕业的大学生工资水平仍然高于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但他们的工资保持原地踏步。事实上，在2000~2013年，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平均时薪下跌了（见图13.2）。依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数据，到2014年，在近期毕业的大学生中，有46%的人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在所有大学毕业生中，有35%的人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注]《纽约时报》将这一群体称为“无着落的一代”——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事业发展受阻，从事着无聊的工作，前景黯淡无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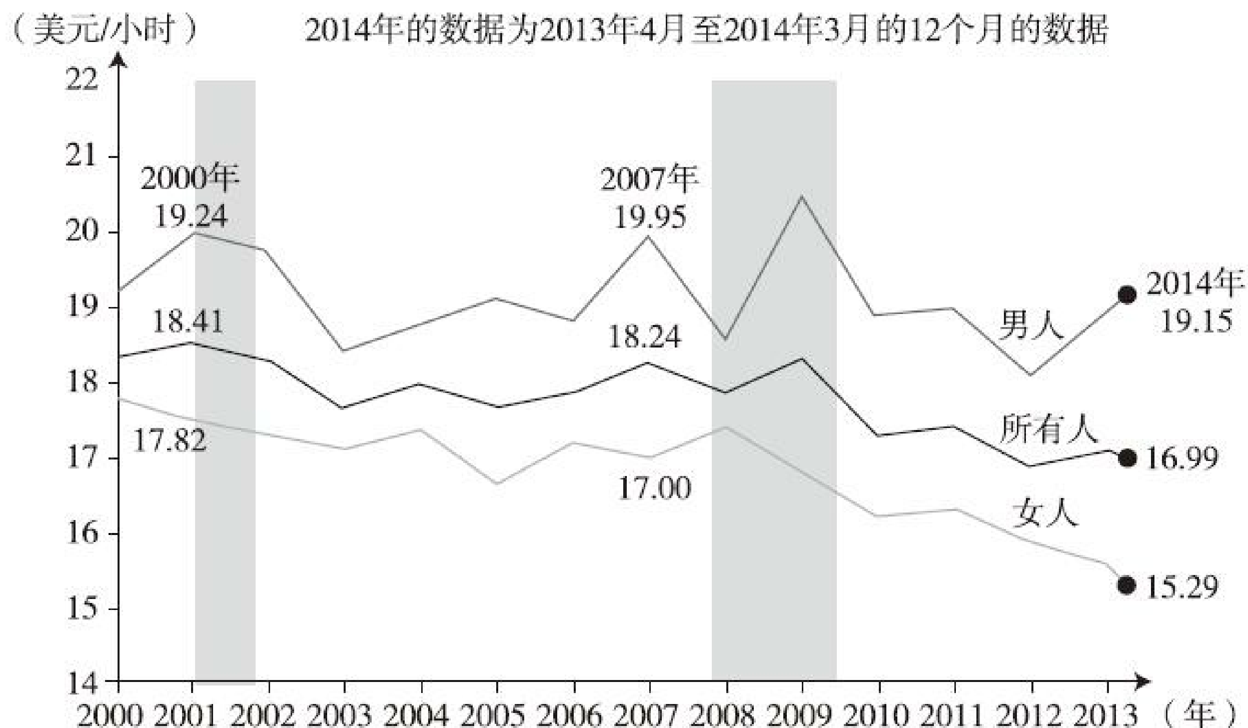


图13.2 2000~2014年不同性别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实际平均时薪

注：数据涉及未获得高级学位且没有进一步深造的大学毕业生。阴影区域代表经济衰退期。

资料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当前人口调查退出轮换组微数据的分析结果（http://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wa-wages-table-4-18-hourly-wages-entry/）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产阶级的遭遇，我们需要审视市场组织架构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提高了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盈利能力，但同时也削弱了中产阶级的议价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一转变相当于向顶层倾斜的再分配，但它不是我们通常所定义的“再分配”。政府并没有向中产阶级和穷人征税，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富人。政府和对政府影响力最大的人群通过修改游戏规则，间接地进行向顶层倾斜的分配。

首先我们看看企业产权发生的根本变化。正如我所提到的，在20世

纪80年代之前，每位股东事实上都是大企业的主人。人们认为这些股东对企业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早在1914年，知名专栏作家和公共哲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就呼吁美国企业高管成为美国的“管家”。“效力于（大企业）的高管无法逃避一个事实：人们期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像公职人员一般行事……睿智的商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越来越多地讨论他们的‘责任’和‘尽责管理’。”[注]

1932年，律师阿尔道夫·A.伯尔勒和经济学教授加德纳·C.米恩斯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这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显示，美国巨型公司高管甚至无须对公司股东负责，在经营公司时“追逐私利，并且……将一部分资产基金挪为己用。”[注]伯尔勒和米恩斯认为解决方案是扩大雇员和消费者等所有受大公司影响的群体的权利。[注]在他们的设想中，未来的企业高管是专业管理人员，公平地平衡投资者、雇员、消费者和居民的诉求，并且相应地分配利益。伯尔勒和米恩斯写道：“如果企业制度要生存下去，对大企业的‘控制’必须发展成为完全中立的专家治理制度，以此平衡不同群体的各种诉求，并且基于公共政策而不是私欲为各个群体分配收入流，这一点非常重要。”

到“二战”结束时，这一企业治理愿景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弗兰克·阿布拉姆斯在1951年发表演讲时说：“管理工作旨在公平合理、切实可行地平衡着直接受影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这包括股东、雇员、顾客和一般民众。企业经理人之所以获得专业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自己（对公众）担负着基本责任，而其他专业人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注]他这一演讲代表了当时其他首席执行官的看法。

在20世纪50年代，《财富》杂志呼吁首席执行官成为“产业政治家”。[注]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帮助建设一个带来普遍繁荣的经济。1956年11月，《时代周刊》指出，商业领袖愿意从财务业绩的“盈亏角度，以及整个社会得失角度来评判自己的作为”。该杂志

提到，众所周知，通用电气寻求服务于公司所有股东的“达成平衡的最佳利益”。浆纸业高管J·D.泽勒巴克向《时代周刊》杂志表示，“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私营企业，认为这是人们在自由社会经营生意的最为务实的手段，而不是上帝赋予的权利……他们认为企业管理是一种尽责管理，希望它能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经济作为公共信托来管理”。[注]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愿景，随之而来的还有“企业狙击手”。他们挥舞着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引诱股东出售手头持有的股份，从而进行恶意收购。他们进行杠杆收购，与产业政治家展开代理权之战。在“企业狙击手”看来，产业政治家剥夺了股东本来属于他们的财富。这些“狙击手”认为股东是企业唯一合法的所有人，而企业唯一合理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的现象。在企业利益集团和华尔街的推动之下，金融市场和企业的法律及组织架构发生了变化，而上述转变正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1974年，在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华尔街的力促之下，国会出台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在此之前，依据与养老金和保单受益人签订的合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负有受信义务，只能投资购买优质的企业和政府债券。1974年颁布的这部法律改变了这一状况，它允许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将投资组合投资到股票市场中，从而为华尔街提供了庞大的资金池。[注]1982年，国会允许储贷银行拿存款进行投资，购买各种金融产品，其中包括承诺高回报的垃圾债券和其他风险投资。这一规定为华尔街提供了又一个庞大的资金池。[注]储贷银行是支撑当地房屋抵押贷款市场的基石。政府对储贷银行的存款资金提供保险，应对投资亏损问题，这一便利让此类投资更具诱惑力（最终多家公司倒闭，纳税人为此支付了约1240亿美元）。[注]与此同时，里根政府放松了其他的银行业和金融规定，并且裁减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人员。

“企业狙击手”因此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和监管机构的批准，进行恶意收购。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价值达10亿美元及以上的公司的恶意收购

案只有13起。在20世纪80年代，此类恶意收购数量增加到150起。在1979~1989年，金融企业家开展的杠杆收购案超过2000起，每起收购案金额超过2.5亿美元。[注]（狙击手伊凡·博斯基被指控开展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他为了达成控辩交易，同意成为政府线人；这时杠杆收购狂欢才停下来。[注]博斯基供认迈克尔·米尔肯和他所在的巨型垃圾债券公司德崇证券密谋操纵股价和诈骗客户。对此德崇证券表示认罪。米尔肯则被指控98项罪名，其中包括内幕交易和诈骗罪，最终锒铛入狱。）

即便公司没有遭遇“狙击手”，首席执行官由于担心公司成为劫掠的目标，仍旧承受着压力，不得不努力实现股东收入最大化。他们由此认定自己的主要职责是推高公司股价。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戈伊苏埃塔阐明了这一新的理念：“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为我们的所有者创造像样的回报。”[注]这一理念与早些年企业政治家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每个人都知道他所说的“像样的回报”是指尽可能大的回报。

首席执行官如想取得这一成绩，可以走捷径，削减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工资是大多数公司最大的一笔单项支出。相应地，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企业屠夫”取代了五六十年代的企业政治家。按那个年代的说法，“企业屠夫”眼里几乎只有一件事，就是“减肥”[注]和“省到骨头里”[注]。1981年杰克·韦尔奇掌舵通用电气时，股票市场对通用电气的估值不足140亿美元。[注]到韦尔奇2001年退休时，通用电气市值高达4000亿美元。韦尔奇主要是通过削减员工工资完成这一壮举的。在他出任首席执行官之前，通用电气的大部分员工整个职业生涯都效力于公司。但在1981~1985年，通用电气裁员10万人，也就是1/4的员工。韦尔奇也因此得到了“中子弹杰克”的绰号。哪怕公司业绩表现不错，韦尔奇仍然鼓励他的高层管理人员每年更换10%的员工，以此保持通用电气的竞争力。

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试图比韦尔奇走得更远。“电锯”阿尔·邓洛

普在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裁员1.1万人，其中包括71%的总部员工。注这给华尔街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司股价也因此大涨225%。邓洛普1996年跳槽到阳光公司后，立马将公司1.2万名员工裁了一半。注（不幸的是，他被发现做假账。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他从事诈骗活动，为此他交了50万美元罚款进行和解，并同意不再担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我之前提到过IBM和惠普公司。这两家公司以前实行员工终身雇佣和高薪政策。但后来它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员工“痛下杀手”。

正如我所提到的，公司股价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待遇因此水涨船高（见图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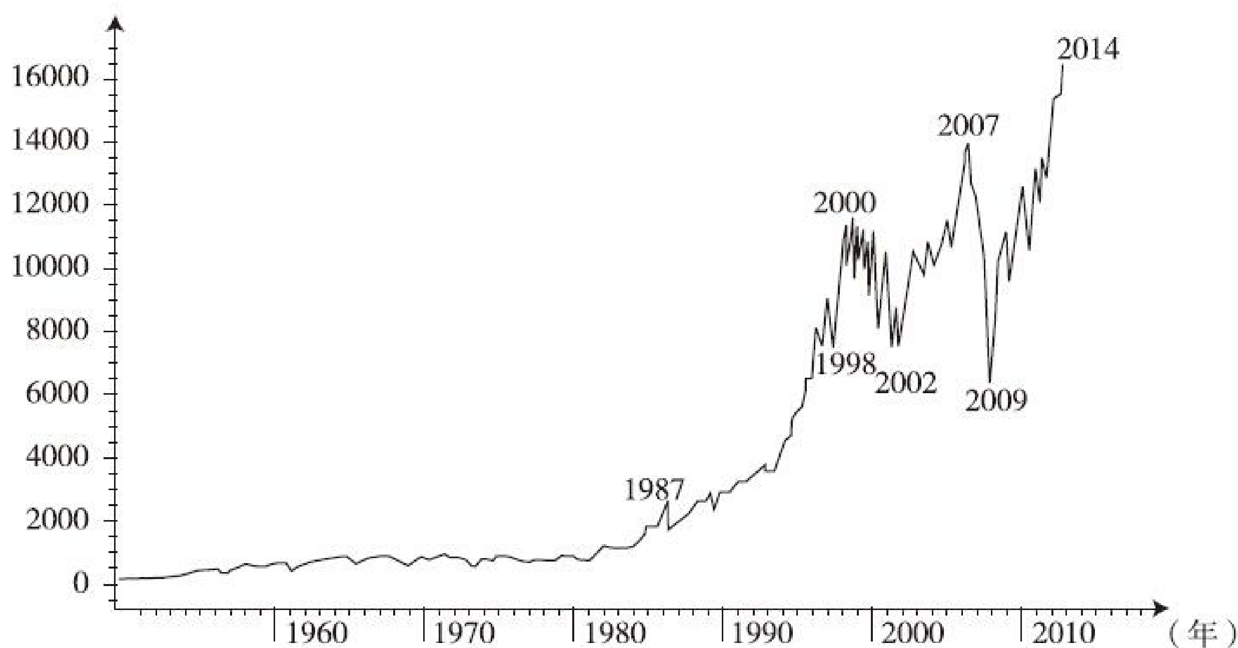


图13.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资料来源：e-wavecharts.com免费提供

许多人称赞首席执行官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因为从理论上讲，公司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不过这一转型的人力成本高昂。普通工人

丢了工作，失去收入，并且许多社区变得荒芜。此外，虽然公司的效率提升了，但产生的效益未能得到广泛的分享。随着公司不断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生产率和工人收入之间的纽带被切断。自1979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加了65%，但工人薪酬中位数仅增加了8%。[注]经济成果基本上都落入顶层人群的手中。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今天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和30年前差不多。此外，很少有工人持有股票。

工人由于担心工作不保，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或者说没有跟上通胀脚步的工资），因此工资一直被压低。在这一问题上，政治决定再次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工人工作普遍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协议直接造成的后果。贸易协议导致美国公司将工作岗位外包到海外。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在传统观念中，“自由贸易”等同于“自由市场”，并与政府“保护主义”形成对比。不过这一观念是受到误导的。由于各个国家的市场反映了有关市场组织方式的政治决定，事实上“自由贸易”协议涉及如何推动不同市场体系实现一体化的复杂谈判。此类谈判最为重要的方面涉及知识产权、金融和劳工等问题。在此类谈判中，为了充分保护大公司和华尔街知识产权和金融资产的价值，它们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凌驾于普通工人保护自身劳动价值的利益之上。（我本人要坦白一件事。我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劳工部长期间，曾在政府内部表达了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立场，只是从未在公开场合表达过我的担忧之情。当时我并不认可这一协议和白宫其他的一些决定。不过当时我觉得我应选择继续留在政府，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为此辞职表示抗议。不过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一直怀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

此外，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在这一问题上，政府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国会选择财政紧缩，这表明政府更希望减少预算赤字，而不是刺激经济和降低失业率。此时失业率会增加，继而削弱了普通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其工资水平降低。如果美联储和国会反其道而行之，则将增加就业机会，并提

高工资水平。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失业率非常低，小时工因此获得了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到了更高的工资。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时工工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实现持续增长的时期。[注]

不过企业高管和华尔街人希望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保持低水平。这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为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并且直接和间接地为自己带来更高的回报。不过高回报最终取决于产品销量，这就要求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因此从长远而言，压低工人工资的策略并不可行。不过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业务遍及全球，他们更关心下一季度的回报，而不是长期利润。这些人眼界狭隘，认为压低工人工资的做法更有利。此外，他们还认为低工资能够降低通胀风险，从而避免他们的资产价值受到通胀的侵蚀。

随着中产阶级议价能力的削弱，经济转型的风险也转嫁到了他们身上。政府在新政和“二战”期间出台多项公共管理政策，将大部分风险公平地分摊在大企业身上。这些政策包括有力的雇佣合同、社保、工伤保险、一周工作40小时制度、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应至少支付1.5倍的工资，以及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战时政府出台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鼓励公司提供此类免税福利，以代替加薪）。大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一生效力于一家公司，他们的工资随着资历、生产率、生活成本和公司利润的增加而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雇佣关系已变得司空见惯。毫不夸张地讲，实际上员工拥有自己工作和公司的产权。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垃圾债券和公司收购热过后，这一关系瓦解了。甚至一些全职工人在效力于同一家公司数十年后，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失业了，并且公司不提供遣散费和医保，也不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将近1/5的美国劳动者从事兼职工作。[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临时工、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或顾问。他们每周甚至每天的收入和工作安排都不一样。到2014年，66%的美国工人入不敷出。[注]

美国人年老后没有养老金的风险也在增加。在1980年，超过80%的大中型公司为员工提供定额给付养老金，保证他们在退休后每个月能够拿到一笔固定金额的退休金。[注]现在这一比例低于1/3。很多公司转而选择定额缴费计划，从而将风险转嫁给工人。如果股市像2008年一样暴跌，401K计划也会跟着损失惨重。今天，在参加匹配缴费型定额给付养老金计划的工人中，有1/3的人没有缴纳任何费用，原因是他们手头的现金不够，这也意味着他们的雇主未进行任何的匹配缴费。[注]在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工人中，为定额给付计划缴费的工人占比更低。总的来讲，拥有与就业相关联的养老金的工人占比从1979年的50%以上下滑到了今天的35%。[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2014年的调查显示，40%的雇员预期他们的雇主会进一步削减员工福利。[注]

与此同时，人们收入骤然减少的风险同样与日俱增。在2008年股市大崩盘之前，密歇根大学进行的“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显示，在任何特定的两年里，约一半的家庭出现一定程度的收入下滑问题，而且下滑幅度越来越大。[注]在20世纪70年代，收入下滑幅度通常在25%左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达到了40%。[注]到了20世纪初期，家庭收入涨跌幅度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注]

工人如果缺乏经济安全感，就不会要求提高工资待遇。驱动他们的因素更多的是恐惧感，而不是机遇。这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核心现实情况。一些人手握政治权力，操控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

导致中产阶级势力日渐式微的第三个因素是工会的消亡。50年前，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员工最大的雇主。当时通用汽车公司普通员工的时薪按今天美元价值计算达到35美元。到2014年，美国员工最大的雇主变成了沃尔玛[注]，它的员工平均时薪为11.22美元[注]。（从2016年2月起，沃尔玛将最低收入员工的时薪提高到10美元。）这并不意味着半个世纪前的通用汽车普通员工的“价值”是2014年沃尔玛普通员工的3倍。与沃

尔玛员工相比，通用汽车公司员工并没有接受更多的教育，或者工作积极性更高。真正的差别在于，在半个世纪前通用汽车员工背后有强势的工会为他们撑腰。工会凭借汽车工人的集体议价能力，为其成员争取利益，确保公司将可观比例的收入分配给他们。由于当时美国有超过1/3的工人隶属于工会，非工会成员的工人同样可以从工会和雇主达成的合同中受益，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也得到了改善。[注]未组建工会的公司知道，如果他们未能和工会合同保持一致，公司的工人也会组建工会。

今天，沃尔玛员工没有工会代表他们进行谈判，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待遇，他们只能靠自己。由于今天私营部门仅有不到7%的工人加入工会，美国大部分雇主无须和工会合同保持一致。[注]组建工会的公司因此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这导致出现逐底竞争。

一些人声称美国工会地位的下降只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不过德国等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市场力量”，但它们仍然存在着强势的工会。这些工会继续为中产阶层提供足够的议价能力，来为自己争取到可观比例的经济增长成果，且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中产阶级所能享受到的经济成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部分美国人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1985年以来，德国实际平均时薪增加了近30%。[注]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群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10%，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超过20%。[注]德国前1%的最富有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11%左右。在过去40年中，这一比例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为什么存在这一差异呢？我们看看政治和权力分配情况就知道了，特别是涉及工会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我所说的市场势力的资本主义几大基本组成要素，以及政府在界定市场势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后的前几十年中，工会沦为该法案的一个主要打击对象。在1894年铁路工人罢工时，联邦法院裁定，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罢工属于“非法限制贸易”的行为。[注]格罗弗·

克利夫兰总统派遣2000人的部队镇压罢工活动，导致十几名罢工工人遇难，美国铁路工会也因此消亡于萌芽状态。[注]当时许多商界领袖认为工会运动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工会的目标与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会长在1903年警告说，“劳工组织只承认一种法律，那就是暴力法——匈奴人和汪达尔人的法律，野蛮人的法律……劳工组织由一身蛮力的工人组成，而不是有才智的人士，而劳工组织的领导人本质上是革命的信徒。因此劳工组织代表着与经济自然法则正面冲突的原则，这也不足为奇”。[注]

不过随着美国普通劳动民众争取到了政治权力，他们正推动工会合法化，使之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步运动时期，国会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该法律阐述了有关“个人劳动不属于商品或商业物品”的原则，从而将工会豁免于这一法律。[注]不过在1921年，最高法院在解释《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时态度有些顽固，裁定工会属于非法组织（霍尔斯、布兰德斯和克拉克大法官持反对意见）。后来，国会于1932年通过了《诺里斯-拉瓜迪亚法》，一锤定音，承认工会组织的合法性。[注]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走得更远，保证工人有权组建工会，并规定雇主有法律义务与工会进行谈判。[注]

随着工会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争取到了经济权力，它们也争取到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并运用这一权力，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工人的谈判能力。1950年，大企业和大工会达成富有传奇色彩的《底特律条约》，同意共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以此换取劳资关系的和谐。[注]在此之后，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亦水涨船高。这就阐释了为什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私营部门近1/3的员工隶属工会，并且工人工资中位数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工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削弱，工会成员人数开始减少，大部分工人的议价能力也遭到削弱。导致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到的种

种变化，例如全球化、劳动替代型技术，以及企业转而将股东回报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不过这同时也是诸多政治和经济决定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决定削弱了工会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权力，导致它无力避免进一步遭到侵蚀的结局。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开除了举行大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注]里根当时这样做并没有错，毕竟空中交通管制员无权罢工。不过他这一出了名的举动向美国大雇主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开始进入新型劳工关系时代。在工人加入工会比例较高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坚持要求工人做出让步，同意减薪，作为保住他们工作的条件。许多企业将工厂搬迁或威胁搬迁到“劳动权”州。这些州出台法律，允许雇员停止缴纳工会会费，并放弃工会会员身份，以此作为雇佣条件。

正如我所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企业开始战略性地运用破产手段，以此废除工会合同。美洲航空公司在2013年就使用了这一伎俩。在担任大陆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弗兰克·洛伦佐于1983年推动资金紧张的大陆航空公司破产，撕毁它的劳工合同，裁员数千人，并且雇人取代举行罢工的飞行员和空乘。他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仅为之前劳工合同所规定的工资的一半，并且要求他们延长工作时间。自那之后，这变成了加入工会的航空公司员工挥之不去的噩梦。[注]1993年，西北航空公司威胁破产，坚持要求空乘和技师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注]十年之后，当西北航空公司4000多名技师进行罢工时，该公司宣布外包大部分技师的工作。[注]2002年，联合航空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强迫它的飞行员和空乘同意降低工资，且工资下调幅度在9.5%~11.8%。2006年联合航空公司破产重组成功，公司利润远超以前。[注]

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允许各州制定劳动权法。[注]这带来的实际后果是允许未缴纳工会会费的工人免费搭上缴纳会费工人的便车，从而降低所有人在一开始加入工会的积极性。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此类法律的影响极小，因为只有南部和西部的州制定了这一法

律，而大部分的产业都集中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不过随着企业承受着实现高回报和削减劳工成本的压力，且这一压力日渐加剧，许多首席执行官认为制定劳动权法的州更具有吸引力。2012年，甚至连印第安纳和密歇根这样的老牌工业中心地区也通过了劳动权法。[注]2015年威斯康星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从事地方服务行业的工人，例如零售、餐饮、保管、宾馆、老人护理和儿童保育、医院和交通运输等，面临着不同于大公司工人的挑战。由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可能被外包到海外，并且大部分的工作也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因此他们失业的风险要小得多。事实上，美国地方服务业工作岗位数量持续增加。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非常低，鲜有福利，并且他们基本没有晋升的空间。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人没有加入工会。如果他们加入工会，则他们和雇主进行谈判时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沃尔玛和大型快餐连锁公司极力反对工会。当员工有可能寻求组建工会时，它们针对工会投票设置程序障碍，利用拖延战术报复试图组建工会的员工，并恐吓其他人，让他们反对工会。依据《国家劳工关系法》，很多手段是违法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国会削减用于执行这一法律的拨款。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积压了大量的案件。该委员会负责保护工人组建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当雇主非法解雇员工时，委员会对他们的处罚微不足道，例如仅仅是要求他们向遭不正当解雇的员工支付自解雇之日起损失的工资。[注]连续几任民主党总统承诺制定法律，精简工会组建程序，加大处罚雇主违法行为的力度，但是这些承诺一再落空。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私营部门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持续下跌。中产阶层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必然随之下滑[注]（见图13.4）。

因此，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普通劳动民众的市场“价值”是否低于

过去，或者他们是否寅吃卯粮。问题在于他们逐渐丧失了必要的议价能力，享受到的经济成果份额不如“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那么高，并且他们的实际收入比经济制度本可以为他们提供的收入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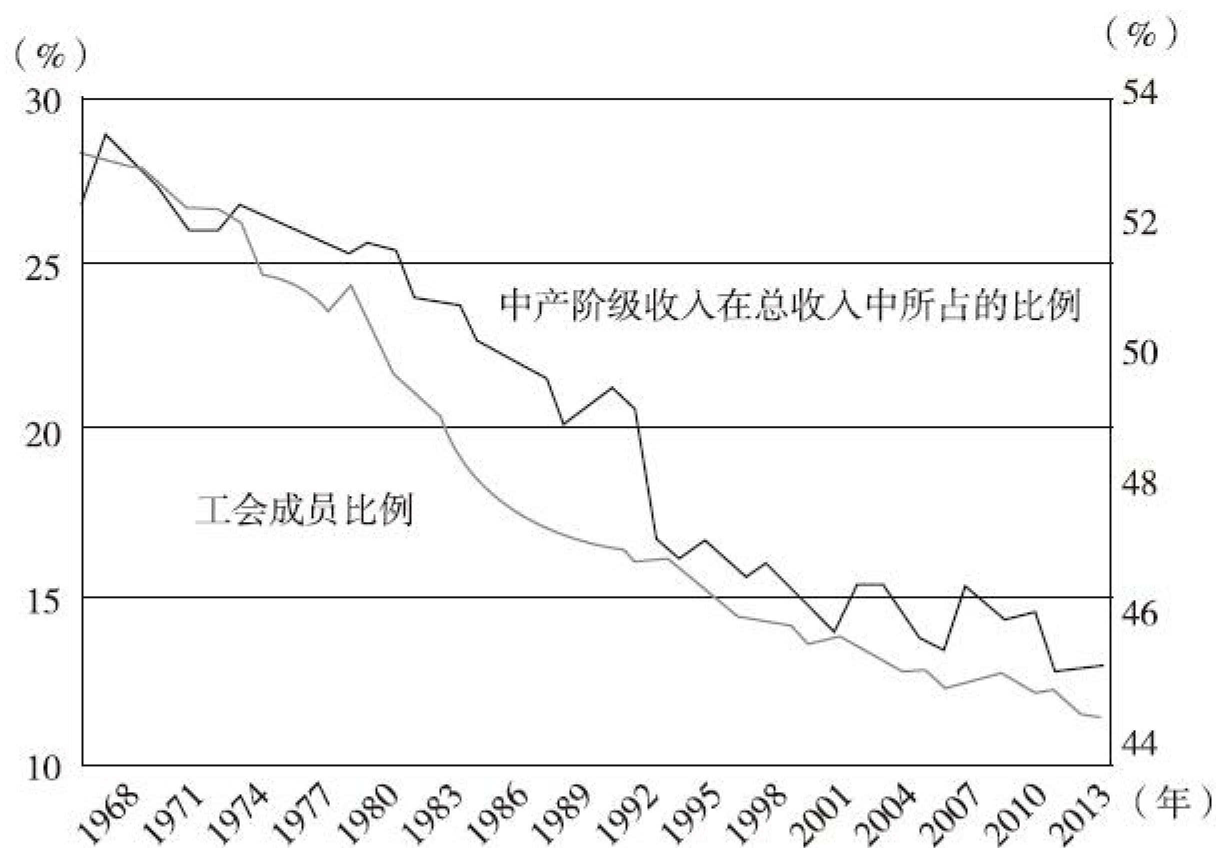


图13.4 随着工会成员人数减少，中产阶级收入占比也随之下滑

资料来源：美国进步中心行动基金会分析报告。该基金会依据巴里·T.赫希、戴维·A.麦克弗森和韦恩·G.弗罗曼在《劳工月刊》2001年第7期发表的《各州工会密度估计》（第51~55页，该文章刊登在 http://unionstats.gsu.edu/MonthlyLaborReviewArticle.htm）所提供的工会成员比例数据进行分析。有关中产阶级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局的H-2表格：各五等分和顶层5%的家庭总收入占比（2013年），该数据发布在 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

如果将这一问题归因于“自由市场”的客观作用，相当于忽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是如何重组以及由哪些人重组这一事实。我们还会忽视一个现实情况，即富有阶层手握大权，并且凭借这一权力攫取了越来越大份额的经济成果。它还相当于否认随着富有阶层所攫取的经济成果不断累积，他们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另外，它还忽视了我们政治经济制度中的抗衡力量日渐式微这一显著问题。

---

1. 参阅Susan Fleck, John Glaser, and Shawn Sprague, “The Compensation-Productivity Gap: A Visual Essay,” Monthly Labor Review, January 2011.
2. U.S.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Households,” table H-6 (https://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ld/).
3. 参阅Henry S.Farber, “Job Loss and the Decline in Job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bor in the New Economy, ed.Katharine G.Abraham, James R.Spletzer, and Michael Harp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另参阅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Seasonally Adjusted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http://data.bls.gov/timeseries/LNS12300000).
4. U.S.Census Bureau,“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Households,” table H-6.
5. Drew DeSilver, “For Most Workers, Real Wages Have Barely Budged for Decades,” Fact Tank,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9, 2014.
6. Heidi Shierholz, Six Years from Its Beginning, the Great Recession's Shadow Looms Over the Labor Market, Issue Brief #37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anuary 9, 2014.
7. Jaison R.Abel and Richard Deitz, “Are the Job Prospects of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Improving?” Liberty Street Econo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website, September 4, 2014.
8. Jennifer 8.Lee, “Generation Limbo: Waiting It Out,”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11.
9.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14; reprinted 1961), pp.22, 23.
10. Adolf A.Berle and Gardiner C.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302.
11. Adolf A.Berle and Gardiner C.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312.
12. Frank Abrams, “Management's Responsibilities in a Complex Worl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9, no.3 (1951): 29-34.

13. 参阅Fortune 40, no.4 (October 1951): 98-99.

14. 欲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和企业尽责管理相关情况，参阅Rick Wartzman, “Whatever Happened to Corporate Stewardship?”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ugust 29, 2014.另参阅“Business: The New Conservatism,”Time, November 26,1956.

15. 参阅Michael McCarthy, “Why Pension Funds Go to Risky Investment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2014.

16. 参阅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 of 1982, Pub.L.No.97-320.另参阅Marcia Millon Cornett and Hassan Tehranian,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 of 1982 on Com- mercial Banks and Savings and Loans,” Journal of Finance 45, no.1 (March 1990): 95-111.

17. Timothy Curry and Lynn Shibut, “The Cost of 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 Truth and Consequences,”FDIC Banking Review 13, no.2 (2000): 26-35.

18. Tim Opler and Sheridan Titman, “The Determinants of Leveraged Buyout Activity: Free Cash Flow v.Financial Distress Costs,” Journal of Finance 48, no.5 (1993): 1985-99.

19. 参阅Jesse Kornbluth, Highly Confident: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Michael Milken(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92).

20. Ian Somerville and D.Quinn Mills, “Leading to a Leaderless World,”Leader to Leader 1999, no.13 (1999): 30-38.

21. 指精减人员——译者注

22. 指削减开支——译者注

23. 参阅Jack Welch, 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 (New York: Warner, 2001).

24. John Byrne,Chainsaw: The Notorious Career of Al Dunlap in the Era of Profit-at-Any-Price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3).

25. John Byrne,Chainsaw: The Notorious Career of Al Dunlap in the Era of Profit-at-Any-Price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3). pp.123-24.

26.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Lawrence Mishel,and Heidi Shierholz,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Briefing Paper #378,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une 4, 2014.

27. Lawrence Mishel,The Wedges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Median Compensation Growth, Issue Brief #33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pril 26, 2012.

28.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November 2014,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ebsite, December 5, 2014.

29. American Payroll Association, “2013 Getting Paid in America Survey Results,” 2013

(http://www.nationalpayrollweek.com/documents /2013GettingPaidInAmericaSurveyResults2_JW_001.pdf).

30.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EBRI Databook on Employee Benefits,” ch.4, “Participation in Employee Benefit Programs,” table 4.1a,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ebsite, March 2011.

31. Ruth Helman, Nevin Adams, and Jack Van-Derhei, The 2014 Retirement Confidence Survey: Confidence Rebounds—For Those with Retirement Plans, Issue Brief No.397,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ebsite, March 2014, p.18.

32. Rebecca Thiess,The Future of Work: Trends and Challenges for Low-Wage Workers, Briefing Paper #341,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pril 27, 2012.

33. MetLife, Benefits Breakthrough: How Employees and Their Employers Are Navigating an Evolving Environment, 2014 (https://benefittrends.metlife.com /assets/downloads/benefits-breakthrough-summaries-2014.pdf).

34. Jacob S.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1.

35. Jacob S.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1.

36. Jacob S.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32.

37. Brianna Cardiff-Hicks, Francine Lafontaine, and Kathryn Shaw, “Do Large Modern Retailers Pay Premium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No.203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July 2014, p.9.

38. Shelly Banjo, “Pay at WalMart: Low at the Checkout But High in the Manager's Offic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3, 2014.

39. 参阅David Madland and Keith Miller, “Latest Census Data Underscore How Important Unions Are for the Middle Clas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 website, September 17, 2013.

40.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nion Members Summary,”economic news release, January 24, 2014, p.1.

41. Leonhardt,“The German Example.”

42. 参阅 Anthony B.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1 (2011): 41-42.

43. 参阅Robert E.Weir, Workers in America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13), p.365.

44. 参阅U.S.Strike Commission, Report on the Chicago Strike of June-July 1894, 53rd

Congress, 3rd sess.,Sen.exec.doc.no.4.(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5), pp.18, 19.

45. Quoted in “Facing the Issue,” editorial, Public Policy 8, no.24 (2013): 376; D.M.Perry, “Labor Unions Denounced,”Public Policy 8, no.20 (1903): 319.

46. 15 U.S.Code § 17, “Anti-trust Laws Not Applicable to Labor Organizations,” October 15, 1914.

47. 参阅“Labor and the Sherman Act,”Yale Law Journal 49, no.3 (January 1940): 518-37.

48. 参阅 Frank Levy and Peter Temlin,“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1310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June 27, 2007, p.16.

49. 参阅 Frank Levy and Peter Temlin,“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1310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June 27, 2007, p.16.

50. 参阅Harold Meyerson, “Class Warrior,”Washington Post, June 9, 2004.

51. 参阅Greg J.Bamber, Jody Hoffer Gittell, Thomas A.Kochan, and Andrew von Nordenflycht, Up in the Air: How Airlines Can Improve Performance by Engaging Their Employe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5.

52. 参阅Peter Rachleff, “Workers Rights and Wrongs,”Dallas Morning News, November 4, 2007.

53. 参阅Peter Rachleff, “Workers Rights and Wrongs,”Dallas Morning News, November 4, 2007.

54. “Court OKs UAL Wage Cut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 2005.

55. 参阅 Elise Gould and Heidi Shierholz, The Compensation Penalty of “Right-to-Work” Laws, Issue Brief #299,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February 17, 2011.

56. 参阅“2012 Right-to-Work Legislatio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website.

57. 欲了解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情况，参阅 Dean Baker, The End of Loser Liberalism: Making Markets Progressive(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 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11), p.29.

58. Madland and Miller, “Latest Census Data Underscore How Important Unions Are for the Middle Class.”

第十四章 穷忙族的壮大

很多人认为工作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不过下列事实进一步反驳了这一标准假设，即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从事全职工作，但依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少数人无须工作，却享受着荣华富贵，并且这类人的数量也在激增。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但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窘况；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掌握大量的财富，且大部分财富都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可以靠着财富产生的收益，轻松地过上舒适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和他的收入画等号。

直到最近，贫困人群多为没有工作的人，例如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以及失业人员。社会安全网和私人慈善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帮助。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在过去，美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层工作岗位。这些工作报酬不菲，并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因此全职工人陷入贫困的情况很少见。如今这一情形已不复存在。时任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在2014年指出，穷人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不用去工作。我真的不想工作。我宁愿无所事事。”[注]一些政客固执地这样看待穷人。事实上，美国的穷人工作非常努力，一周工作时间经常超过40个小时，有时还身兼数职，但到头来他们和家人仍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注]

美国穷忙族队伍壮大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底层人群工资水平持续下滑。到2013年，美国穷忙族人数增加到4700万，也就是说每7个美国人就有1人属于穷忙族。1/4的美国工人即使全年从事全职工作，他们的收入也不足让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高于联邦政府所定义的贫困线。[注]即使在经济大衰退之后的所谓复苏期间，低收入

人群的工资依然保持下行趋势。在2010~2013年，底层5%的人群平均收入下跌了8%，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财富减少了21%。[注]美国乐施会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美国食物银行和其他慈善膳食支持项目的受益对象达46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有工作，或者属于工薪阶层家庭成员。[注]

劳动阶层的“价值”不可能会减少这么多，除非从套套逻辑的角度来解释，即他们收入减少了。事实上，他们的收入之所以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经济和政治权力。在经济低迷期，公司首席执行官追逐利润，为了削减劳工成本，将工作岗位外包，购买自动化机器来取代工人，或者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导致许多中产阶级工人进入地方服务业工作，收入大不如以前。在经济大衰退期间裁减的工作岗位中，零售业和快餐业等低薪行业占到22%。[注]不过“全国就业法计划”一项报告指出，在经济衰退结束到2013年，这些行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占到新增工作岗位的44%。[注]这些行业的雇主对工会恨之入骨，并且成功地击退了任何组建工会的努力。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不断地侵蚀着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国会（更确切地讲是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选择不提高最低工资来进行弥补。美国全国餐饮协会和全国零售业联盟，以及最大几家快餐连锁店和零售商进行游说，反对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水平，这相当于导致最低工资实际价值进一步下跌。到2014年，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每小时7.25美元）低于1996年的水平。[注]当时我担任劳工部长，带领其他人开展政治斗争，将最低工资提高到了7.25美元。如果最低工资的价值要达到1968年的水平，那么它应该提高到每小时10.86美元。[注]此外，到20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当时，并且更富有效率。

不过一些人指出，如果我们试图恢复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则雇主会因此解雇最底层的员工，因为这些员工的“价值”低于他们的工资。2014年6月，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在加州丹纳岬豪华的君主海滩

瑞吉度假酒店举办共和党主要捐款人大会。在会上，科赫兄弟的内部经济学家理查德·芬克直言不讳地反对最低工资。他说："最低工资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一些人的工资高于他们的附加值。它的危险在于将有50万人因为最低工资而失去工作。"[注]芬克警告说，届时这一庞大的失业人群会失望透顶，成为"极权主义和法西斯招兵买马的主要温床"。[注]与会人员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继续享受桌上的鱼子酱。

很多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在扣除物价因素后恢复到1968年的水平）会导致雇主裁减工作岗位。这一谬论成为常见的论调。一个推论是如果全面取消最低工资，允许雇主向雇员支付与他们"价值"相匹配的工资，这就能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正如前国会议员米歇尔·巴克曼所说的那样，如果废除最低工资，"我们能够提供各种水平的工作，这样我们也许能够几乎全面解决失业问题"。[注]从理论上来讲，巴克曼讲的没错。不过她的观点毫无意义。一个国家经济创造大量的低薪工作岗位，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要知道奴隶制度可是实现了充分就业。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即使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之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至少达到1968年的水平，工作岗位也不会因此损失多少。不像工业部门的工作岗位，支付最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岗位不可能被外包到海外。自动化机器和电脑无法取代服务业员工，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人性化和直接的：总得有人在场为顾客提供帮助或者上菜。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受益者不仅限于领取最低工资的员工。低收入者手头的钱多了，他们生活所在地区的商品销售会随之增加，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阿林德拉吉特·杜伯、T.威廉·莱斯特和迈克尔·赖克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注]他们研究了几百对毗邻郡县的就业情况。每对毗邻郡县分别位于州边境线两侧，它们设定了不同水平的最低工资（一个为联邦最低工资，另外一个为所在州的最低工资，且高于联邦最低工资）。他们发现最低工资更高的郡县失业率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即便在四年之后情况也是如此。（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虽然得出相反的结果，但他们未能控制符合下列条件的郡县，即在提高最

低工资之前，失业率已增高了。[注]）杜伯、莱斯特和赖克还发现，郡县的最低工资水平越高，当地员工离职率越低，雇主从而有可能节省招聘和培训新员工方面的支出。[注]

赚取最低工资的主力军不再是希望挣零花钱的青少年了。劳工统计局表示，在2014年，快餐业男性雇员中位数年龄是28岁，女性雇员中位数年龄为32岁。在快餐业，女性雇员占到雇员总人数的2/3。大卖场雇员中位数年龄超过30岁。超过1/4的雇员已经为人父母。他们通常是家里的顶梁柱，收入至少占到家里总收入的一半。

这些雇员及其家人生活窘迫，需要医疗补助、食物券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其他纳税人埋单。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其他纳税人就无须花这一笔钱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2012年快餐业52%的员工依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并且他们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获得了近70亿美元的援助。[注]这是因为快餐业支付的工资不足以让他们维持生活，这一援助相当于美国其他纳税人替快餐业埋单，为员工提供补贴。

如果提高这些员工的工资，则无论工资增幅多大，都不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最终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是因为大卖场零售商和快餐连锁店为了争夺客源展开激烈的竞争，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行低价战。例如，在丹麦，麦当劳超过18岁的员工挣到相当于20美元的时薪，但该国巨无霸的售价只比美国高35美分。[注]如果公司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则会导致公司利润减少，从而对股东回报和高管薪酬待遇稍有影响。但我并不觉得这会有多大的问题。依据“全国就业法计划”，大企业雇用了大部分的低薪工人，并且它们在2013年之前的利润颇为可观。[注]在这些大企业中（雇用低薪工人的前50家大公司），有3/4的企业的利润比经济大衰退前要高。[注]在2000~2013年，快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翻了两番，平均年薪按不变美元价值计算达到2400万美元。[注]沃尔玛

公司同样向它的高管支付相当可观的薪水。在2012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拿到2070万美元。[注]经济政策研究所一项分析报告显示，到2012年，沃尔顿家族的财富超过了美国底层40%的家庭的财富总和。[注]沃尔顿家族仍然持有沃尔玛大部分股票。

穷忙族人数之所以增加，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确定人们是否有资格领取政府援助的标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过去，援助对象主要是无业人员。现在，失业人群获得的援助少得可怜。到2014年，美国仅有26%的失业人员领取了某种形式的失业救济金。[注]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必须有工作，才具备领取公共援助的资格。比尔·克林顿1996年的福利改革旨在促使穷人找一份工作，不要依赖福利，但是可供穷人选择的工作待遇很低，并且他们晋升为中产阶级的空间很窄。美国扩大了劳动所得税抵免的覆盖范围。不过实现就业是领取这一工资补助的先决条件。尽管有份工作并不是人们领取食物券的必要条件，但是很多食物券领取者本身有工作，并且人数越来越多。（在食品券领取人员当中，有收入的人员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19%上升到2012年的31%。[注]此外，鉴于约1/3的食品券领取人员是因为年老或者身体残障而无法工作，有工作能力且处于就业状态的食品券领取者的比例远超过31%。）

从整体来看，有关工作要求的新规定并不能减少美国穷困人口数量或百分比。2013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4.5%，超过2000年的11.3%和2007年的12.5%。[注]实际上，有关工作要求的新规定仅减少了处于失业状态的穷人人数，但同时导致处于就业状态的穷人数量增加。

穷忙族队伍不断壮大，可以从美国其他行业的状况进一步找到或许更为根本的解释。一些人否认存在着此类关联，认为中产阶级人数减少、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给顶层人群等问题与底层人群当前境况毫无关联。我们不禁要问，借用哈佛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的话来讲，“我们该如何帮助底层人群，而不是阻挠顶层人群呢？”[注]

不过这些问题密不可分。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成果落入顶层人群手中，中产阶级丧失了必要的购买力，来确保美国经济像21世纪初期一样保持高速增长。当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或下滑，中产阶级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而竭尽一切办法时，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家庭主妇进入职场、90年代所有人延长工作时间，以及2008年以前许多家庭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整个中产阶级无力扩大消费，[注]这将必然导致出现一个结果，即工作岗位减少，经济放缓。这对穷人的冲击尤为严重。底层人群最先遭解雇，也是最后被雇用；当工资和福利萎缩时，他们很有可能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并且许多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消失了，人们向上流动越发困难。由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变小，人们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寒门子弟成年时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概率高于50%。[注]今天，美国43%的寒门子弟将终生贫困潦倒。[注]

一些人仍然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取心。但穷人真正缺少的是机遇和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为他们带来必要的资源，确保他们获得机遇。首先，他们在童年时未能得到充分的照顾，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们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弟之间的教育成就差距越来越大。30年前，在满分为800分的SAT（相当于美国高考）类型考试中，前10%的顶层家庭和后10%的底层家庭子弟平均分数差距约为90分。[注]到了2014年，这一分数差距达到125分。在65个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的国家中，美国是不同收入家庭学生数学能力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阅读技能方面，美国高收入家庭学生的分数比贫困家庭学生平均高出110分。[注]

种族问题不是造成贫困家庭和富人家庭学生教育成就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注]事实上，不同种族的学生群体之间的教育成就差距在不断缩小。上述现象是下列问题造成的结果，即美国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穷人区和富人区学校的资金来源不一样，以及不同收

入群体居住隔离情况日益严重。皮尤研究中心对2010年人口普查区和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过去30年，美国不同收入人群居住隔离问题日渐严重。[注]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支持公立学校运转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房地产物业税。通常联邦政府仅为学校提供约1/10的经费，州政府则提供45%的经费。其余经费全靠当地自行筹集。[注]大部分州设法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的经费，但是它们在经济衰退期间大幅缩减支出，直到现在还没有弥补够缩减的支出。[注]与此同时，低收入社区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疲软状态，因此当地税收下滑。由于人们按收入状况居住在不同的社区，低收入地区的学校资源比任何时候都要少。结果是不同学区的学生人均经费的差距越来越大，直接不利于寒门子弟。[注]

一份联邦咨询委员会报告显示，在学生人均经费方面，支出最高的最富有地区约为支出最少的地区的两倍。[注]在加利福尼亚等州，这一比例超过了3:1。在美国富人区，一些所谓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根本不是公立性质。事实上，它们属于私立学校。它们的学费隐藏在当地高档住宅的购房成本和相应的物业税之中。

尽管有些地区的法院要求富裕学区为贫困学区提供补贴，但不平等现象仍然很严重。高档社区的家长不愿意缴纳额外的税来补助贫困社区，而是悄悄地资助可免税的家长基金会，此类基金会旨在帮助他们所在社区的学校。美国有超过1.4万个学区，其中约12%的学区的部分经费来自家长基金会。家长基金会资助学校建设礼堂（马里兰州包伊）、高科技气象站和语言艺术项目（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等等。《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家长设法将他们的钱用在孩子身上。家长基金会就是一个有形的证据。”[注]还应指出的是，家长们还设法确保这些钱不会用在其他社区的贫困子弟身上。

这导致出现一个结果——在经合组织调查的34个发达国家中，只有

3个国家出现下列问题，即与服务于贫困家庭学生的学校相比，服务于高收入家庭学生的学校的学生人均经费要高，师生比例也要更高；美国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土耳其和以色列）。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它们的政府提供54%的经费，地方税收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份额不到美国的一半。此外，这些发达国家将更高比例的国家经费划拨给穷困社区。经合组织国际教育评估项目负责人安德烈斯·施莱谢尔向《纽约时报》表示，“绝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学生人均经费平均，或者会加大对弱势学生的投入力度。美国是为数不多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之一”。

显然，金钱并非万能。但是我们怎能假装它不重要呢？有了经费，学校才有可能聘请到经验丰富的老师，建设宽敞的教室，购买高质量的教材，开展课外活动。虽然我们似乎竭尽全力，但还是没有为最有需要的学校提供更多的经费。我们要求所有学校向高标准看齐，要求学生参加越来越多的测试，并且根据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老师，不过我们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除非承认我们正在系统性地阻碍服务于弱势儿童的学校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证明穷忙族贫困问题与其缺乏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1. 参阅 Paul Krugman, “Those Lazy Jobles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14.
2.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 2010,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ebsite, March 2012.
3. Rebecca Thiess, The Future of Work: Trends and Challenges for Low-Wage Workers, Briefing Paper #341,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pril 27, 2012, p.4.
4. Jesse Bricker, Lisa J.Dettling, Alice Henriques, Joanne W.Hsu, et al., “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00, no.4 (September 2014): 9, 12.
5. Oxfam America, From Paycheck to Pantry: Hunger in Working America, Oxfam America website, p.3.

6.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The Low-Wage Recover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Wages Four Years into the Recovery, Data Brief,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April 2014, p.1.

7.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The Low-Wage Recover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Wages Four Years into the Recovery, Data Brief,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April 2014, p.1.

8. U.S.Department of Labor, “History of Federal Minimum Wage Rate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2009,” U.S.Department of Labor website.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了通胀因素。

9. U.S.Department of Labor, “History of Federal Minimum Wage Rate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2009,” U.S.Department of Labor website.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了通胀因素。

10. Elias Isquith,“Koch Brothers' Top Political Strategist: The Minimum Wage Leads to Fascism!”Salon, September 3, 2014.

11. Elias Isquith,“Koch Brothers' Top Political Strategist: The Minimum Wage Leads to Fascism!”Salon, September 3, 2014.

12. Antoine Gara,“Would Killing the Minimum Wage Help?”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ne 30, 2011.

13. Arindrajit Dube, T.William Lester,and Michael Reich,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IRLE Working Paper No.157-07,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bsite, November 2010.

14. Arindrajit Dube, T.William Lester,and Michael Reich,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IRLE Working Paper No.157-07,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bsite, November 2010.

15. Arindrajit Dube, T.William Lester, and Michael Reich, Minimum Wage Shocks, Employment Flows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s, IRLE Working Paper No.149-1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bsite, October 2014.

16. Sylvia Allegretto, Marc Doussard, Dave Graham-Squire, Ken Jacobs, et al., Fast Food, Poverty Wages: The Public Cost of Low-Wage Jobs in the Fast-Food Industry, U.C.Berkeley Labor Center website, October 15, 2013, p.1.

17. William Finnegan, “Dignity: Fast-Food Workers and a New Form of Labor Activism,” New Yorker, September 15, 2014.

18.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Big Business, Corporate Profits, and the Minimum Wage,”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July 2012, p.1.

19.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Big Business, Corporate Profits, and the Minimum Wage,”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July 2012, p.1.

20. Catherine Ruetschlin, Fast Food Failure: How CEO-to-Worker Pay Disparity Undermines the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Demos website, 2014, p.2.

21. Jessica Wohl, “Wal-Mart CEO's Pay Jumps 14.1 Percent to $20.7 Million,” Reuters, April 22, 2013.

22. Josh Bivens, “Inequality, Exhibit A: Walmart and the Wealth of American Families,”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July 17, 2012.

23. Josh Bivens, “Poverty Reduction Stalled by Policy, Once Agai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Edition,”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September 16, 2014.

24. 参阅Dorothy Rosenba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NAP and Work Among Low-Income Household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ebsite, January 2013.

25.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Information on Poverty and Income Statistics: A Summary of 2014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Data,” ASPE Issue Brief,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ebsite, September 16, 2014, p.3.

26. “Piketty v.Mankiw on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Inequality,”On Point with Tom Ashbrook, radio broadcast, April 29, 2014.

27. 欲全面了解中产阶级应对机制，参阅Robert B.Reich,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7).

28. 参阅Daniel Aaronson and Bhashkar Mazumder,“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U.S., 1940 to 2000,”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no.1 (2005): 139-72.

29. Pew Charitable Trusts, “Moving On Up: Why Do Some Americans Leave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Ladder, but Not Others?” Pew Charitable Trusts website, November 2013, p.1.

30. Sean F.Reardon, “No Rich Child Left Behind,”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13.

31.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Reading Literacy: School Poverty Indicator,”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website, 2012.

32. Kelsey Hill, Daniel Moser, R.Sam Shannon, and Timothy St.Louis,Narrowing the Racial Achievement Gap: Policy Success at the State Leve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Robert M.La Follet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website, May 2013.

33. Richard Fry and Paul Taylor,“The Ris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Pew Research Center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ends website, August 1, 2012.

34. Mark Dixon, Public Education Finances: 2012, U.S.Census Bureau website, May 2014, p.xi.

35. 参阅Michael Leachman and Chris Mai,“Most States Funding Schools Less Than Before the Recession,”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ebsite, revised May 20, 2014.

36. 参阅Andrew Ujifusa and Michele McNeil, “Analysis Points to Growth in Per-Pupil Spending—and Disparities,” Education Week, January 22, 2014.

37. The Equity and Excellence Commission,For Each and Every Child—A Strategy for Education Equity and Excellence,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ebsite, 2013, p.18.

38. “Keeping Schools Local,”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4, 1998.

39. Eduardo Porter, “In Public Education, Edge Still Goes to Ric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3.

40. Eduardo Porter, “In Public Education, Edge Still Goes to Ric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3.

41. Eduardo Porter, “In Public Education, Edge Still Goes to Ric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3.

第十五章 富闲族的崛起

在穷忙族人数增多的同时，富闲族队伍也在壮大。虽然富闲族人数相对少得多，但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一路飙升。由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收益性资本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无须工作。他们“配得上”吗？诚然，一些富闲族通过工作攒下积蓄，然后利用这些积蓄积累资产。从我们之前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配得上”。不过当资产升值时，这与资产持有人本人关系并不大。资产升值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人口增加、贵重商品供应有限，或者公司的激励措施和议价关系发生变化，而此类变化体现在股价方面。政治和政策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一个地区的学校条件和公共交通得到改善时，很多人涌入当地，房屋或公寓建筑价值随之大幅上升。此外，当贷款标准有所放松时，购房者手头的钱更多了，房价也会飙升。

不过越来越多的富闲族不事生产，他们的财富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受到命运的眷顾，出生在富豪之家。这让他们从小占尽优势，并且拥有足够的财富，确保他们一生无论做什么或者努力程度有多低，仍能继续占据优势。

象征着美国精英主义的白手起家型成功人士正在逐渐消失。今天，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六人是巨额财产的继承者。[注]正如我所提到的，沃尔玛几位继承人的财富总和超过最底层40%的美国人的财富总和。[注]

而这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即将经历规模史无前例的代际财富转移。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项目中心一项研究预测，到2061年的未来50年中，继承人继承的财富总和将达到36万亿美元。[注]美国信托公司2013年

对可投资资产超过300万美元的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代际分化问题非常严重：超过3/4的69岁以上的人和婴儿潮一代的大多数人是靠自己积累大量财富。[注]35岁以下的富人继承财富的现象更为普遍。[注]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数个世纪以来，家族财富是欧洲贵族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注]这也将成为美国新一代贵族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

富闲族崛起的原因现在应该非常明了。随着工作收入集中度上升，美国一小群富豪利用收入投资固定资产。他们还将一部分收入投向政坛——直接用于政治捐款和建立人脉关系，或者间接地通过他们的企业、行业协会和金融资产经理进行政治投资。这导致游戏规则更有利于他们积累财富。富人进行资本投资和相应的政治投资，这导致富人财富聚集速度甚至超过收入聚集速度。[注]

1978年，前1%的最富有家庭营业收入占到总营业收入的20%。[注]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49%。[注]此外，他们拿走了75%的资本利得。[注]到2014年，股市价值比2008年股市崩盘之前要高出很多。相应地，顶层人群股票投资收益更高，赚取的资本利得比重更大。

美国两党在这一财富大转移进程中串通一气。不过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为积极地助长这一现象。例如，在过去，家庭信托期限为90年。[注]但是里根政府修改了法律，许多州从此允许家庭信托永久存续。所谓的家族信托现在允许超级富豪家庭在基本无须纳税的情况下，将钱财传承给他们的继承者，并且能够代代相传。乔治·W.布什2001年和2003年出台力度最大的减税措施。这些措施不只让高收入者受惠，靠积累财富为生的富人从中受益更大。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下调到了35%，与此同时股息红利税最高税率从39.6%（作为普通所得进行征税）下调到15%，遗产税则被全面取消。[注]

虽然巴拉克·奥巴马取消了一部分减税措施，但许多措施仍然被保

留下来。在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之前，遗产税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200万美元的部分，且税率为55%。[注]到2014年，遗产税仅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1000万美元的部分，而税率下调至40%。[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试图走得更远。众议员保罗·瑞恩抛出所谓的路线图，意在取消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和不动产征税。[注]到了2013年，仅有万分之十四的不动产需要缴纳遗产税，并且实际缴纳的税率仅为17%。[注]

与此同时，美国富人实际缴纳的资本利得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33%下调到2014年的23.8%，远低于普通所得税率。[注]资本收益是富闲族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法规定，如果所有人持有不断升值的固定资产直到去世，那么继承人无须为资产升值部分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这项规定为巨额财富继承人带来了隐藏很深的极大好处。这些所谓的未实现收益已经成为美国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未实现收益在代代相传时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富人无须为此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此类未实现收益占到超过1亿美元的遗产的资产价值的一半以上。[注]

不过财富继承人一代整日无所事事，不自己打理财富，只会快速拨打理财顾问的电话，让他们代劳，这种情况可不太妙。这也无益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这帮富人不劳而获，不知道民间疾苦，却担负着我们国家大部分资本的投资重任，且这一责任越来越大。随着家族财富必然地积累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它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危害也越大。

富闲族在不断积累财富的同时，有时也会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证明他们并非为富不仁。毫无疑问，比尔和美兰达·盖茨基金会等超级富豪家庭基金会从事大量的慈善事业。富人慈善捐赠呈上升趋势，能够与19世纪末的超级富豪慈善捐赠情况相媲美。在19世纪末期，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大亨（之前提到的“强盗大亨”）成立了一直存续到今天的慈善机构。我们正经历斯坦福大学罗勃·赖克教授所谓的“美国慈善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注]。

当然，富人怎么捐款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也不完全是他们的事。捐赠者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减捐款额，与此同时受捐的慈善基金会或基金无须为捐款产生的收入缴税。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些税收扣减和免税收入相当于政府补助。2011年，此类税收减扣和免税收入总额估计达到540亿美元。[注]2011年是我们能够获得可靠数据的最后一年。正如赖克指出的，通常这些公共补助发放情况受到进行捐赠的富人的密切关注，但无须接受公众的问责。如果你不同意富人分配善款的方式，那你就要自认倒霉了。为了让大家对这一数额有个直观的了解，我们做个比较，联邦政府2011年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福利剩余的款项）、贫困家庭儿童学校午餐和领先计划方面的支出总和还不到500亿美元。[注]

此外，尽管这一公共补助被称为“慈善捐赠税收减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最终用在穷人身上。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2005年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即便做出最为乐观的假设，“慈善”捐赠只有约1/3是用于帮助穷人。[注]很大一部分“慈善捐赠”流向了歌剧院、艺术博物馆、交响乐团和剧院——当然这些都是值得捐赠的事业，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纽约林肯中心不久前举行了筹款晚会。对冲基金行业领袖大力支持，进行慈善捐款，其中不乏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的人士。[注]不过纽约市的穷人很少去林肯中心听音乐会。

另外一部分捐赠资金流向了捐赠人曾经就读或者希望他们子女就读的精英预科学校和大学。（此类学校在招生时通常优先录取父母慷慨解囊的申请者，此举相当于一种照顾富人的平权行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是美国重要的教育机构，但是能够进入这些大学学习的寒门子弟并不多。（我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的贫困学生人数几乎与整个常青藤联盟此类贫困学生的总和持平。[注]）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些精英学校更有可能培养出雄心勃勃的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顾问，而不是志向远大的社会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律师。

2014年私立大学获得的捐款总额约为5500亿美元，且捐款主要集中于几所名牌大学。[注]哈佛获得超过320亿美元的捐款。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紧随其后，分别获得208亿、187亿和182亿美元的捐款。[注]（2013年哈佛发起筹款活动，筹得65亿美元的捐款。[注]）由于法律规定人们进行慈善捐赠时可享受税收减免，这相当于人们每捐款3美元，其中就有1美元是政府以税收减免形式提供的补助。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几年前曾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注]作为回报，她享受到约1000万美元的减税额。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相当于分别从惠特曼和美国财政部获得2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的捐款，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00万美元差额出自你、我和其他纳税人身上。如果再算上这些捐款免交的资本利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总额更加庞大。由于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平均每位学生获得的补助数额巨大。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据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估计，政府每年提供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补助平均到每名学生头上有5.4万美元。[注]其他精英私立学校情况也差不多。

伯克利分校高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亨利·布莱德指出，这与公立大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注]公立大学负责培养70%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公立大学几乎或者根本没有捐赠方面的收入。他们所有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州政府，而且这些补助在不断萎缩。2013年，各州和地方为公立高等教育事业提供的经费约为760亿美元，比十年前少了将近10%。[注]与十年前相比，就读于公立大学的学生数量增加了。[注]这导致平均分配到每名学生的经费减少了30%。这意味着政府每年提供给公立大学每名学生的平均补助不到6000美元，仅为普林斯顿大学每名学生享受到的政府补助的1/10。[注]这是中产阶级和穷人受到挤压，以及顶层人群财富激增的又一个原因和结果。

我们书写着自身的命运。不过正如我所明确指出的，我们无法决定或主导我们所置身的大环境。其他因素决定着我们的赚钱能力、成就状

况、话语分量以及理想的效力。虽然富人越来越有钱，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智商更高，或者品行更好。只不过他们更加幸运，拥有更多的特权，更有权势。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高净值财富不一定能够反映他们作为人的价值。

绝大多数民众努力工作谋生，在生活的激流中奋力前进，但激流常常把他们往后冲，让他们为自己和家人感到担忧。同样地，他们不应受到指责，他们的情况也并非特例。不过他们的声音受到抑制，许多人不再抱有幻想或者变得愤世嫉俗。一名工人和我讲，如果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那他可以挣得更多。他认为自己收入和地位低微是由自身缺点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有负于他，不给予他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同时，很多穷人未能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认为自己是废物或失败者，但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在社会上无权无势。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将收入与品德混为一谈，或者将资产净值与个人价值混为一谈。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未发挥应有或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看清有关个人收入与自身价值相当这一神话的真相。

我并不是指责富人作恶或者蓄意害人。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企业高管、华尔街成功人士和其他"高价值"人员相互勾结，为了一己之利绑架美国经济。他们只不过是理性行事，追逐个人私利而已。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们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权力来增加和巩固手中的财富。我们可以指责他们自私贪婪，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和他们相比也是半斤八两。事实上有一些富人在慷慨解囊。

不过如果将我们的体制视为一个整体，即为劳动人民分配报酬的政治经济制度时，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忧。精英主义理念为现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但这一理念与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称。在权贵阶层的操纵之下，竞争环境向他们倾斜。随着他们不断地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竞争环境进一步向他们倾斜。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人口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充分利用这些变革的一少部分人，另一方是未能把握机遇的大多数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美国本可以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确保美国共享繁荣，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并且为穷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我们现在进行回应仍然来得及。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最顶层的一小群人组织市场，导致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实情况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我们应承担责任，扭转这一现状。

---

1. 参阅“Forbes 400,” Forbes, September 12, 2014.另参阅“America's Richest Families: 185 Clans with Billion Dollar Fortunes,” Forbes, last edited July 8, 2014.
2. Josh Bivens, “Inequality, Exhibit A: Walmart and the Wealth of American Families,”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July 17, 2012.
3. Havens and Paul G.Schervish, A Golden Age of Philanthropy Still Beckons: National Wealth Transfer and Potential for Philanthropy Technical Report, Boston College, Center on Wealth and Philanthropy website, May 28, 2014.(http: //www.bc.edu/content/dam/files/research_sites/cwp/pdf/A%20Golden%20Age%20of%20Philant
4. “Insights on Wealth and Worth,” Key Findings, U.S.Trust website, 2013, p.4.
5. “Insights on Wealth and Worth,” Key Findings, U.S.Trust website, 2013, p.4.
6. 参阅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 参阅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No.2062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October 2014.
8. Supplementary data provided by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es, 2011, table 7, “Sources of Income for All Households, by Market Income Group, 1979 to 201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ebsite, November 2014.
9. Supplementary data provided by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es, 2011, table 7, “Sources of Income for All Households, by Market Income Group, 1979 to 201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ebsite, November 2014.
10. Andy Nicholas, “Richest 1 percent get 75 percent of all capital gains,” Washington State Budget and Policy Center,Schmudget Blog, January 17, 2012.

11. 参阅Ray D.Madoff, “America Builds an Aristocracy,”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0.
12. Curtis S.Dubay, “The Bush Tax Cuts Explained: Where Are They Now?” Issue Brief no.3855,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February 20, 2013, pp.1-2.
13. Roberton Williams, “Resurrecting the Estate Tax as a Shadow of Its Former Self,” Tax Policy Center, TaxVox blog, December 14, 2010.
14. Roberton Williams, “Resurrecting the Estate Tax as a Shadow of Its Former Self,” Tax Policy Center, TaxVox blog, December 14, 2010.
15. Representative Paul D.Ryan, “A Roadmap for America's Future: Version 2.0,” January 2010 (http://paulryan.house.gov/uploadedfiles/rfafv2.0.pdf).
16. Chye-Ching Huang and Nathaniel Frentz,“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the Estate Tax,”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ebsite, August 29, 2013.
17. “Federal Capital Gains Tax Rates, 1988-2013,” Tax Foundation website, June 13, 2013.
18. Huang and Frentz,“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the Estate Tax.”
19. Rob Reich, “What Are Foundations For?” Boston Review, March 1, 2013.
20. Rob Reich, “What Are Foundations For?” Boston Review, March 1, 2013.
21. 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Budget of the U.S.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pp.309, 320, 326.
22.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t 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2007, p.28 (http://www.philanthropy.iupui.edu/files/research/giving_focused_on_meeting_needs_of_the_poo
23. 参阅Jenny Anderson, “Fund Managers Raising the Ante in Philanthropy,”New York Times, August 3, 2005.
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ell Grant Awards as a Peer Metric,” May 2013 (http://opa.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2011-12PellGrantComparison.pdf).
25. “NACUBO-Commonfund Study of Endowment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website.
26. Business Officers and Commonfund Institute, U.S.and Canadian Institutions Listed by Fiscal Year 2013 Endowment Market Value and Change in Endowment Market Value from FY 2012 to FY 2013, February 2014, p.2 (http://www.nacubo.org/Documents/EndowmentFiles/2013NCSEEndowmentMarket%20ValuesI
27. Alvin Powell, “Harvard Kicks Off Fundraising Effort,” 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1, 2013.
28. Richard Vedder, “Princeton Reaps Tax Breaks as State Colleges Beg,” Bloomberg View, March 18, 2012.

29. Richard Vedder, “Princeton Reaps Tax Breaks as State Colleges Beg,” Bloomberg View, March 18, 2012.

30. 另参阅 Sandy Baum, Jennifer Ma, and Kathleen Payea, Trends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Prices, Student Aid,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College Board Advocacy & Policy Center, College Board website, May 2012, p.1.

31. Eduardo Porter, “Why Aid for College Is Missing the Mar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14.

32. Eduardo Porter, “Why Aid for College Is Missing the Mar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14.

33. “Undergraduate Enrollment,”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website, May 2014.

第三部分 抗衡力量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我现在有必要再次进行总结。美国政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核心政治辩论似乎无休止地围绕着一个议题转，即表面上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政治右派支持大市场和小政府，这通常意味着减税和缩减公共支出。政治左派则支持大政府和小市场，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至少针对富人的）税率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一辩论掩盖了一个现实情况，即政府在市场设计、组织和执行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辩论因此遮掩了一个事实，即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在执行这一基本任务时面临无数的选择。由于市场状况不断变化，并且创新和技术变革日新月异，他们必须不断地做出新的选择，并且重新审议过往的选择。因此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永远不会终结。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基本选择，“自由市场”和“政府”之争将会转移民众对决策方式的注意力，并掩盖大公司、华尔街和富人对此类决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事实。随着顶层阶级掌握了经济权力，他们对游戏基本规则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手中的经济权力。很多人积极、坚定地称颂“自由市场”，但他们属于这一隐蔽的市场过程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不让公众知道经济运作方式存在这一中心现实权力，从而适时地让自己得以隐身于公众视线之外。

因此，人们只是看到了政府通过征税和转移支付，公开地进行再分配，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在最近几十年，随着顶层和底层

阶级收入鸿沟不断扩大，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有了征税和转移支付措施，收入不平等问题才没有进一步恶化。(注)

不过这些向下再分配只是现实情况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近几年大部分的再分配为逆向转移——由消费者、工人、小企业和小投资者流向企业和金融高管、华尔街交易商、投资组合经理以及资本资产所有人。不过这一向上再分配是隐形的。它的主要渠道隐匿于所有权、垄断、合同、破产和执行等市场规则之中，而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富人决定着这些市场规则。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属于发生在市场机制内部的向上预先分配。之后政府再通过税收和转移支出，将很少的一部分向下再分配给穷人。

随着经济从有形产品转向理念，这些基本规则（和它们所反映的决策）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因此更容易被掌握资源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专利和版权等知识产权成为最具有价值的财产。巨型企业采取专利“产品跳转”的策略；制药公司和仿制药公司达成有偿延迟协议；此外企业推动修改版权法，将版权保护年限延长至95年。在这些巨型企业的努力之下，专利和版权得到强化。

同样，在宽带网等网络、种子遗传特性、标准数据平台，以及少数几家华尔街银行所控制的金融体系等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几种最主要的市场操纵行为。大企业和华尔街利用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市场势力，避免受到小型竞争对手的经济侵袭或者反垄断法的法律威胁。

现代合同更加注重数据和概念，而不是实体产品。强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有机可乘，利用内幕信息对付小投资者，迫使雇员、特许经营商和顾客接受强制仲裁或者放弃合法权利。同样，破产法涉及日益复杂的程序。这些程序经常有利于大企业和银行，而不是工人、房主，以及学生贷款债务人。金融活动变得极其不透明，首席执行官们可以操纵公司回购股票的时机，将它与自己兑现股票期权和奖励股票的时间重合，从而

侵占小股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州制定了就业权利法，集体谈判权未能得到充分行使，并且贸易协议只保护知识产权和金融资产，而不是劳动的经济价值，工人的谈判权由此遭到削弱。

与此同时，我们的执法对策导致负责检查和监督大企业和华尔街的主管机构人手不足，未能维护法律或者对企业处罚和罚款力度不够，未能让个别高管承担刑事责任，提供的法律资源相对企业和华尔街律师而言并不充裕，并且限制了个人诉讼权和集体诉讼权。企业和华尔街律师一心想达成和解，而和解结果经常是不痛不痒的惩戒。

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通过下列方式影响着所有这些市场创造和市场执行决策：为竞选活动捐款，或者给一些组织捐款用于开展有利于特定候选人或不利于政治对手的宣传活动；在公职和游说公司或华尔街高薪职位之间设立“旋转门”，或者含蓄地承诺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为其提供此类肥差；通过由受雇专家组成的“智库”或开展公关活动，说服公众相信某项特定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高薪聘请大批说客和律师，在立法机构、行政听证会和法庭上为他们效力。甚至检察官和法官也不能幸免于此。

“自由市场”成为掩盖这一切的烟幕弹，因此经济成果分配制度表面上似乎是中立力量的必然结果。精英统治理念推定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价值大体相当。低收入者的“价值”不会比收入高，而高收入者的价值不会比收入低。从道德层面将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应得报酬画等号，这是一小步。这是美国精英制度所钟爱的观点。依据这一观点，一个人的收入与他的品德画等号，资本净值与道德价值相当。因此，如果政府通过征税限制高收入，或者通过转移支付对低收入者提供补助，则属于侵袭市场的行为。此类行为存在下列风险，即损害市场效率，扭曲激励机制，并有损精英制度的道德基础。（为了实现公平，此类风险被认为是必要的，不过这取决于人们持何种政治观点。）

不过市场组织形式日益反映了有利于富有阶层的政治决策。因此除

非从套套逻辑的角度来解释，否则通过市场分配经济成果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人们的价值。近几十年大企业高管收入飙升，华尔街的经理和交易员薪酬也在飞涨。如果细究其中原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见解或技能的价值剧增，而是因为他们设置市场规则的权力扩大，让自身从中受益。与此同时，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不断下滑，穷忙族贫困潦倒。同样，这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衰减，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缺点。简单来说，大企业、华尔街和富翁攫取了巨大的权力，能够影响市场规则，这为他们带来有利的结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对市场规则的影响力得到增强，从而进一步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力。与此同时，中下层阶级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大部分权力。由于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对市场规则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丧失权力的处境。

正如我所不遗余力地指出的那样，我并不是在说左右着市场规则的顶层阶级有意作恶，他们只是追求个人私利而已。有人认为，在个人私利的引导之下，理论上的“自由市场”能够带来高效并让公众受益的结果。不过我们身处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而非理论上的“自由市场”中。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经济权力为顶层阶级带来了政治影响力，让他们能够左右游戏规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手中的经济权力。在这一制度中，他们完全按理性行事。不过对整个制度而言，虽然所有人进行理性计算，但总体结果是低效、非理性的。这就逐渐损害了整个制度。

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要说明的，问题并非在于他们拥有权力或影响力，而在于中下层阶级的权力或影响力相对欠缺。不再有重要的抗衡力量来制约或抗衡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日益增强的政治权力。中产阶级、穷人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群体几乎或根本没有能力抗衡。

现在还剩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不重建抗衡力量，上述趋势会对资本主义构成何种威胁？第二个问题是，中产阶级和穷人

能否重获足够的抗衡力量，重组市场，实现普遍繁荣？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重组市场？

---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policy paper, figure 6, January 23, 2014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4/012314.pdf).

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

美国以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重大技术变革年代，工人经常被取代，社会制度变得不稳定，经济繁荣与萧条快速交替循环。资本所有人获得丰厚回报，金融精英得势，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尽管新技术具备创造普遍繁荣的潜力，但是由于顶层阶级对政治的控制有增无减，主流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普遍繁荣。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认为游戏遭到操纵。他们的焦虑和失意之情最终推动社会进行改革，让更多人过上富裕的生活。

正如我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呈现出这一发展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时代的改革。当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及其支持者认为，精英阶层在普通民众尚未得势之前获取了过多的特权，因此必须取消他们的特权。杰克逊总统的时任财政部长罗格·B.特尼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一项固定原则是防范影响民众和财产的权力不必要地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其中最不值得信任的就是金融公司。”[注]特尼还担任过司法部长，后来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第五任首席大法官。杰克逊支持者寻求废除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允许商行无须经立法机构特别授权即可成立公司。他们反对美国第二银行，认为它可能会被金融精英所控制。他们并不是抵制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贵族阶层。他们寻求建立一个能够改善普罗大众命运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一个只是提升精英阶层命运的制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首席大法官特尼在内的杰克逊主义者并不认为美国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理应受到保护，防止精英阶层侵害他们的利益。）

19世纪最后几十年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迎来了铁路、钢铁、石油和电力工业的发展。这次工业革命也

带来了巨型经济组合体（当时被称为“托拉斯”），导致财富集中在顶层阶级手中，并导致了城市脏乱和政治腐败问题。毫不夸张地讲，当时强盗大亨的爪牙明目张胆地拎着一袋袋钱，直接向顺从的立法者行贿。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因此指出，美国需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民主，或者选择让少数人掌握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选择两者。”[注]

美国做出了选择。面对公众的愤慨之情，美国推出了首个累进制所得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痛斥“罪恶的大富豪”[注]，动用政府力量拆分了托拉斯组织。他出台新的规定，禁止生产出售不洁净的食品和药品。他提议“出台法律，禁止企业向任何政治委员会捐款，或者出于任何政治目的进行捐款”[注]。在他的推动之下，国会通过了《蒂尔曼法》，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三年之后，国会通过了《竞选经费公开法》，要求选举候选人披露所有竞选捐款人的身份。同时，数个州颁布了美国首个劳工保护法，其中包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的规定。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革新。此次革新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和日用消费品大规模生产方面，例如汽车、电话、冰箱和其他耐用电器。收入和财富再次变得高度集中。华尔街的财富和影响力激增。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时，大部分美国人无力购买这些新产品和服务，否则他们将深陷债务泥潭之中。经济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推出新政改革，赋予工会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保护小投资者免受金融诈骗，保护小商店利益不受大型零售连锁店侵害。在193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公司和华尔街攻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时，罗斯福振聋发聩地指出：“这些势力从未像今天一样联手对付一个候选人。他们全体一致地仇恨我，而我对他们的仇恨表示欢迎。”[注]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出现新一轮的创新潮，包括集装箱货轮、卫星通信、新型材料、计算机、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创

新催生了新经济，同时大量财富集中在几家巨型公司和个人手中，华尔街东山再起。正如我所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开始停滞不前。[注]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通过几种方法来维持购买力。[注]第一种方法是家庭主妇进入职场挣钱；第二种方法是所有人都延长工作时间；第三种方法是借房屋不断增值之机，通过房屋净值贷款或再融资进行套现。到2007年末，美国家庭债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135%。[注]不过所有这些维持购买力的方法都不具有可持续性。2008年，债务泡沫破裂，这与1929年的情况相似。在过去100年，美国收入集中度的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928年和2007年，这并非巧合。[注]在这两年，前1%的最富有人群拿走了超过23%的总收入。如果庞大且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缺乏购买力，则经济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

美国经济已走出大衰退，实现了所谓的复苏。不过此次复苏是美国经济史上最为乏力的一次，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经济在2008年和2009年跌得有多惨。美国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而当初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经济陷入大衰退。在2008年股市崩盘之后，大部分美国人无力购买产品和服务。购买力不足导致企业没有信心进行投资、拓展业务和雇人。在经济复苏期间，美国消费相对疲软。由于它是世界其他地区需求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也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出口因此也无法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我2015年初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经济勉强实现了复苏。就业开始复苏，不过大部分人的工资并没有上涨。财富和收入集中度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前400名富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后50%的民众的财富总和。[注]前1%的富人掌握着美国42%的私有资产。[注]后50%的家庭的财富所占比例从1989年的3%下滑到今天的1%。[注]为了让大家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顶层家庭和普通家庭的财富情况。1978年，前0.01%的富人家庭财富是普通家庭的220倍。到了2012年，顶层家庭的财富是普通家庭的1120倍。[注]自2000年以来，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全日

制雇佣劳动者周薪中位数下降了。剔除通胀因素的平均时薪比40年前要低。[注]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很长时间内，欧洲和美国财富分配情况呈现出上述规律，只不过美国没这么明显。[注]现在又出现这一规律。皮凯蒂态度很悲观，认为我们无力扭转这一局面（他引用的经济数据非常全面，证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巨大的财富就几乎会自动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过他忽视了财富高度集中问题会引发政治剧变和改革——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平民党反抗事件之后，美国进入了进步时代，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爆发社会主义运动之后，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制度。

我所描述的现象超出了经济周期的范围。图17.1将当今时代放入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注]它介绍了自“二战”以来每次经济扩张期间的平均收入分配增长速度情况，以及前10%的富人家庭和后90%的穷人家庭分别所占的份额。图17.1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1982~1990年，后90%的家庭收入比例开始大幅下滑。其次，顶层人群从经济扩张中受益的程度越来越高。最后，在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中，后90%的美国人实际收入首次出现下滑的情况。在以前的经济复苏中，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从未出现过下跌的情况。这30年的收入分配模式显示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加速运行了，即最具经济权力的人群能够利用手中这一权力，修改游戏规则，让规则有利于他们，从而进一步扩大手中的经济权力。与此同时，大部分的美国人由于缺乏经济权力，他们的实际收入几乎或根本没有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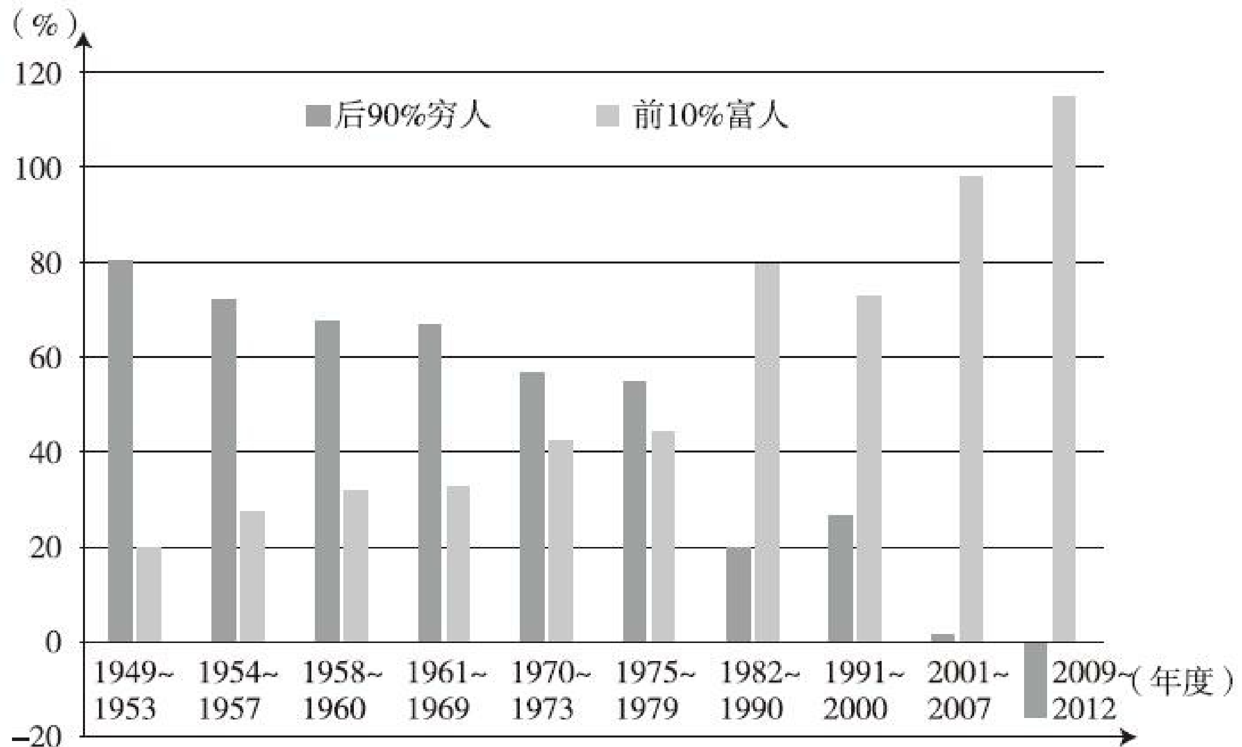


图17.1 经济扩张期间平均收入分配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Pavlina R.Tcherneva,“Reorienting Fiscal Policy:A Bottom-up Approach,”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37, no. 1 （2014）：43~66

无论从经济或政治层面来讲，这一趋势都是不可持续的。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滑，他们的购买力变得不足，从而无力支撑经济向前发展。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再分配，将富人相当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中下层阶级，从而逆转这一趋势。但从政治层面而言，这一做法不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游戏规则受到操纵，不利于他们，社会结构开始瓦解。民众对经济制度的信任度急剧下滑。盖洛普2001年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7%的美国人表示满意，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22%的人表示不满意。但这一满意度逐年下跌，而不满意度开始上升。到2014年，只有54%的美国人感到满意，45%的人感到不满意。[注]根据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持下列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13个百分点，即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出人头地。注

民众普遍认为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在若干方面损害着我们的经济制度。首先，它引发大范围的违规行为。如果其他人认为顶层人群为了自身利益操纵游戏规则，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欺骗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偷窃雇主的东西，对打卡钟做手脚，在不在位时间上弄虚作假，收费过高，将一部分利润塞入自己腰包，在签合同或交易时收取小恩小惠和拿回扣。不过经济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哪怕再细小的不诚信行为也会产生累积效应，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雇主不得不制定更严格的规定，减少员工的自行决定权；每天下班时进行耗时的检查和安检；加大查账和交易监督力度；出台更多的法律措施和不必要的程序，确保不会出现投机行为。人们不得不签订内容极其复杂的合同，以防在商业交易活动中受损；债务人在追加借款时不得不缴纳更多的保证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为了遏制欺骗行为泛滥的现象，烦琐的手续成倍增加。在这一经济僵化过程中，由于我们日益倚重律师、会计、审计人员、安保人员和安检员的服务，他们成为唯一的受益群体。

其次，当民众认为经济游戏遭到操纵，社会诚信受损时，我们不可能指望人们继续保持忠诚。这意味着民众整体意愿下降，不愿加倍努力或额外付出，承担分外之事，汇报突发问题，或者拿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员工或承包商不愿意分享技术信息或具有实用价值的见解。他们知道，一旦进行分享，联合生产力将得到提升，高管将从中得利，工作岗位将会遭到裁减。此外，不像房地产、机器或知识产权投资活动，对此类额外知识的投资不受保护。因此民众普遍持怀疑态度，担心自己的投资成果被其他人据为己有，从而没有动力进行知识投资。

最后，如果人们认为身处其中的制度受他人操纵时，常常会选择推翻这一制度，从而导致所有人的利益受损。举个例子，我在伯克利分校教授一门有关富裕和贫困问题的课程，课上，我安排学生做一个模拟游

戏。他们两两配对成一组，然后假设我给每组其中一名学生1000美元。这名学生如果能和小组组员就两人如何分配这笔钱达成一致，就可以拿到其中一部分钱。我还规定，这名学生只能出价一次，然后其组员必须表示同意或者拒绝。此外，一开始拿到1000美元的学生必须将分给组员的金额写在纸上，然后他们的组员写下“同意”或“不同意”。

你可能以为一开始拿到1000美元的许多学生会报价1美元或者更少，并且他们的小组组员会欣然地接受。毕竟1美元总比最后一无所有要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能让现状得到改善。但实验结果并非如此。一开始拿到1000美元的大部分学生要慷慨得多，至少为他们的小组组员提供250美元。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组员拒绝了低于250美元的报价，哪怕这意味着他们一组两人最终一无所有。社会学家针对不同的群体和组合开展了数千次此类或相似的实验，最终结果都惊人地相似。

近几年，国家舞台上正大规模地上演着这一游戏。不过它是真实存在的。随着少数美国人占有国家总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虽然比以往更努力工作，但收入在减少。正如模拟游戏中所发生的，输家开始拒绝达成交易。举个例子，民调显示，在2015年，大部分美国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持反对态度。[注]该协议是由美国和亚洲国家贸易谈判代表构想出来的，旨在进一步开放美国和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商业活动。历史经验和政策证明，扩大贸易将为所有人带来好处，让我们享受到更为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在近几年，投资商和高管成为贸易活动的最大受益群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下阶层丢掉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贸易开放带来的负担过多地落在他们的肩上。据民调显示，到2014年大多数美国人不再支持贸易开放协议。[注]

一个人在进行交易时，如果交易对方从中得到的好处过多，那么哪怕他本人也能从中受益，他还是会拒绝交易。这是为什么呢？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出于嫉妒或恶意。不过当我询问学生为什么在分配游戏中拒

绝接受低于250美元的报价时，他们解释说如果同意这一报价，则游戏结果不公平。要记住，我是随意发放这一1000美元的。一开始拿到这笔钱的学生无须努力争取或表现杰出。换句话说，当输家认为游戏受到操纵时，他们宁愿放弃一些好处，也要防止赢家拿走过多的好处——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不公平。拒绝接受低于250美元的学生向我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即担心如果他们的小组组员拿走其中的大部分钱，到时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这会导致游戏进一步受到操纵。所以他们宁愿牺牲一些好处，也要避免不平衡和腐败问题加剧。这意味着如果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游戏继续只产生为数不多的大赢家，许多人认为相比之下自己属于输家，那么输家将会试图阻止这一游戏。他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不公平感，以及对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特权的恐惧。

总而言之，当人们认为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努力工作没有回报时，最终都会成为输家。这是由多个相关联的负面后果造成的，包括普遍存在的欺诈和偷盗行为、不断加深的不信任感，以及为了阻止富人变得更富而宁愿放弃共同受益机会的心理。由于我们在安保人员、会计、审计员、律师、安检和监控设备方面的支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不过这些防护性支出并不能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正如我们看到的，还存在另外一个负面结果，即由于民众购买力不足，缺乏经济保障，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长期不足。这些反应叠加在一起，会对经济体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变成了数学家所说的“零和”游戏。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让大多数人享受经济成果，则它最终将停止产生经济成果，到时甚至连顶层富人都无法享受到经济成果。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多少顶层富人能够看清这一基本现实。

这一态势不只威胁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他地方同样处于衰落的境况。到2014年，欧洲大部分地区和日本均出现了工资停滞或下跌的情况。民众的经济不安全感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效率越来越高，消费者队伍发展壮大，但是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并未实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激增。[注]中国富裕的精英阶层效仿

西方国家富人进行炫耀性消费。此外，中国的腐败问题似乎也很普遍。

如果历史可供借鉴，改革有可能始于美国，并推动其他地区进行改革。这是因为美国人常常选择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当我们能够承认存在问题，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的习惯是着手解决问题，哪怕问题再棘手。过去，每当资本主义处在危急关头时，我们都没有选择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的宏大计划。我们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一次又一次地拯救资本主义制度，防止它肆意妄为。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维系自身存在时，无论权力集中程度有多高，我们都能够对其进行制约。现在是我们再次出手的时候了。

---

1. Samuel Tyler, Memoir of Roger Brooke Taney, LL.D.: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J.Murphy & Co., 1872), p.212.
2. 参阅Irving Dillard, Mr.Justice Brandeis, Great American: Press Opinion and Public Appraisal (St.Louis: The Modern View Press, 1941), p.42.
3. Theodore Roosevelt, “Address of President Roosevel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ying of the Corner Stone of the Pilgrim Memorial Monument,” Provincetown, MA, August 20, 190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7), p.47.
4. Theodore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December 5, 1905 (http://www.theodore-roosevelt.com/ images/research/speeches/sotu5.pdf).
5. 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6年10月31日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的演说.参阅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ebsite.
6. 参阅Carmen Denavas-Walt, Bernadette D.Proctor, and Jessica C.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U.S.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24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eptember 2013), figure 1, p.5.
7. 我在另一本书《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8. 参阅Alberto Chong,“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no.3 (September 22, 2014): 2.
9. 参阅Emmanuel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 with 2007 Estim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ugust 5, 2009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8dp1f91x).他们计算的收入为税前收入，并且

包括资本利得收入。

10. 参阅Lawrence Mishel,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and Heidi Shierholz,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2th e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参阅Lawrence Mishel,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and Heidi Shierholz,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2th e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 参阅Janet L.Yellin,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Inequa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October 17, 2014.

13. 参阅A.Bonica, N.McCarty, K.Poole, and H.Rosenth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3 (Summer 2013): 103-24.

14. 参阅Drew DeSilver, “For Most Workers, Real Wages Have Barely Budged for Decades,” Fact Tank,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9, 2014.

15. 参阅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 参阅Pavlina R.Tcherneva, “Growth for Whom?,”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October 6, 2014, figure: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Income Growth During Expansions”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op_47.pdf).

17. 参阅 Rebecca Riffkin, “In U.S., 67% Dissatisfied with Income, Wealth Distribution,” Gallup website,January 20,2014(http://www.gallup.com/poll/166904/dissatisfied-income-wealth-distribution.aspx).

18. 参阅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USA Today, “January 2014 Political Survey, Final Topline,”January 15-19,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questionnaires/1-23-14% 20Povert y_Inequality%20topline% 20for% 20release.pdf).

19. 参阅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National Survey on Fast-Track Authority for TPP Trade Pact,” January 27, 2014 (http://fasttrackpoll.info/docs/Fast-Track-Survey_Memo.pdf).

20.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Poll: Only the Strongest Obama Supporters Want Him to Have Fast-Track Authority,”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anuary 30, 2014.

21. 参阅Tom Orlik and Bob Davis, “China Falters in Effort to Boost Consump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6, 2013.另参阅 Yu Xie and Xiang Zhou,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May 13, 2014.

第十八章 抗衡力量式微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当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则被经济精英阶层掌控，如果不调整背后的政治权力分配关系，那么经济制度改革是无法实现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在2014年秋季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注]研究揭示了这一挑战的规模。季伦斯和佩奇具体分析了1799项政策议题，确定经济精英、商业团体、大众利益团体和普通民众对此类议题的相对影响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普通美国民众的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接近于零，并且从统计角度而言微不足道”。[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富人和财大气粗的商业界游说能力超强，并且拥有雄厚的财力来资助选举活动，因此立法者会对他们的政策需求做出回应。发人深省的是季伦斯和佩奇的数据来自1981~2002年。在这之后，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案和麦卡琴案的判决结果为巨额政治献金放开了闸门。稍后我们将会讨论这一问题。这项研究还早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暗钱”出现的时间，甚至早于华尔街救市时间。如果他们将数据采样时间延长到今天，他们的研究结论就可能会进一步向富有阶层倾斜。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普通民众从未掌握多少直接的政治权力。沃尔特·李普曼在他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指出，广大民众并不了解或在意公共政策。[注]公众意志受精英阶层的操纵，是他们一手“炮制”的结果。李普曼总结道：“我们不再可能信奉原始的民主信条了。[注]”不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其他国家屈服于共产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相比之下，美国民主制度显得强劲有力。

在“二战”结束后，政治学家试图解释美国民主相对稳定和负责的原因。他们假定，尽管美国个人的声音无足轻重，但是大部分人同时属于多个利益集团和会员制组织的成员——俱乐部、协会、政党和工会，而政客们会对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进行回应。当时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它与过去教科书所介绍的直接甚至是代议民主制模式并不相符。不过它对大部分民众的需要和希冀做出了回应。在这些学者看来，民主治理取决于此类相互竞争但是利益交织的团体之间的持续协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在1951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专著《政府进程》中写道，“在美国等多团体社会的政治事务中，主要的平衡力量”由“同时加入多个组织化利益集团的成员”组成。[注]杜鲁门表示，大部分美国人是多个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向政治领袖传达其成员的偏好意见。这些存在成员重叠情况的团体推动社会和平改革，同时也起到稳定民主制度的作用。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在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指出，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功，而在其他地区遭遇失败，是因为美国存在为数众多的团体，并且每个团体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少数派。[注]每个团体为了达成目标，和其他团体联合起来，因此整个民主制度保持着灵活性和响应能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社会不是由多数派或少数派统治，而是“由少数派组成的多数派”统治。

研究显示，民选领袖重视小企业等地方精英和全国性组织的意见。地方商会由小企业组成。全国性组织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农场局联合会，以及全国性工会的地方分会。全国性组织的成员在地方和州一级的分会中非常活跃。各个政党为自下而上的分层型体系，它们以强大的地方和州一级组织为基础。它们的沟通方式主要是自下而上的。例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各州都设有分支机构，在各州的大城市设有分会。该协会推动国会通过了1944年《退伍军人法》，保障军人在退伍后能够接受四年的高等教育，获得经过补助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商业贷款。[注]退伍军人协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分支机构和分会能够

动员数万名会员向他们各自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施压。

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政开始，一直到“二战”后的前几十年里，联邦政府成功地打造了新的经济权力中心，来抗衡巨型企业和华尔街的权力。正如我所提到的，在工会的努力推动之下，1935年国会通过法案，在法律上承认集体谈判权。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工会再接再厉，提高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无组织工人通过《最低工资法》获得经济权力。小农场主获得联邦政府的价格补贴，并且在农业政策制定方面拥有发言权。农场合作社和工会一样，争取到联邦反垄断法豁免权。各州的“公平贸易”法保护小零售商利益不受零售连锁商的侵害。此类法案要求批发商在价格方面对所有零售商一视同仁，并且阻止连锁商降价。与此同时，零售连锁商获准成立全国性组织，对抗拥有强大市场力量的大型生产商。证券交易法防范大股东和企业高管滥用手中的权力，为小股东提供保护。此外，美国出台法案，禁止州际银行业务，并且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独立分开。这些法案保护小银行利益免受华尔街的侵害。整个经济体系经历着这样的变化。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赞许地将其称为“抗衡力量”。[注]他认为通过这些新的影响力中心，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得到广泛的分享。他于1952年写道：“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扶持抗衡力量可能成为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的主要职能。”[注]抗衡力量遍及整个经济体系，制衡着高度集中在大企业和华尔街手中的权力。加尔布雷斯还指出，“鉴于经济存在着私营市场力量，抗衡力量不断壮大，这能够强化经济自发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少了政府全面控制或规划的数量”。[注]这些另类的力量中心确保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能够享受较大份额的经济增长成果。

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形势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正如季伦斯和佩奇的研究所明确揭示的：不仅仅是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注]形成抗衡的经济权力中心也开始萎缩。随着富人利益集团支

配市场运行规则的权力与日俱增，起着抗衡作用的经济权力中心却江河日下，进而削弱了它们在设定市场运行规则方面的发言权。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基层会员制组织开始萎缩，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投入的时间减少了。随着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这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末络绎不绝地加入有偿工作劳动大军的家庭主妇。由于当时男性工资停滞不前，威胁到了家庭收入，家庭妇女为维持家庭收入不得不进入职场。正如社会学者罗伯特·普特南所记录的：美国不再是一个由“参与者”组成的国家。[注]林林总总的组织曾赋予了美国多元主义力量和意义，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组织开始分崩离析。到了21世纪头十年，许多组织已消失殆尽，随之消失的还有它们的集体发言权，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游说组织。这些游说组织总部通常设在华盛顿。“会员制”不再代表地方和州一级的会员积极参与，或者分支机构和分会向国家领导人传递会员的偏好。现在它仅仅代表个人在面对大众募捐活动时是否愿意进行捐款。

正如我所讨论的，工会成员人数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企业开始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并且威胁进一步转移工作岗位，以此要挟工会工人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做出让步。此外，许多企业搬迁到不承认工会的就业权法州，并且打击工人组建工会的努力。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1年解雇了举行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此举相当于助了企业一臂之力，让企业的上述举措实现合法化。不过在竞争压力下，首席执行官们早已朝着这一方向行动。正如我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恶意收购和杠杆化收购浪潮，公司高管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与工会进行斗争，减少劳动力成本。工会日渐式微，这削弱了普通工人参与企业利润分红的议价能力。工会衰落还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权力，来通过谈判推动出台有助于推持工人收入的法律和规定。这些法律和规定包括维护和扩大工人集体谈判合同权的劳动法，保护工人就业（或者在失业时提供足够补偿）的贸易协议，确保工人对企业治理拥有一定发言权的企业法，以及优先考虑工会合同的破产法。

虽然工会仍然开展游说活动，捐助竞选活动，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每况愈下，特别是与大企业、行业协会、华尔街和富人相比。例如，在2012年选举中，科赫兄弟的政治关系网络捐款超过4亿美元。[注]这一金额是前十大工会政治费用支出总和的两倍。[注]同一年，企业游说活动费用是工会的56倍。[注]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时更多地依赖富人的资助，而不是工会。在2012年，前万分之一的富人家庭资助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的经费是工会的四倍多。[注]美国工人丧失了集体经济权力，这导致他们丧失政治权力的问题恶化，进而加快了他们进一步丧失经济权力的速度。

其他抗衡力量中心也节节败退，包括小零售店、农场合作社以及地方与区域性银行。由于州“公平贸易”法遭废除，并且法庭判决裁定维持转售价格的做法违反了反垄断法，许多小零售商因此破产倒闭。主导上述行动的大型连锁商争辩说，消费者因此享受到了更多的优惠。不过这也为沃尔玛等大卖场零售商铺平了道路。它们抢走了美国小城镇商业主街的大量生意，导致许多城镇变成了“鬼城”。这些变化导致数百万家当地商店倒闭。这些商店曾经为它们的社区提供各类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并且其中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是由当地生产和提供的。同样，在华尔街的要求下，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因此变得更大，占领了州立和地方银行所服务的市场，进而切断了许多地方和区域性小企业的融资来源。

与此同时，政党转变自身定位。随着收入和财富开始集中到顶层阶级的手中，加上竞选费用激增，政党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巨型筹款机器。在过去，这些政党以州和地方一级的组织为重心，这些组织负责向上传达党员的意见。由于竞选费用激增，共和党不得不低头。不过早在此之前，共和党就已经积极地迎合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的喜好。近年来，民主党也开始积极地回应富有阶层的要求。民主党众议员托尼·科艾略自鸣得意地说：“不管企业喜不喜欢，它们都得和我们打交道，毕竟我

们是多数党。”[注]在20世纪80年代，科艾略是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的负责人。当时他对美国的企业进行勒索。很快，科艾略的民主党在筹措企业和华尔街竞选献金方面与共和党打成平手。由于大企业认为自己需仰仗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它们随后对两党慷慨解囊。这被证明是一桩浮士德式的交易。在民主党1994年遭遇中期选举惨败的数月之前，许多民主党议员因为他们的企业赞助商持反对意见，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民主党对大企业的依赖程度有多高。

相对共和党而言，当民主党执政并控制国会时，少数群体和妇女权利等非商业性事业成功的概率较高。不过无论哪一个党执政，商业利益集团都是如鱼得水。例如在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前两年里，民主党控制着国会两院，他大力推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成立世贸组织。这两项议题对大企业而言极其重要。他还承诺削减联邦预算赤字，这是华尔街证券交易商所坚持主张的议题。克林顿及其在国会的盟友还废除了旨在约束华尔街的金融法规，而这些规定都是民主党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制定的。1994年，民主党支持《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该法取消了对银行跨州营业的限制。1999年，克林顿力推废除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独立分开。2000年，他签署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场外交易的衍生品合约进行监管，其中包括信贷违约掉期。最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1992年总统选举时，克林顿承诺将阻止企业对高管薪酬超出100万美元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但他在兑现这一承诺时打了折扣，仍然允许企业继续享受相关的税收抵扣待遇，只不过要求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这意味着股票期权和奖金）。在克林顿主政期间，企业利润呈现爆炸式增长，股市大涨，首席执行官薪酬直冲云霄。

同样，虽然工商业界经常指责巴拉克·奥巴马对企业持敌视态度，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亲商的政府之一。在2008年股市

崩盘之后，奥巴马向华尔街注资数千亿美元进行救助，华尔街（和美国经济）才得以免予崩溃；他出台经济刺激方案，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大萧条；他还推出覆盖面广的医疗法案，使保险和制药公司的腰包鼓起来。在奥巴马的任期内，股市挽回了经济大衰退期间的损失，并且屡创新高。[注]此外，正如我所提到的，企业利润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达到自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注]

近期民主党政府官员任职前后的职业道路证实他们与企业和华尔街关系密切。比尔·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赴华盛顿任职前是高盛公司的联合董事长，在卸任后担任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盖特纳在赴华盛顿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之前，鲁宾钦点他为纽约联储银行行长。盖特纳在卸任后重返华尔街，担任私募基金公司华平投资公司的总裁。杰克·卢在盖特纳卸任后接任财政部长一职。他在效力于奥巴马政府之前是花旗集团另类投资部门的首席运营官。该部门主要从事自营交易。奥巴马的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在辞职后担任花旗集团环球银行部的副主席兼金融战略和解决方案部门的主席。奥巴马政府从未对银行获取救助资金设置严格条件。没有哪一个华尔街高管因为肆意妄为导致金融市场几近崩溃而遭到起诉。奥巴马政府甚至不支持对本来可以每年带来数百亿美元税收的金融交易征收小额税收，并且阻挠程序化交易。这一切也许并非巧合。

我们不应该比较民主党和共和党官员的职业道路有何不同，而应比较下列两类官员的职业道路，即巨额资金涌入政坛之前的几十年里在华盛顿任职的官员，以及之后任职的官员。在20世纪70年代，仅有约3%的国会议员在退休后成为华盛顿说客。[注]近年来，两党半数的退休参议员和42%的退休众议员从事游说工作。这并不是因为近期退休的官员顾虑更少，愿意利用自己的人脉挣钱，或者因为他们在任公职期间积累了不少经验，而是因为企业游说工作带来的经济回报要丰厚得多。

随着华尔街资助竞选活动的力度越来越大，它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和

共和党人中拥有了影响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于2013年在耶鲁大学抱怨募集经费的必要性时向听众承认，“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融市场的人员通话。所以我们只能听到银行家所抱怨的问题，而不是在康涅狄格州托马斯顿工厂工人的问题。”注

与此同时，富人在两党候选人竞选捐款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事实上，从1980年开始，前0.01%的富豪的政治捐款增长速度高于他们收入增长速度。注在1980年，前0.01%的家庭占竞选捐款总额的10%。注到2012年，前0.01%的家庭收入占到国家总收入的5%，但他们的竞选捐款份额猛增，占到联邦选举捐款总额的40%（见图18.1）。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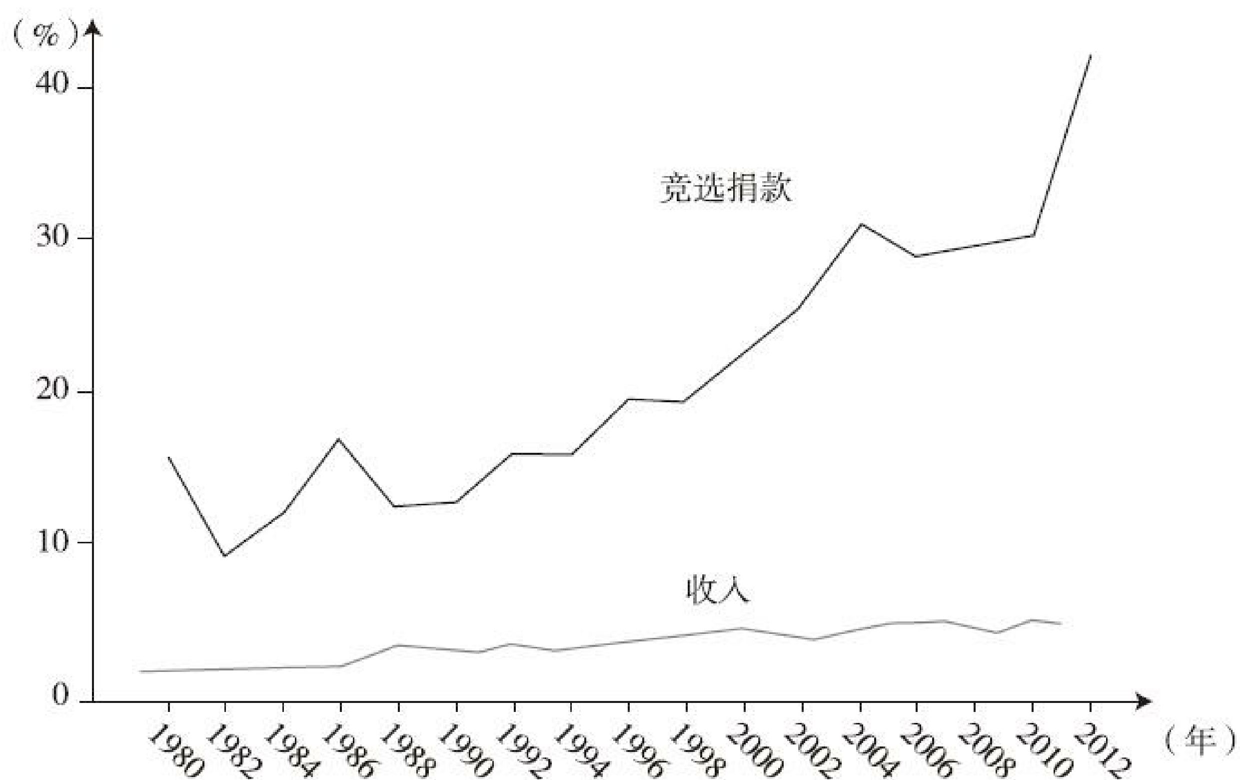


图18.1 顶层前0.01%的家庭和选民收入与竞选捐款的占比

注：黑线为顶层前0.01%的选民在所有联邦选举捐款中所占的份额情况。前0.01%的选民人数从1980年的16444人增加至2012年的24092人。在这一时期，前0.01%的选民的实际最低捐款额从5616美元增加至25000美元（按照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灰线为顶层

0.01%的家庭占总收入（包括资本利得）的份额情况。这一数字包括个人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27家组织提供的捐款，但不包括可不公开捐助人身份的501c（4）组织提供的捐款。501c（4）组织的大部分捐款来自富人。这些组织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支出了1.43亿美元和3.18亿美元。如果将501c（4）组织捐款算入其中，则这一趋势线在2010年和2012年要高一到两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A. Bonica, N. McCarty, K. Poole, 和 H. Rosenth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3（Summer 2013）: 112；从Piketty and Saez（2013）获取的收入数据

在2012年，最大捐助人为谢尔登·阿德尔森及其夫人米里亚姆，两人分别捐款5680万美元和4660万美元。注但阿德尔森夫妇捐款只是超级富豪巨额政治献金的冰山一角。在《福布斯》当年发布的400名最富美国人排行榜中，有388人进行了政治捐款。在155笔金额不少于100万美元的捐款中，有40笔来自这些超级富豪。在财富500强企业的4493名董事会成员和首席执行官中，超过80%的人进行了捐款（很多未捐款的人为外籍人员，他们被禁止捐款）。注在2016年大选之前，亿万富翁查尔斯和戴维·科赫兄弟与他们的富豪朋友联手，筹集了近10亿美元的资金，这让他们的政治组织运作规模与共和党及民主党相当。

虽然超级富豪的捐款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假如他们和同一政党的大部分其他美国民众关注的议题与所持的态度相似，那么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可能没这么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亿万富翁都掌握权力，但他们会相互制衡。事实上，富人关注的议题与普通美国人关注的议题大相径庭。亿万富翁即使相互厮杀，也不能替代抗衡力量。

举一个例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

人所担心的问题为就业问题，不论党派。[注]然而，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奇和拉里·巴特尔斯对芝加哥平均净资产达1400万美元的富人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些富人优先关注的问题是预算赤字或政府开支过度问题，是失业问题的三倍。[注]相对其他美国人而言，这些富人的下列愿意度更低，即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以减少预算赤字。富人们更希望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来减少预算赤字。他们反对大多数美国人所支持的措施，例如加大对学校的投入和提高最低工资。

依据佩奇和巴特尔斯的调查结果，富人受访者和其他美国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在过去的12个月中，2/3的富人为政治竞选或组织进行了捐款（平均为4633美元）。[注]1/5的富人帮助筹款。富人通过捐款获得影响政客的能量，而普通美国人只能是想想作罢。约有一半的富人近期与美国参议员或众议员建立联系；近一半（44%）的联系涉及相对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而不是更广泛的全国性问题。这仅仅是芝加哥富人的情况。如果放眼整个美国，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民选议员听从谁的意见以及个中缘由。这一调查对象还不包括华尔街和大公司的制度化财富和经济影响力。如果再乘以这一倍数，那么现实情况更为惊人。

如果财富和收入没有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并且抗衡力量没有萎缩，那么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0年）和“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4年）的裁决结果就不会这么令人担忧了。在这两起案件中，共和党政府任命的五名大法官无一例外地支持判决结果。联合公民案判决结果称，公司属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人，有权通过捐款全面参与选举活动。[注]随后联邦上诉法院对“SpeechNow.org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结果明确以联合公民案为先例，允许企业和个人不受限制地向独立支出委员会进行捐款。[注]独立支出委员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麦卡琴案取消了个人向联邦候选人和政党捐款不得超过12.32万美元的规定，允许总

统候选人在为期两年的选举周期内向每名捐款人筹款120万美元，并且允许众议院领导人在为期两年的选举周期内向每名捐款人筹款230万美元。[注]

最高法院有效地抽空了竞选财务法的精华部分，从而加速了我之前所提到的恶性循环，即大企业和富人花钱塑造游戏规则，使之有利于自己，从而变得更为富有，对规则的影响力更大。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在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外围团体播出的广告有一半以上来自几乎或根本不披露捐助来源的组织。[注]其中的一些组织专门是为了掩饰捐款富人和公司的身份。这些组织资助政治广告的经费远高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

这加剧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的问题。1990年，最高法院明智地将腐败定义为“通过公司形式的帮助所聚集的巨额财富的腐蚀与扭曲效应，而这些财产的聚集与公众对公司政治理念的支持并无太大关系”。[注]20年后，法院对腐败的界定更为狭隘，仅涵盖花钱购买特定投票的行为，即直接贿赂的行为。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撰写判决多数意见时干脆指出，“包括企业独立支出在内的独立开支不会引起腐败或者腐败现象”。[注]

民众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的信心日渐衰减。1964年，仅有29%选民认为政府由“几家只顾自身利益的大型利益集团所控制”。但是到了2013年，有79%的美国人认同这一观点。[注]

公众信任度最近几年下滑得尤为厉害。2006年，59%的美国人认为政府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到2013年，79％的美国人持这一看法。[注]拉斯穆森在2014年秋季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为了获得现金或竞选献金，会出卖他们的选票，并且有59％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议员可能已经这么做了。[注]66%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在乎选民的想法，51％的人甚至认为他们选区的议员不在乎他们的想

法。[注]

美国很多民众甚至懒得去投票。美国最大的政党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而是由不投票选民组成的党派。仅有58.2％的合格选民在2012年大选中参加投票。[注]中期选举投票率一般比较低，[注]在2014年中期选举，仅有33.2％的选民参加投票，这是自1942年中期选举以来最低的一次[注]；1942年值“二战”正酣之际，投票率低是情有可原的。此外，投票选民经常在选举中从支持一方倒向支持另一方，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导致占据主导或控制地位的党派交替轮换。奥巴马和民主党在2008年高票当选，但之后形势发生大逆转，共和党在2010年和2014年先后控制了众议院与参议院。

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相似的情况：权势派攫取了经济成果，而其他所有人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并且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同样出现了民众不满的迹象。到2014年，世界多个主要经济体爆发分离运动。2014年，苏格兰差点从英国独立出去；民意测验显示，加泰罗尼亚人希望从西班牙分离出去。[注]这一年年初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得势。在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中国，反对全球精英和国际机构的民族活动也开始飙升。

在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的几年里，收入和财富高度集中在顶层人群手中，达到创纪录水平，加上企业、华尔街和富人捐助竞选与权力兜售活动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一困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美国抗衡力量已经消失殆尽。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无能为力，对政治和政治家不屑一顾，对可能进行的有意义变革冷嘲热讽。不过民众的无力感也是自我应验的预言。为了重建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民主与经济制度，唯一的方法是大多数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建立新的抗衡力量。富有阶层继续做他们最为擅长的事情——赚钱。其他人必须做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利用自己的发言权、活力和选票夺回经济和政治控制权。

1. 参阅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 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no.3(2014):564-81.
2. 参阅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 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no.3(2014):564-81. p.575.
3. 参阅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2).
4. 参阅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2). pp.248-49.
5. David 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 p.535.
6. 参阅 Robert A.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7. 参阅 Theda Skocpol,Diminished Democracy(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3).
8. 参阅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 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9. 参阅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 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122.
10. 参阅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 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147.
11. 参阅Gilens and 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pp.564-81.
12. 参阅 Robert D.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3. 参阅 Matea Gold,“Koch-Backed Political Network, Built to Shield Donors, Raised $400 Million in 2012 Elections,”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14.
14. 参阅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Heavy Hitters: Top All Time Donors, 1989-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15. 参阅 Lee Drutma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Lobbyi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
16. 参阅 A.Bonica,N.McCarty,K.Poole,and H.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3 (2013): 113.
17. Gregg Easterbrook,“The Business of Politics,”The Atlantic, October 1986.
18. 参阅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website (http:// 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DJIA/).

19. 参阅Floyd Norris,“Corporate Profits Grow and Wages Sl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4.

20. Elliot Gerson,“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e Need to Leave the Country,” The Atlantic, July 10, 2012.

21. 请听墨菲参议员在“Purchasing Power: Money,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Post-Conference,”开幕词中的评论，Yale 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 (http://isps.yale.edu/node/21022 #.VJIBCYrF92c).

22.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2.

23.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2.

24.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2.

25.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p.112-13.

26.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3.

27. “Economy,Jobs,Terrorism Rank High Across Partisan Groups,”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January 24, 2014.(www.people-press.org/2014/01/27/deficit-reduction-deadlines-or-policy-priority/1-25-2014_05/).

28. Benjamin I.Page,Larry M.Bartels,and Jason Seawright,“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Wealthy America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no.1 (March 2013): 55.

29. Benjamin I.Page,Larry M.Bartels,and Jason Seawright,“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Wealthy America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no.1 (March 2013): 55. p.54.

30.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31. 参阅Speechnow.org v.FEC, 599 D.C.Cir.F.3d 686 (D.C.Cir.2010).另参阅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website.

32. McCutcheon et al.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72 U.S.(2014).

33. Nicholas Confessore, “Secret Money Fueling a Flood of Political Ads,”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4.

34. Nicholas Confessore, “Secret Money Fueling a Flood of Political Ads,”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4.

35. Austin v.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 494 U.S.652 (1990).

36.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p.5.

37. 参阅“The ANES Guide to Public Opin- ion and Electoral Behavior,”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website.另参阅Thomas B.Edsall,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4.

38. Jon Clifton, “Americans Less Satisfied with Freedom” (http://www.gallup.com/poll/172019/americans-less-satisfied-freedom.aspx).

39. “Voters Think Congress Cheats to Get Reelected,”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September 3, 2014.

40. “Americans Don't Think Incumbents Deserve Reelection,”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October 2, 2014.

41. Drew DeSilver, “Voter Turnout Always Drops Off for Midterm Elections, but Why?”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July 24, 2014.

42. “2014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U.S.Election Project website, updated December 16, 2014.

43. Philip Bump,“We Probably Just Saw One of the Lowest-Turnout El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4.

44. Raphael Minder,“Catalonia Overwhelmingly Votes for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in Straw Poll,”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14.

第十九章 重建抗衡力量

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而存在，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与对社会贡献的价值相当。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此类观念，美国人就有可能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在选择：不是让政府增加或减少干预，而是让政府要么对越发富有的少数富人群体的需求做出回应，要么对日益困顿且经济安全感逐渐丧失的大多数人的需要做出响应。这样我们才可以超越这场消耗政治左右派过多精力的意识形态争论，转而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挑战——重建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抗衡力量。

富有阶层不希望撩开“自由市场”的面纱，因为这会暴露他们对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影响力，并且揭秘可以抗衡这种力量的潜在政治联盟。他们希望底层90%的民众继续专注地就政府规模问题展开有强烈倾向性的斗争（或对同性婚姻、流产、枪支、种族和宗教等非经济问题争执不休），而不是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掀开这层面纱。当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日渐拮据，而少数特权人群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游戏规则将经济成果再分配到高收入人群手中，那么可能会出现新的联盟和新的政治学。譬如，私人投资者、家族企业、企业家、农村居民和白领阶层等典型的政治右派可能会发现自己与职场女性、少数族裔、城市专业人士等典型的左派人士拥有不少共同之处。其中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在药品、宽带、食物、信用卡债务和医保上的支出很高。如果市场规则不是由大公司制定，那么他们的此类支出会有所减少。

现行金融体系的规则由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制定和执行，而这几家银行在获得政府紧急救助后，规模变得越发庞大。在这一体系下，许

多人苦苦挣扎着。这些人包括要支付高昂贷款利息的小企业主——假如他们能够申请到贷款；被助学贷款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毕业生；房贷高于房产本身价值的私房屋主。还有些人面临准入壁垒高得惊人的知识产权体系，如努力将创意变成现实的个人发明家；一心创业的孤独企业家；为自己创意十足的作品寻找观众的艺术家；只是单纯希望分享设计或图像的消费者。或者说，他们需要花上大价钱才能使用相关平台和网络。平台和网络使用费之所以高昂，是因为拥有平台和网络的公司设定了相关标准，同时由于太多人使用这一标准，最终导致所有人都不得不使用这一标准。此外，拥有平台和网络的公司能够让反托拉斯法执法机构一筹莫展。

特许经营者发现自己受困于特许经营合同之中。合同将他们的利润几乎压榨得一干二净，不允许他们诉诸法庭，而且特许者随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他们和许多受困于用工合同的小时工处境相似——用工合同要求小时工工作很长时间或者以很低的薪水不定时工作，要求他们接受强制性仲裁，而且雇主随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

同样，当大公司拖欠小债权人、工会成员、个人股东、家庭农场主和小承包商的债务时，他们面临着与特许经营者相同的处境。当大公司破产时，他们同样身陷困境，这是因为依据银行和大债权人制定的规则，他们在受偿顺位上远远落后于大债权人。

此外，我们可以想想个人投资者、领薪雇员和小时工之间的潜在联系。他们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而首席执行官、其他高管、投资组合经理和对冲基金经理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后者能够获取内幕信息，并且有权设定规则，决定内幕信息的发布方式和时机。

从以上方面来看，无论是小企业家或穷忙族、创业者或助学贷款人、小投资者或私房屋主、白人、黑人或拉丁美洲人，还是男性或女性，这些底层90%的民众在经济方面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他们与大公

司高管、华尔街人或美国富人之间的相同之处。底层90%的民众境况江河日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市场”规则内在的预先分配方式有利于顶层人群，而顶层人群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力极大。如果小人物了解这一态势，他们就会形成联盟，扩大自身影响力。那么这个联盟或这一类联盟将构成新的抗衡力量。

我们无法预测这一情况何时会出现，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运动的苗头了。在2014年，民众对华尔街和大公司的憎恶感达到历史最高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播出的博雅公关公司2014年9月发布的国际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51%）认同下列说法：“虽然颇具影响力的大公司推动了创新和增长，但它们很糟糕。”[注]与此同时，共和党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反建制派对大公司和华尔街避之唯恐不及，而建制派与他们则亲密无间。当时有意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指出，我们“不能和‘肥猫’[注]、富人和华尔街混为一谈”。[注]同样有志于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谴责“行走于权力走廊上的权贵阶层”“越来越富有和幸福”。[注]共和党人大卫·布莱特2014年6月在弗吉尼亚第七国会选区的党内初选中击败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他指责坎托的“裙带资本主义”，控诉大公司只想要“廉价劳动力……这会拉低其他所有人的工资”。[注]

这些言论背后的真诚度可能值得怀疑，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客们之所以发表这种言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努力讨好的选民欢迎这种言论。民意调查员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顾问注意到选民对下列状况的愤怒之情难以平息：“权贵阶层”“越来越富有和幸福”，并且“压低其他所有人的工资”。譬如，民意调查显示，自称共和党派和民主党派的人支持削减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规模，让它们不再大而不能倒。[注]2014年，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戴夫·坎普建议对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资产按季度征税，以激励它们裁减规模。

兰德·保罗说：“救助华尔街根本不是保守派的做法。”

同样，普通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支持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划分开来，但1999年共和党议员与克林顿政府联手废除该法案。2013年，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联合提出一项议案，建议重立此类法案。茶党派共和党人对此表达了强烈支持，甚至批评共和党建制派没有全力支持。《茶党论坛报》写道：“政界当权阶层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捐款人和资助人应当阻止不受约束的交易策略。”2014年末，国会综合支出议案也导致一个类似的联盟昙花一现。这项议案中的条款反对《多德-弗兰克法》，允许大公司再次利用商业存款冒险。伊丽莎白·沃伦等改革派民主党参议员加入路易斯安那茶党派共和党参议员大卫·维特的阵营，坚决反对这一倒退的法案。

此外，两党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终止“公司福利”，包括为石油巨头、大农业综合企业、大制药公司、华尔街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补贴。左派进步人士一直敦促取消此类福利，不过到2014年，许多右派人士也开始加入他们的行列。坎普提议的税改计划本可以取消数十项定向减税优惠措施。克鲁兹竭力主张国会“消灭公司福利和裙带资本主义”。最后，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普通民众对大公司精心打造的贸易协定日益反感。在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与民主党携手合作，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推动美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且支持中国入世。但进入21世纪后，普通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转而反对此类协议。“茶党国度”组织创始人贾德森·菲利普斯指出：“茶党运动并不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殊利益集团和大公司已经在其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而美国普通民众却被排除在外。”

可能在未来几年里，美国政坛的主要断层线不再存在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而是存在于反当权派和当权派之间——认为游戏受到不正当操纵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穷人与操纵着游戏的大公司、华尔街人及

亿万富翁之间。到2014年底，大公司和华尔街共和党人明确表态有意支持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反建制派候选人。许多共和党大捐款人、华尔街共和党人与公司说客告诉华盛顿报纸*Politico*，如果共和党没有推出杰布·布什、克里斯·克里斯蒂或米特·罗姆尼等支持大企业和华尔街的候选人，那么他们就会转而支持希拉里·克林顿。*Politico*的分析人士最后总结道："在沿海地区共和党精英组成的富人圈里，流传着一个最为黑暗的秘密：与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或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等相比，他们更能接受的候选人是希拉里。"[注]一位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顶级华尔街律师告诉该报："如果最终是兰德·保罗或泰德·克鲁兹与伊丽莎白·沃伦之流对决，这对所有人而言是最为可怕的梦魇。"[注]

对所有华尔街人和公司的西装革履者而言，情况就是如此。即使这一"梦魇"没有出现在2016年，但是如果在今后十年里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样的噩梦可能在所难免。假如最富裕的10%美国人继续攫取所有的经济成果，而剩下90%的人日益困窘，那么美国无法维持其经济发展速度；假如绝大多数人的声音继续遭到忽视，那么美国民主制度将难以维系。

除非美国两党或其中一党远离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否则新的抗衡力量将会以新兴政党的形式出现。它将联合两大政党愤愤不平的反建制派党员，让美国90%的失势民众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正如我所强调的，我们需要避免在"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令人厌倦且越发无关痛痒的选择，转而关注众多有利于大公司、华尔街及越来越富有的少数顶层富人的市场组织方式，以及如何改变这些市场组织方式，让它们服务于普罗大众。新兴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拯救资本主义，让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分享到它成功的果实。

人们似乎对第三党的兴趣日益浓厚。2014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两大政党可以充分代表他们，而5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代表民意方面表现十分糟糕，因此需要第三

党。[注]这是自十年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开始提出有关第三党的问题以来，第三党支持率最高的一次。之前民众对第三党呼声较高的情形出现在2013年10月，当时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有意思的是，46%的自称共和党的人和47%的自称民主党的人认为需要第三党。[注]

然而，虽然人们表示希望看到第三党，但并不意味着第三党能够崛起，成为美国政坛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利于创建强大的第三党，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优势；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没有采用比例代表制。参众两院竞选的获胜者以及各州总统选举团的获胜者代表了全体选民。因此，当第三党出现时，往往只能从与他们意识形态或选民偏好最接近的主要政党那里吸走一些选票。

此外，两大政党顺应形势和谨慎投机的能力很强，完全可以抓住选民想法发生变化的机会。譬如，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重塑自我，创建一个由城市少数族裔选民、参加工会的蓝领工人、南方白人、西部选民、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组成的新联盟。这让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从而为早期的新政奠定了稳健的选民基础。民主党在众议院拿下的席位从1929年的37.7%上升到1933年的72%，同期在参议院的席位也从40.6%上升到61.5%。[注]

在189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16年里，两大主要政党顺应形势的能力进一步得到验证。当时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起了一场劳动人民抵制富人的假想改革运动，试图动员西部农民、南方人和东部劳工反对大企业家和金融家，而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坚守由商人、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士组成的保守派联盟，稳操胜券。在1904年大选之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共和党其他领袖认为公众对托拉斯巨头滥用经济权力的担忧之情日益加深，有必要做出回应。他们重新调整共和党的定位，吸纳了劳工、城市移民和进步主义改革者，并且推进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改革。在1912年的大选中，罗斯福谋求在进步党的旗帜下竞选总

统。㊟进步党的党纲呼吁“分化腐败商人与腐败政客之间的罪恶联盟”，为此它要求更为严格地限制政治献金和披露相关信息，对说客进行登记，为老年人、失业人群和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险，让妇女享有选举权和最低工资，推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成立联邦证券委员会，并且为受工伤的工人提供赔偿。尽管美国选民拒绝了罗斯福的进步党，而是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但进步党的党纲最终在罗斯福身为共和党的第五房表亲的新政中得到了体现。

在这些实例中，两大政党或其中一党顺应了时代不断变化的观念和需要。除非民主党和共和党过于依赖企业和华尔街，未能在这一历史节点对广大民众的新兴观念和需要做出响应，具有活力的第三党才有可能出现。然而，无论是大党顺应形势，还是第三党卓然崛起，其重要性都不如美国重建抗衡力量的重要性。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过程会一帆风顺或易如反掌。现行的收入、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制度与富有阶层休戚相关，因此富有阶层不可能消极地默许抗衡力量重新崛起。正如我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在一个全体公民都拥有发言权的包容性社会中，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参与者能够享受到更高份额的经济成果，并且更有安全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富有阶层获取的经济成果份额减少了，这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有鉴于此，富有阶层支持抗衡力量才是明智之举，不过他们会进行抵制。现状太过舒适，而抗衡力量的未来充满风险，难以预测。不过抗衡力量的再次崛起在所难免。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沿着当前的方向前行了。

这一新的抗衡力量寻求达成什么目标呢？首先，它会改革美国竞选资金制度，把大财阀驱逐出政坛。这就需要最高法院推翻“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和“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结果——这要么是因为最高法院多数派的一位大法官认识到自己行为愚蠢，转而加入新的多数派，从而推翻司法裁决结果（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欧文·罗伯茨大法官在法庭上背弃了四位反对新政的同事，转

而加入四位支持新政的同事的行列之中）；要么是因为新任总统任命新的大法官，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形成多数派，从而推翻法院判决结果；要么是因为新的抗衡力量召集起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推动修改宪法，授权国会监管竞选经费支出，当然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非常小。

为了不再让大财阀影响政治，我们还需要全面披露所有政治经费的来源。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为普选活动提供公共资金，或许可以依据小额捐款人捐款数额为候选人提供匹配的公共资金。我们还需要取缔划分不公平的选区，防止少数派的选票受到压制，并且取消种种投票限制规定，避免少数派承受过重的负担。

一系列息息相关的改革可以减少或堵上公职人员与华尔街、大公司和游说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至少应该禁止所有政府民选和政治任命官员离职之后，至少在五年之内不能以任何形式受聘于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行业协会、游说公司或其他营利性机构，即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监督、监控、监管或有任何官方联系。

最后，专家证人、学者和智库人员必须披露与他们向公众发布的证词、书籍、论文或研究有关的外部资金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当科氏工业集团资助的“专家”声称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没有什么关联，或者获得零售业联盟资助的教授发现提高最低收入会降低就业时，公众就可以评估这些言论的中立性。

---

1. Donald A.Baer,“The West's Bruised Confidence in Capit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2, 2014.
2. 指有钱有势的人——译者注
3. Rand Paul, speech at the Freedom Summit, Manchester, NH, April 12, 2014.
4. “The Tea Party's New Koch-Flavored Populism,”Daily Beast, April 15, 2014.
5. Michael Laris and Jenna Portnoy, “Meet David Brat,the Man Who Brought Down House Majority Leader Eric Cantor,”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 2014.
6. 参阅“2013 Lake Poll Questions and Data,”Americans for Financial Reform website, 2013.

7. Jim Nunns, Amanda Eng,and Lydia Aust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amp Tax Reform Plan, 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 website, July 8, 2014, p.18.
8. 兰德·保罗2014年3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
9.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and the Too Big to Fail Culture,”Tea Party Tribune, April 23, 2014.
10. Judson Phillips, “Trade and the Tea Party: Washington Insiders Remain Clueless,” The Hill, February 24, 2014.
11. Ben White and Maggie Haberman,“Wall Street Republicans'Dark Secret: Hillary Clinton 2016,”Politico, April 28, 2014.
12. Ben White and Maggie Haberman,“Wall Street Republicans'Dark Secret: Hillary Clinton 2016,”Politico, April 28, 2014.
13. Jeffrey M.Jones,“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a Third Political Party Is Needed,”September 24,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77284/americans-continue-say-third-political-party-needed.aspx).
14. Jeffrey M.Jones,“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a Third Political Party Is Needed,”September 24,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77284/americans-continue-say-third-political-party-needed.aspx).
15. “Party Division in the Senate,1789-Present,” U.S.Senate website; also see “Party Division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789-Present,”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ebsite.
16. Theodore Roosevelt, Progressive Covenant with the People, motion picture, Broadcasting and Recorded Sound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August 1912.

第二十章 终结向上预先分配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向上预先分配深深植根于当前的市场规则当中。抗衡力量寻求终结这种预先分配方式。譬如，缩短专利和版权保护年限，并且像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禁止有偿延迟协议。公司不得通过对产品或工艺进行细微的或外观的调整来延长专利期，禁止制药公司为自己的品牌处方药做广告——这曾是美国的明文规定，后来遭到大型制药公司的反对而被取消。

反托拉斯将回归初衷：实现市场效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而且削弱大型经济联合体的政治影响力。反托拉斯法可以用来拆散有线电视垄断公司，防止信用卡等行业出现寡头垄断，控制巨型连锁医院的规模，并且限制大型高科技公司对网络和标准平台的市场支配力。任何企业不得拥有与人类食物链关键遗传特性有关的专利。保险公司不能再豁免于反托拉斯法，这样他们就无法操纵价格、瓜分市场或在条款内容上沆瀣一气。与此同时，华尔街银行巨头的规模将受到限制，这样任何一家银行持有的资产不得超过全国银行资产的5%，无法影响大宗商品的定价，或对新股首发发挥主导性作用。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像1933~1999年那样，将投资银行股票和衍生品投机业务与商业银行更为保守、安全的商业存款贷款业务划分开来。

与此同时，合同法律法规将禁止公司要求员工、承包商或特许经营人接受强迫性仲裁。任何特许权拥有者不得因为特许经营者略微违反规定就终止合同，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将特许经营权转售给新的所有人。可以参照1991年之前的规定来界定“欺诈”，禁止所有形式的内幕交易，如公司利用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然后对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套现。公司还必须像1982年以前那样，向股东披露回购股票的时机和数量。此外，

还应禁止利用普通民众无法获取的信息进行股票交易。高频交易公司需要和其他所有交易者分享自己的交易方法和技术。此外，如果1/4以上的公司股东和利益攸关者连续两年投票反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计划，那么股东有权强制要求重新选举整个公司董事会（目前澳大利亚采取这种规定）。破产法将确保劳动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当个人无力偿还助学贷款或者首套住房贷款时，破产能够允许他们重组债务，从而拥有更多与债权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最低工资将提高到工资中位数的一半，之后将依据物价上涨水平相应地进行调整。零售连锁店、快餐连锁店、饭店和医院等低薪行业的员工可以通过多数直接表决来组建工会，从而在薪酬福利合同谈判中掌握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国际贸易合同，应采取更为公平的做法，不能只是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美国银行的金融资产，还应保护美国工人岌岌可危的工作。譬如，美国可以要求所有贸易伙伴将本国最低工资设定为工资中位数的一半，让这些国家的民众能够分享贸易成果，从而为美国出口带来新的客户，并且从总体上增进政治稳定。与此同时，国内贸易的部分收益将用来资助一个世界级的再就业体系。该体系将提供工资保险。当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但薪酬低于上一份工作时，再就业体系会在两年内为他提供等于这两份工作薪酬差额的90%的补贴。如果失业者参加全日制教育项目以提升自身技能或学习新的技能，那么他们可以获得等于上一份工作收入的90%的收入补贴。

我们还应提供充裕的执法资源，确保所有法律法规得到全面执行；加大罚款和惩罚的力度，打消公司或金融业企图违法获利的念头；充分保障民众提起个人或集体诉讼的私权，以此辅助政府的执法工作。

最后，我们应改变现行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严格来讲，教育资源不属于市场机制的一部分，而是属于现行向上预先分配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贫困地区的学生人均经费不能少于富裕地区的学生。鉴于美国各地城镇因为收入状况不同而彼此隔离，学校不能再依赖当地物业税作为

主要的经费来源。

新的抗衡力量会以上述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终结已经成为市场规则一部分的向上预先分配。但这个简单的议程只是开端。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离心力”，我们只有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才能实现普遍繁荣。

第二十一章 彻底改造公司

除了终结市场内部的向上预先分配模式以外，抗衡力量还需要在市场内部寻求更为公平的预先分配，从而降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大公司。

正如我所强调的，在过去30年里，作用于公司的激励措施基本上都导致普通员工薪酬减少，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薪酬增加。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些激励措施。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根据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员工收入中位数的比率来确定公司所得税税率。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员工收入中位数的比率较低时，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参考加州议会2014年提出的议案。[注]依据这项议案，如果首席执行官薪酬是公司员工收入中位数的100倍，那么公司所得税税率将从目前适用于所有加州公司的8.8%下调至8%。如果首席执行官收入是普通员工的25倍，那么公司所得税税率将下调至7%。相反，如果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200倍，那么公司所得税税率将会上调至9.5%；如果前者的收入是后者的400倍，那么税率会上调至13%。

加州商会将这项议案戏称为“就业杀手”[注]，但现实情况恰好相反。首席执行官并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而是他们的客户通过购买公司更多的产品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让公司有理由扩张业务和雇佣员工。因此，促使公司降低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并提高普通员工的薪酬，会增加人们的购买力，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对这项法案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它可能牵涉非常复杂的计算。不过《多德-弗兰克法》早已要求各家公

司公布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公司员工收入中位数的比率（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证券交易委员会尚未发布落实此条款的规定）。因此，加州法案不会强迫公司做任何超出联邦法律范畴的事情，而且该法的课税级距相当大，足以降低计算的难度。加州的提案并不完美，但它指出了光明的前进方向。美国最大的州在认真考虑此事，这本身就向你透露了一些信息：美国企业头重脚轻问题有多严重，以及即使在没有抗衡力量的情况下，为何仍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支持认真对待此事？

布鲁金斯研究所威廉·盖尔斯通的提议与加州的想法略有差异。[注]他主张，当员工工资增长率和美国生产力年增长率相当时，应减少对雇主的征税，而没有做到这一点的雇主则要上调税率。这一提议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将员工收入与国家总体经济成就关联起来。可能会有人反对称，公司会钻空子，将低收入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前文提到的两种提议都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依据加州议会提案，如果公司将更多的低收入工作外包出去，它将要缴纳更多的税；依据盖尔斯通的提议，雇主不能将员工错误归类为独立承包商，或将之前在公司内部完成的低薪工作外包出去。

人们提议的另外一种调整方案是提供额外的税收优惠，来激励公司为员工提供股份和共享利润，或者成立员工所有的合作社，让员工拥有更多的直接所有权。这个想法算不上新鲜事物，它可以追溯到美利坚合众国早年间的一些做法。[注]当时的法律规定，如果拖网渔船的船主“就捕获的所有海产……与全体海员签订书面的利润分享合同”，那么就可以享受税收抵免待遇。

这些提议引发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为什么股东比员工重要？这一问题表明我们应开展更深层次的改革。正如我指出的，公司不过是合同和产权的集合体。股东不能像人们拥有普通商品那样“拥有”公司。由于个人股东通过养老基金或共同基金拥有大公司，而这些基金往往迅速买进或卖出股票，快速攫取投机收益，因此这些股东并不清楚自己拥

有哪些公司，或者拥有了多长时间，不过他们倒也乐得自在。最起码高频交易清楚地证明股权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之间毫无关联。因此，股东的“所有权”不过是一种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有关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高管承担着最大化公司股价的受信义务的观点同样如此。各州签发的公司特许状并未提出此类要求。尽管公司董事是由股东选出，但董事没有法律义务将股东的利益凌驾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有关公司的唯一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新，其历史仅能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二战”结束后的前十年里，主流观点认为公司对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负有责任。

除此之外，股东并不是唯一投资于公司并承担着投资亏损风险的利益相关方。为公司效力多年后的员工可能只掌握公司需要的特殊技能和知识。还有一些员工可能为了工作举家搬迁，在公司所在的社区购房。社区自身可能也投资修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接纳公司。与此相反，大公司大多数股东的资金并不是用于扩大公司生产能力，因为股市价值和新流入的现金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股份更像是投资者收集和重复交易的数目庞大的棒球卡。1980年苹果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筹资9700万美元。[注]自那以后，这些股份在投资者之间往复流通，而且股价被不断炒高，不过增加的股价并没有流入苹果，而是进了运气奇佳的投资者口袋。这些投资者在低位买入股票，然后在高位抛出。卡尔·伊坎等激进派投资者在持有足够多的股份时，就会要求公司采取回购部分股份等方式来进一步推高股价（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史蒂夫·乔布斯的继任者蒂莫西·库克非常乐意配合。在2011年和2012年就任苹果首席执行官的头两年里，他将3.82亿美元收入囊中，其中3.76亿美元是股票奖励[注]）。不过这些阴谋诡计与苹果创新和增加实际价值的能力，或者说长期成功毫无关联。

2014年，新英格兰连锁超市“菜篮子”的董事会决定赶走深受欢迎的首席执行官亚瑟·T.德莫拉斯，但遭到经理、员工和顾客的联合反对。[注]他们举行示威和抵制活动，导致“菜篮子”70家连锁超市中的大多数超

市都无人光顾。大家都将亚瑟·T.德莫拉斯称为亚瑟·T，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商业模式。他将价格控制在低于竞争对手的水平上，提高员工的薪水，并且向员工和员工主管放权。就在他遭董事会驱逐之前，还为顾客额外让利了4%，认为这些钱更应该用在顾客而不是股东身上。换句话说，亚瑟·T把公司视为一个合办企业，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从中获益，而不仅仅是公司股东——这也正是董事会开除他的原因。最终消费者和员工取得了胜利。联合抵制运动导致“菜篮子”超市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董事会不得不将公司卖给了亚瑟·T。

当时“菜篮子”超市还不是一家上市公司，但我们看到亚瑟·T的商业模式突然间开始遍地开花，即使拥有众多股东的公司也成为其拥趸。譬如，总部设在加州凡吐拉市的大型成衣公司巴塔哥尼亚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共益公司虽为营利性质，但是公司章程要求它顾及员工、社区、环境和股东的利益。B型实验室等非营利性第三方实体对共益公司进行认证，并且定期审查公司业绩。到2014年，27个州立法允许公司注册为共益公司，为董事维护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保障，而不是只考虑拥有董事选举权的股东的利益。[注]到那时已有121个行业的1165家公司被认证为共益公司，其中包括家居产品公司“七世代”。[注]

我们或许见证了美国回归“利益攸关方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苗头。60年前，“利益攸关方资本主义”在美国司空见惯。不过有些经济学家声称股东资本主义更加高效。他们认为在股东的压力下，公司会将经济资源分配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从而加快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他们看来，20世纪中叶的利益攸关方资本主义导致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并且纵容得首席执行官不知道居安思危，雇佣过多的员工，给员工支付过高的薪水，与社区的关系过于紧密。

不过如果认真审视20世纪80年代生根发芽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所带来的后果，你或许会怀疑股东资本主义在

实践中的效果。股东资本主义遗留了不少问题，例如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薪酬原地踏步或下滑，民众经济不安感日益加重；工作岗位被外包；社区变得荒无人烟；首席执行官薪酬高入云端；公司短视，只关注季度收益；金融业变得像一个赌场，并最终在2008年几近失灵，间接伤害了大多数美国人。我们中只有一部分人持有公司股票，而少数的富人却掌握着美国各大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绝大多数股票。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美国经济的利益攸关方，但是绝大多数利益攸关方的境况却很糟糕。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实行“利益攸关方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股东资本主义模式。

德国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就体现了这一点。德国公司法要求公司采用“共同决策制”。在这一制度下，公司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运营工作，监事会则负责更高层的决策。[注]监事会一半以上的成员代表着员工，而不是股东，其具体比例取决于公司规模。此外，全体员工还由工人理事会来代表。和美国公司相比，采用这一结构的大众等德国大公司更能接受工人的权利（2014年的一个戏剧性事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当时大众公司设在田纳西州查特努加市的工厂工人寻求成立工会。尽管大众公司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田纳西州和当地政界人士担心工会化将有损该州经济发展[注]）。这一结构还限制了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保护许多高技能工作，德国的工资中位数也因此比美国高，德国工人阶级更富足并且安全感更强。

一旦出现有效的抗衡力量，我们可以重新构思和彻底改造美国公司。法律将要求员工得到代表，并且获得与其权利相称的投票权，从而避免任何个人或利益攸关方的投票权过大。美国公司只有和员工共享发展成果，顾及社区利益，并且关注环境问题时，才有可能享受到法律特权，例如有限责任、永久存续、用于签署合同的公司人格以及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然而，抗衡力量的长远发展议程不会就此止步。彻底改造美国公司

只是使我们向更为平衡的经济迈进几步而已。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未来公司需要的员工人数比现在要少得多。新技术将承担人类的大量工作。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制定新的市场规则，确保在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时，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

1. 参阅Corporation Taxes: Tax Rates: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s: Credits, Cal.SB-1372, February 21, 2014.
2. 参阅“CalChamber Releases 2014 Job Killer List,”CalChamber Advocacy website, April 10, 2014.
3. William A.Galston,“Closing the Productivity and Pay Gap,”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8, 2014.
4. 参阅 Joseph R.Blasi,Richard B.Freeman,and Douglas L.Kruse,The Citizen's Share: Putting Ownership Back into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
5. William Lazonick, Marina Mazzucato,and ner Tulum,“Apple's Changing Business Model: What Should the World's Richest Company Do with All Those Profits?” Accounting Forum 37, no.4 (2013):249-67.
6.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Definitive Proxy Statement Apple Corporation,”Summary Compensation Table—2012, 2011, and 2010, p.31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 data/320193/000119312513005529/d450591ddef14a.htm).
7. Jena McGregor,“An Ousted CEO So Popular Employees Are Protesting to Get His Job Back,”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2014.
8. 参阅 “State by State Legislative Status,”Benefit Corporation website.
9. 参阅 B Corps Fellows (http://www.bcorporation.net/).
10. 参阅 Rebecca Page,“Codetermination in Germany—A Beginner's Guide,” Arbeitspapier 33 (June 2009).
11. Amanda Becker,“Auto Union Forms Branch for Workers at VW Plant in Tennessee,”Reuters, July 10, 2014.

第二十二章 机器人取代人类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变革就引发了诸多预测，不过并不是所有预测都得到了验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28年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预言，在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所使用方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注]尽管如此，他预测到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标准”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所有人都不用担心赚钱这回事。那将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人类自从诞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永恒的问题——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自己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消磨这段光阴，使生活更明智而更惬意呢？”

2028年尚未到来，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朝着接近凯恩斯预测的社会迈进。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觉得自己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即使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劳动节约型技术非但没有创造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让绝大多数人不再为钱烦恼，反而正在创造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让少数人富可敌国，而绝大多数人日益困顿。

我也曾进行过预测。1991年，我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将所有现代工作分为三类，然后预测了各自的发展前景。[注]我将第一类工作称为“常规性生产服务”。此类工作包括美国资本主义的“老步兵”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从事的重复性任务，如在流水作业线上或办公室里的重复性工作。尽管这一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的蓝领工作，但它们也包括常规性监管工作，如反复核查下属的工作，落实标准作业流程，常规的数据输入和检索。我估算此类工作占到全美所有工作机会的1/4，但将会逐步减少，这是因为新型劳动节约型技术将会取代这些工作，而且

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非常乐意以低得多的工资完成这些工作。我还认为出于相似的原因，剩余从事常规性生产活动的美国工人薪酬会下降。

当时我并没有说错。我利用当时使用的方法进行研究后发现，到2014年，常规性生产工作在全美工作总量中的比例不足1/5，而且在剔除通胀因素后，这些工作的收入中位数较20年前下降了15%。[注]事实上，劳动节约型技术已经取代或即将取代可编码转化为软件的工作。文本挖掘程序正在取代许多法务工作；图像处理软件让实验室技术人员无用武之地；税务软件取代会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将第二类工作称为“人际服务”[注]。这类工作必须由人力来提供，是因为人际互动对它至关重要，如零售业服务人员、酒店和餐厅员工、养老院护理员、房地产经纪人、保育员、家庭医疗护理员、空乘、理疗师和保安等，不一而足。这类工作的本质是提供一对一的销售服务；确保他人的个人安全；或者确保他人得到周全的照顾，并感到快乐和舒适。我估计在1990年，这类员工占到全美雇员总数的30%左右，[注]而且我预测他们的数量还将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人际服务都要由人力提供，所以无论是先进技术还是外国员工都不可能取而代之。不过我预测有两个原因会导致他们的薪酬减少。[注]首先，他们要与大批过去从事常规性生产活动的员工竞争，后者现在只能在人际服务行业找到工作。其次，他们还要与劳动节约型机器展开竞争，如自动出纳机、电脑收银系统、自动洗车机、机器人贩卖机、自助加油机等；即使是零售业服务人员也要对抗“与电视屏幕相连的个人电脑”，“未来的消费者将在客厅里通过电视屏幕选购家具、家电和各种电子玩具，从各个角度审视商品，选择最令他们心动的颜色、尺寸、特征和价格，马上将订单传到仓库，然后仓库把他们选中的商品直接送货上门。金融交易、机票和酒店预订、租车协议等合同也是如此，消费者在家里就可以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计算机银行签订类似合同”。

事实再次表明，这个预言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多。到2014年，人际服

务工作几乎占到全美工作岗位的一半，而且绝大多数新型工作都属于此类工作。此外，在剔除通胀因素后，此类工作的薪酬中位数低于1990年的水平。[注]但我并没有预见到先进技术会如此迅速地入侵到人际服务行业。在2014年以前，亚马逊一直忙于消灭零售工作。[注]它竭尽所能减少仓库中的人力工作，甚至筹划未来通过无人机送货。就连商业性驾驶工作岗位也受到威胁。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和理查德·莫尼恩在2004年出版的《新劳动力分工》中以开卡车为例，说明有些工作是计算机永远无法完成的，因为它需要复杂的模式识别能力。[注]但是到了2014年，谷歌研发的自动无人驾驶汽车对450万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卡车司机和环卫工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注]

我将第三类工作称为“符号分析服务”。这一类工作包括所有通过操作数据、文字、口头和视觉演示等符号，来解决问题、识别问题和进行战略性思考的工作。从事此类工作的人有工程师、投资银行家、律师、管理咨询顾问、系统分析员、广告和营销专家、新闻和电影制作等创意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往往以团队的形式工作或成天盯着电脑屏幕。“符号分析服务”类工作的本质是利用各种分析和创意工具重新安排抽象符号，例如数学算法、法律论据、金融噱头、科学原理、有感染力的词句、视觉模式、心理洞察以及其他解决概念难题的技巧。此类符号操作工作要么提高效率，使人们更准确、更快速地完成任务，要么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娱乐、消遣、信息，或者变得更为快乐。[注]

我估算1990年时符号分析人员占到全美雇员总数的20%，而且预期他们的比重和薪酬将会持续上升，这是因为社会对符号分析人才的需求会继续超过此类人才的供给。我预测，符号分析类工作和其他两大类工作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这会成为驱动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力量。我的预言再次成谶，但我没有预见到这一切会来得如此迅猛，或它们之间的差异会如此明显，也没有预见到它们对不平等和经济不安感的

影响会如此深刻。譬如，我从来没有预期到在1990~2008年，美国高中肄业白人女性的预期寿命会减少五年。[注]

此外，我也未能预见到数字技术与庞大的网络效应结合起来后，会如此迅速地将员工/顾客比压低到无以复加的水平。2012年，脸书公司以10亿美元收购颇受欢迎的照片分享网站Instagram时，后者有13名员工和3000万用户。[注]我们可以将它与柯达进行对比。[注]柯达于2012年1月申请破产，它在鼎盛时期拥有14.5万名员工。[注]

员工/顾客比还会继续下降。2014年初，脸书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WhatsApp。当时WhatsApp员工人数为55人（其中包括两名年轻的创始人），而用户多达4.5亿人。[注]数字化不需要太多员工。人们完全可以将一个新的理念出售给数以亿计的用户，而不需要用太多员工来生产或推销这个理念。我的一位住图森市的朋友在家创业。他设计了一种可以确定空气中是否存在特定元素的机器。他利用3D打印机生产数百套产品，然后通过网络将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他现在只需要一架无人机来送货，而他的所有生意只需要一个人——他本人。

想想1964年全美最具价值的四家公司的平均市值为1800亿美元（按2011年美元价值计算），平均员工人数达43万。47年后，美国几家最大的公司的市值比这些前辈公司多出一倍，但是员工人数却不足后者的1/4。[注]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替代型技术，还有知识替代型技术。[注]如果将先进的感应器、语言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文本挖掘和模型识别算法等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能够快速学习人类的行为，甚至可以相互学习。生命科学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允许根据病人的具体状况和基因量身定制药物。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几年里将会有更多的符号分析师

被取代。作为美国两个最大的专业密集型行业，医疗和教育业正承受着日益加剧的压力来削减成本，与此同时专家型机器日益普及，所以到时这两个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我们正处于移动医疗应用程序风起云涌之际。这些应用可以用于直接测量从卡路里到血压的各项指标。此外，一些软件程序可以实现和医疗设备一样的功能，但不会像医疗设备那么昂贵，也不需要医疗技术人员来操作（如超声波、CT扫描和心电图）；诊断软件可以告诉你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以及可以采取哪些对策。同样，学校可以围绕智能机器进行重组（尽管教职员工会一直尖叫反对）。所谓的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和互动式在线课程等软件正逐步取代许多老师和大学教授，以及指导学生学习的助理。

这一趋势将止于何处呢？我们假想有一个小盒子——就叫它iEverything，它可以制造出任何你可能想要的东西，相当于现代版的阿拉丁神灯。你只要告诉它你想要什么，然后像变戏法一样，你想要的东西就会出现在脚边。唯一的问题是没人买得起它，因为iEverything无所不能，那么就没人能赚得到钱。显然这个场景是假想出来的，但是当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时，利润就会流入人数越来越少的的高管和业主及投资者的手中，而其他人由于失业或收入微薄，手头可用来购买商品的钱越来越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型是许多人从事大规模生产活动，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未来的经济模型有可能是少数人从事无限量的生产活动，来满足有消费能力的人群的需求。

潜在问题不是工作机会有多少，而是收入和财富如何进行分配。那些创造或投资轰动性观点的人会赚得盆满钵满。WhatsApp首席执行官简·库姆持有公司45%的股份——他也是WhatsApp的年轻创始人之一。脸书公司收购WhatsApp时，这些股份为简赚得68亿美元。联合创始人布莱恩·埃克顿凭借持有的20%股份拿到30亿美元。[注]据报道，早期员工持有公司1%的股份，这为他们每个人带来1.6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创造出轰动观点的幸运者会赚得更多。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必然的结果是他们也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些收益，他们的政治权力也会烟消云散。虽然新技术将带来琳琅满目的产品和服务，但同时也会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而且压低他们的收入，因此他们到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产品和服务，却无力购买。

大约在25年前，我曾预测现代技术将继续推高社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减少对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的需求。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帮助更多人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弥补就业机会和薪酬减少的问题。我的预言只有一部分得到印证。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收入仍然比未接受大学教育的要高出很多。2013年，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的时薪比未接受大学教育者平均高出98%，与五年前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要高出很多——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比没有大学文凭者分别高出89%和64%。[注]

不过，有一点我说错了。我当时以为大学学历可以提高工资待遇，并且让人们享受到更高份额的经济成果。事实上，美国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似乎在2000年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下降，然而此类劳动力的供给却持续攀升。正如我提到的，自2000年开始，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幅度非常小，甚至原地踏步。收入前90%的大学毕业生的累计收入在2000~2013年只增长了4.4%。同期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事实上在下降（女性毕业生的起薪下降了8.1%，男性毕业生的起薪下降了6.7%）[注]。换句话说，虽然大学教育是人们加入中产阶级队伍的敲门砖，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后，学历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更进一步。中产阶级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不断萎缩，而顶层人群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大。

扭转作为市场规则一部分的向上预先分配模式，把大财团赶出政坛，彻底改造公司，并且提高教育质量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措施将

有所裨益。这也是抗衡力量应该达到的目标。不过这些变革本身不会改变技术变革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而且正如我描述的那样，如果生产制度将绝大多数收入和利润分配给极少数人，那么任何经济或社会都无法维持下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些人呼吁在征税时对极少数人生大赢家的收入和财富提高税率，然后将这部分税收再分配给其他所有人。抗衡力量应该可以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总而言之，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大公司和华尔街遇到有效的抗衡力量，最高边际税从未低于70%（在扣除各种抵扣和税收抵免后，实际税率未低于50%）注。但是照当前趋势发展下去，如果我们希望在四五十年后实现普遍繁荣，那么所需的直接再分配规模不止于此。当少数人掌握着知识替代型技术，并且此类技术几乎无所不能时，就连托马斯·皮凯蒂建议的全球财富税也不足以实现普遍繁荣。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该如何重组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

1. John Maynard 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1963), pp.358-73.
2.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3.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4. 也有译为“直接服务”——译者注
5.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p.177.
6. 欲了解“人际服务”工作岗位工资的预测情况，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pp.215-16.
7.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8. 参阅 Greg Bensinger,“Amazon Robots Get Ready for Christmas,”Wall Street Journal, updated November 19, 2014.另参阅Stacy Mitchell, “The Truth About Amazon and Job Creation,”Huffington Post,July 30, 2013.

9.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Murnane,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How Computers Are Creating the Next Job Mark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8.
10. Alex Davies,“Google's Self-Driving Car Hits Roads Next Month—Without a Wheel or Pedals,” Wired, December 23, 2014.另参阅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2014-15 Edition,”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ebsite, January 8, 2014.
11. 欲讨论“符号分析服务”，参阅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p.170-240.
12. S.Jay Olshansky et al.,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Due to Race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Are Widening, and Many May Not Catch Up,” Health Affairs 31, no.8 (2012): 1803-13.
13. 参阅Shayndi Raice and Spencer E.Ante,“Insta-Rich: $1 Billion for Instagram,”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0,2012.另参阅Steve Cooper, “Instagram's Small Workforce Legitimizes Other Small Start-Ups,”Forbes, April 7, 2012.
14. 参阅 Eric Savitz,“Kodak Files Chapter 11,” Forbes,January 19, 2012.
15. Dana Mattioli,“Their Kodak Moments,”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12.
16. Adam Hartung,“Three Smart Lessons from Facebook's Purchase of WhatsApp,” Forbes, February 24, 2014.
17. Derek Thompson,“This Is What the Post-Employee Economy Looks Like,” The Atlantic, April 20, 2011.
18. 官方生产力数据未包括新型技术产出增长率。这可能是因为官方数据无法准确地进行测量（例如，由于开源软件是免费的，因此未被算入产出中）；此外，鉴于老的技术深深植根于经济中，技术突破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运用于整个经济中。
19. Parmy Olson,“Exclusive: The Rags-to-Riches Tale of How Jan Koum Built WhatsApp into Facebook's New $19 Billion Baby,” Forbes, February 19, 2014.
20. David Leonhardt,“Is College Worth It? Clearly, New Data Say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4.
21. 欲讨论2000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工资停滞问题，参阅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Lawrence Mishel, and Heidi Shierholz,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Briefing Paper #378,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une 4, 2014.
22. “US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 1862-2013 (Inflation-Adjusted 2013 Dollars),” Tax Foundation website, October 17, 2013.另参阅 Andrew Fieldhouse,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Shifting Market-Income Distribution, Tax Burdens, and Tax Rates, Issue Brief #365,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une 14, 2013.

第二十三章 市民的馈赠

我们无须直接对少数人当前的收入或财富征税，然后将这部分税收转移给多数人。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更广泛地共享未来的财富。这两种做法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语义层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前财富是市场规则体系的结果。诚然，WhatsApp的创始人当初煞费苦心开发了此软件，就是希望产品能够大热，从而使自己一举成功，最终他们成功做到了。但他们应该从中获得多少奖励呢？这属于哪种激励机制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如专利和版权保护期）、市场支配力方面的规则（如当标准平台违反反托拉斯法该怎么做）、合同方面的规则（如公司过于强大时与消费者或员工签署胁迫性的协议，或者利益冲突和内幕消息引发欺诈行为）、有关谁有资格宣布破产和进行债务重组的规则，以及执行这一切的规则（如保护私有财产和私人财富）。

假如我们出台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例如专利局对“新颖和实用”的界定非常严格，驳回了WhatsApp的专利申请，认为它相对其他通信软件而言不够新颖或不够实用；或者国会决定专利保护期只有3年，而不是20年；或反垄断法禁止任何控制着大型网络或主要平台的公司（如脸书公司）收购另外一家即将控制其他网络的公司（如WhatsApp）；或专利执行不力，导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WhatsApp的通信服务。在这种情况下，WhatsApp的价值就不可能达到190亿美元。它的价值可能要低得多，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而它的创始人获得的奖励也要少得多，或者他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回报。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这个问题涉及决定如何预先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根本市场规则，其中包括为WhatsApp创始人等创新者提供充足的激励。正如我所指出的，在现行市场规则下，资本资产所有者的回报越来越高，而绝大多数靠工

作维持生计的人收入不断减少。当抗衡力量足够强大时，社会可以选择制定新的规则，不再给极少数人继续提供巨额回报，但同时为创新者提供足够的奖励，激励他们继续为社会带来发明创造。

我们一方面需要鼓励人们进行新的发明创造和投资，以此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需要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避免其他人几乎变得一贫如洗。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呢？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存在足够强大的抗衡力量，我们本可以对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决策能力更有信心。我们更愿意相信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代表着社会所愿意做出的取舍。

这个问题不会就此打住。由于发明家和投资者的子孙后代并没有在最初的发明创造和投资中发挥任何作用，但他们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因此社会可能需要就此做出不同的取舍。即使市场的目的是让WhatsApp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获得丰厚的回报，它也无须为了激励创造人，同样慷慨地奖励他们的后代。即使他们疼爱自己的子女，他们对曾孙辈以及之后永远也见不到面的子孙可能也没那么关心，而且在这些子孙后代身上，创始人的基因会被其他人的基因所稀释。这意味着影响到财富和收入的长远市场规则使后辈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少，但不会减少原始发明者的动力。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做出取舍时，会进一步倾向于降低财富集中度并且共享经济成果。

知识产权就是这个道理。知识产权需要维持下列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为发明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确保一旦激励措施变得没有必要，便立刻将发明创造成果交付公众（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如果推及整个科技进步过程和所有基本的市场规则，这意味着应出台一项原则，来决定涉及未来财富的规则。和知识产权一样，财富将在某个时刻回归公共领域。

然而，由于抗衡力量的缺位，我们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要重申的是：到2014年，在最富有的十名美国人中，有六人是巨额财产的

继承者。[注]沃尔玛六位继承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底层42%的美国人的财产总和（2007年，这个比例为30.5%）[注]。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巴恩斯认为，利息、分红、资本利得和遗产占到美国人收入的1/3，并且这一部分收入几乎都属于最富裕的1%人群。[注]与此同时，除非一对夫妇的房产价值超过1068万美元，否则他们无须缴纳任何遗产税，而且现行法律让精明的房地产律师有空可钻，他们将更多的财产转移到信托基金中。除此之外，当继承人继承房产、股票和债券、珠宝、油画、古董和土地等不断增值的资产时，他们无须为资产增值部分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继承人可以终身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入，然后将资产传承给自己的继承人[注]。没有人需要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

我在简要介绍当前技术发展趋势时指出，它让越来越少的人掌握越来越多的价值，同时降低了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此外，预期美国富豪在未来50年里会将36万亿美元传承给自己的继承人。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变得头重脚轻，难以为继。

抗衡力量不仅能够扭转这种趋势，还能够利用我提议的市场规则变化所带来的收入，确保所有人能够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

达成这个目标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自每位美国公民年满18周岁当月起，每个月为他们提供最低基本收入，让他们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给自足。[注]

这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激进。1979年，保守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就表示支持这种体系：

> 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标准的最低收入，或者确保人们在不能自谋生计时仍能获得不低于某一底线的收入。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应对每个人都有可能蒙受的那种风险的一道完全合法或正当的

保护屏障，也是大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大社会中，个人已经不可能再向他出生于其间的小群体中的成员提出任何具体要求了。注注

许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同样被最低基本收入的概念所吸引，因为它完全消除了人们对福利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转移支付的需要——穷人必须按照要求来使用这一资金，否则将受到贬低或侮辱。最低收入同样会降低人们对私营雇主的依赖度，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不用害怕因此受到报复。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体系违反了社会的工作伦理，剥夺了民众通过工作所获取的支撑和意义。对这种意见的回复是：最低基本收入应该只够领取者及其家人维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出于前文已经介绍过的原因，所有不满足于最低基本收入的人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工作，尽管绝大多数工作的薪酬都很微薄。

最低基本收入使人们得以追求任何对他们有意义的艺术活动或业余爱好，因此也使整个社会享受到此类艺术活动或义务行为结出的硕果。大多数人似乎不太可能会选择无所事事，不从事体力或脑力活动。与此相反，我们可能会重返过去很多职业被视为“使命”的年代。当时，工作承载着庄重的个人承诺，而不仅仅是赚钱的方式。我曾经见过很多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护士，甚至从政者仍然将工作视为自己的使命。我还没遇到持这种观点的投资银行家，不过也许存在这样的人。

同样，具有潜力的艺术家也得以自由地从事本职工作。在过去，T·S.艾略特在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的时候勘测土地；沃尔特·惠特曼可以在陆军薪资出纳员办公室担任抄写员；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担任专利审查员的同时研究相对论。但是近几十年来，有偿工作日益侵入大多数人的生活，占用人们越来越多清醒的时间，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睡眠时间。有多少崭露头角的诗人、艺术家或科学理论家为了赚钱糊

口，基本上成天处于待命的状态，等待工作机会，最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最低基本收入将让他们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此，我们将创造一个新未来，到时大多数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们可以尽享其成果。这正是凯恩斯在1928年所预测的社会，当时他宣称百年之后，技术变革将创造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无须再为挣钱而烦恼，他们到时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最充分地利用由此获得的自由和闲暇。[注]凯恩斯没有考虑到关键的分配机制问题，这一分配机制须确保几乎所有人能够享受技术变革的成果。如果减少突破性技术所有者的继承人所获得的产权，从而为最低基本收入筹措资金，那么凯恩斯的梦想可以变成现实。

在这一问题上，真正有远见的是1776年出版的《常识》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潘恩。托马斯的论文《土地正义论》的预见性和重要性与《常识》不相上下，但知名度差了不少。1797年发表的《土地正义论》建议美国男性和女性年满21岁时可以获得15英镑，这笔钱可以作为最低基本收入，而经费将来源于土地继承税。潘恩的理由是：这种做法能够培育对刚刚萌芽的民主而言至关重要的经济独立性。在论证自己这一提议时，他指出私有产权是人类创造发明出来的。在人类茹毛饮血时代，整个地球属于“共同财产”。但是随着农业的出现，财产以排他性权利的形式出现。因为难以将土地的改善情况与土地自身的所有权区分开来，所以潘恩认为土地所有制非常有效和在所难免。[注]不过有必要也应该给予所有公民一定的保障，作为弥补他们损失的“公平补偿”。

这个类比并不完美。确切地讲，在未来，机器人和其他突破性技术并不会夺走可以使公民获得正当赔偿的“公共财产”。不过它们会抢走数量越来越少的好工作，并且取代已经日渐稀少的机遇。简而言之，它们将取代已经成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核心但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为了避免这一命运，一种方法是设立新的市场规则，确保财富最终流入公共领域，让所有公民能够享有最低保障收入，从而避免财富所有者的子孙后

代虽然没有参与创造财富，却能坐享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的财富。

另外一种方案是让所有民众共享由专利办公室授予且受政府保护的所有知识产权。每位公民拥有少量份额的知识产权。随着国家储备的知识资本不断增值，所有民众将能够获得分红。另外一种办法是让所有儿童自出生起就获得由股票和债券组成的最低基本基金——相当于持有未来经济的“股份”。随着经济不断增长，这一基金不断增值，成为向他们提供最低基本收入的储备金。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都需要调整市场规则，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如果人们无法共享日益庞大的经济回报，导致回报转而流入幸运的掌握着机器人和相关技术所有权的少数人及其后代手中，那么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也将无法存续下去。

---

1. 参阅“Forbes 400,” Forbes, September 12, 2014.另参阅 “America's Richest Families: 185 Clans with Billion Dollar Fortunes,” Forbes, last edited July 8, 2014.

2. Josh Bivens,“Inequality, Exhibit A: Walmart and the Wealth of American Families,”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July 17, 2012.

3. Peter Barnes,“Why You Have the Right to a $5K Dividend from Uncle Sam,” PBS NewsHour website, August 27, 2014.

4. 欲讨论预期的财富转移问题，参阅John J.Havens and Paul G.Schervish, A Golden Age of Philanthropy Still Beckons: National Wealth Transfer and Potential for Phi lanthropy Technical Report, Boston College, Center on Wealth and Philanthropy website, May 28, 2014.

5. 几位颇具见解的研究人员提供类似的建议。可参阅Bruce Ackerman and Anne Alstoff,The Stakeholder Socie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和Peter Barnes, 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2014).

6. Friedrich A.Hayek,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55.

7. 2013年10月，瑞士政府向选民提交了一项类似的提案。依据该提案，每位瑞士公民将每个月获得2800美元的生活津贴。这项提案时至今日仍未能获得通过。

8. John Maynard 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 1963).

9. Thomas Paine,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3, ed.Moncure Daniel Conway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895).

第二十四章 新的规则

我希望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明和创新浪潮，这些发明和创新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虽然它们将会取代不计其数的工作机会，从而压低绝大多数人的薪酬水平——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初露端倪——但是我们有能力重组资本主义，让人们广泛地共享经济成果。

我们之所以保持乐观情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无须成为没有人情味、不可操控的“市场力量”的受害者。市场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它建立在人类设计的规则之上。核心问题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制定了这些规则。在过去30多年里，大公司、华尔街和超级富豪塑造着这些规则，将美国的大多数收入和财富转移到自己手里。如果他们对规则的影响力仍然如此随心所欲，并且在新一波创新浪潮中掌控着核心资产，那么最终几乎所有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都会落入他们囊中。这种结果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其他人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将无法存续下去。

迫在眉睫的挑战并不是技术或经济学方面的挑战，而是民主所面临的挑战。在关系到未来的辩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政府规模如何，而是政府向谁倾斜。核心选择并不是在“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到底要选择旨在实现普遍繁荣的市场，还是选择几乎将所有经济成果都输送给顶层少数人的市场。由此引出的问题不是对富人征多少税，然后再分配给其他人，而是如何设计市场规则，确保经济本身能够带来大部分人认为公平合理的分配结果，而无须事后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

美国广大公民确实有权力改变市场规则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为

了行使这一权力，他们必须理解当前正在发生什么，以及自己的利益到底在何处，而且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我们曾经做到了这些。如果历史值得借鉴，常识能够指引我们，那么我们将能够再次成功做到。

致谢

本书是我多年研究、观察和讨论的产物。许多人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的见解贯穿于全书。在这里我无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启迪和滋养了我的思想。我特别要感谢亨利·布莱德、肖恩·法尔杭、亚历克斯·盖尔伯、希拉里·霍因斯、戴维·柯普、艾米·莱尔曼、保罗·皮尔逊、杰西·罗思坦和尤金·斯莫伦斯坦等同事为本书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和前同事，他们坦诚、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让我受益匪浅。在这里我必须特别提到理查德·帕克、雅各布·科思布卢特、约翰·艾萨克森、史蒂夫·西尔伯斯坦、迈克尔·珀楚克、保罗·斯坦尔、劳拉·泰森和埃里克·塔洛夫。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此我特别表示感谢。三位杰出的研究生利兹·格罗斯、索尼妮·彼特克和泰勒·斯迈利出色地帮助我寻找难得的事实和案例。曼纽尔·卡斯特里洛和塞尔盖·舍甫琴科熟练地提供技术支持。我要感谢我乐观、高效的助理丽贝卡·博尔斯，她在方方面面为我提供了帮助。我要感谢高曼公共政策学院和布鲁姆发展经济学中心提供的研究支持。就像以往一样，我的文稿代理商雷夫·萨加森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的编辑乔纳森·西格尔一如既往的是智慧和常识的源泉。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伴侣佩里安·弗莱厄蒂，她对真实性和社会真理的追求不断地鼓舞着我。